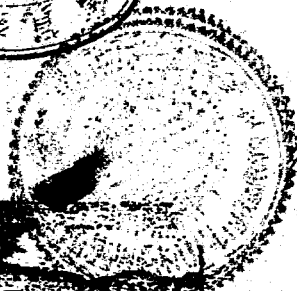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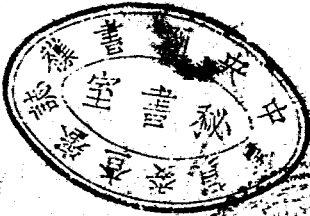


抗戰總動員

郭翰聖等著



58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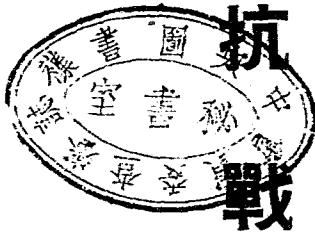


戰時出版社出版

22.278

28

中英圖書雜誌社編委會
第四科



戰時小叢刊之二十一

抗戰

總

山西省圖書館
勸藏書

員

戰時出版社刊行

重慶市圖書館藏

73043

目次

政治動員	鄧初民	一
從當前的政治說到政治動員	鄧初民	一
抗戰中的政治問題	施復亮	九
抗戰時期的民意機關問題	嚴士覓	二一
經濟動員		
怎樣運用我們的經濟武器	無患	二八
保證抗戰勝利的經濟條件	姜君辰	三一
怎樣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	陳獨秀	三六
抗戰時期的財政問題	周憲文	三九
論戰時金融	章乃器	四四
戰時工業問題	孫懷仁	四九
外交動員		
請政府速定外交國策	胡愈之	五四
抗敵救國要厲行聯俄政策	張西曼	六五
打擊敵人的外交陰謀	王亞南	七三
文化動員		
怎樣動員我們戰時的文化	翦伯贊	八一

文化工作與國民動員	鄒韜奮	八九
文化戰線的組織問題	金則人	九一
文化的抗戰與抗戰的文化	沈志遠	九二
不能放鬆思想的崗位	艾思奇	九七
教育動員		
戰時教育問題	楊一尊	一一〇
非常時期的兒童教育	陳鶴琴	一一七
戰時教育的具體辦法	滿力濤	一二九
新聞動員		
新聞抗戰論	沈志遠	一四二
抗戰發動後的新聞界工作	薩空了	一四三
藝術動員		
全面抗戰中藝術家的的工作	倪貽德	一四九
抗戰中的文藝運動	王統照	一五一
抗戰期間的文學	阿英	一五七
戰時演劇的我見	許幸之	一五九
抗戰與歌劇	趙景深	一六二

政治動員

從當前的政治形勢說到政治的動員

鄧初民

中國近百年的歷史所給與我們的革命使命，對外是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對內是剷除一切封建勢力的民主革命。這因為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的對立，是主要的對立；中國社會又是一個半封建社會，封建勢力與人民大眾的對立，也是主要的對立。所謂民族與民主革命，簡言之，即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不幸這一革命，中經革命勢力之分裂，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一直沒有完成，又不幸「九一八」的民族大慘變，突然爆發，把中國命運淪於生與死，存與亡的十字街頭，使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不能不適應着當前具體的政治形勢，而變為抗日與反漢奸的革命。因為「九一八」以後，即刻變更了國內的形勢。一方面日帝國主義與中國的對立，成了主要的對立，暫時把中國與其他帝國主義的對立壓低到了次要的地位。同時，日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的對立，也成了主要的對立，暫時把國內各種社會階層的對立也壓低到了次要的地位。換言之，即是民族對立，壓低了階級對立。

但抗日反漢奸的革命，並不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相衝突。它祇是革命戰術的變更，並不是革命

策略的變更。在抗日反漢奸這一革命戰術之下，在抗日第一主義之下，便使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爲當前政治實踐的總的路線。

這一民族統一戰線，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民十五北伐的勝利，可以說是由於統一戰線的建立，其失敗，恰恰是由於統一戰線的破裂，然而這一民族統一戰線，却不是舊的東西，它有它新的姿態，它的範圍是擴大了。它包括一切不願做亡國奴做漢奸的人，它把一切都放在對外的基礎上，因而它與中國過去的統一戰線不同，也與現在西班牙、法蘭西的人民陣線不同；但它却與世界上的和平陣線有着緊密的聯繫，它決不是孤立的。

這樣一條總的政治路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它的產生，雖然是由於中國客觀實踐的要求，但客觀實踐要求的東西，并不就是自然生長的東西，它還需要人的努力，需要種種社會條件。其最主要的社會條件，可以說一是國內的和平統一，一是國內的民主自由，而最後目標，則爲完成我國一致的對日抗戰，從和平到民主，從民主到抗戰，這是「九一八」以後的客觀形勢所給與我們的新的政治路線，新的確定步驟。

然而這一新的政治路線，新的確定步驟，却不是「九一八」慘變一開始，就有人提出了的。實在說，「九一八」的開頭幾年，中國所執行的却是與新的政治路線，新的確定步驟正相反對的政策。例如我們要求的是精誠團結、和平統一，而那時（日寇已佔了東北四省還向我一步一進取不止的

時候)却仍在努力剿匪進行內戰。我們所要求的是開放民衆愛國運動實現民主政治，而那時却仍在壓迫愛國運動，限制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一切自由，幻想造成個人獨裁。我們所要求的是舉國一致對日抗戰，而那時卻堅持着不抵抗主義。一句話，我們要求的是和平、民主、抗戰，而那時所行的政策，卻是內戰、獨裁、不抵抗。

從內戰獨裁不抵抗到和平、民主、抗戰的轉變，是需要一番鬥爭的，需要人的努力的。這一努力差不多在「一九一八」以後的半年——一九三五下半年方開始。那時首先就由於民衆迫切的要求，提出了組織抗戰的總的政治路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同時，就開始爭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第一個社會條件，就是爭取國內的和平統一，所以「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對內和平，對外抗戰」、「精誠團結，和平統一」等口號的喊出，都是這一工作的實際表現。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可以說就是爭取國內和平統一初步的成功。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在歷史上是有劃時代的意義的，它作了偉大的歷史轉變，承上啓下的樞紐，它使我們馬上展開第二步工作，馬上從爭取國內和平統一運動轉到爭取國內民主自由運動。馬上從很嚴重的民族危機達到一個新的轉變點。它在中國歷史從內戰、獨裁、不抵抗到和平、民主、抗戰的轉變上，以很鮮明的筆跡刻劃了一塊永不磨滅的界碑。此後中國政治展開了一種新形勢，它開始由和平統一向民主抗戰之途邁進。和平——民主——抗戰，這是新的政治形勢所給與我們的新的

努力步驟這一步驟敵人是決不允許我們從容完成的。果然它在我們正集中力量，於國內和平統一有了相當基礎之後，爭取國內的民主自由，一面藉以鞏固和平統一，一面藉以充實抗戰力量發動舉國一致抗戰時，便爆發了蘆溝橋事件，而且佔領我們的平津了。這樣，它就破壞了我們準備抗戰的步驟。我們也就祇有立即抗戰。抗戰！抗戰！一千一萬個抗戰！這樣就縮短了我們組織抗戰，推動抗戰，實現抗戰的步驟，把我們的抗戰提上前了一步，我們決不能說要等國內民主自由澈底實現之後，才能抗戰。更不能把和平——民主——抗戰的步驟看做機械的。我們並且要澈底認識祇有在抗戰過程中，和平統一與民主政治，才能澈底完成與實現。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句話，本來就包含惟有「戰」才能「統一」的意義。

抗戰是已開始了，我們祇有立即總動員。在總動員中包含各種的動員——政治的動員，經濟的動員，軍事的動員，文化的動員，然而在各種動員的組織過程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莫過於政治動員的組織過程。

政治動員是各種動員的「摩托」。如果政治動員的組織過程不健全，不堅實，不強有力，雖然你有最完備的軍事組織，最優勢的經濟勢力，最前進的文化水準，甚至於最熱烈的民族意識與抗敵情緒，都將不能好好地發揮出它的力量來。

因此政治動員，成了我們總動員中，亦即成了我們同日帝國主義決最後生死抗戰中一個頂

值得注意的問題，總動員的前途如何？政治動員是其決定者。甚至於抗戰最後的成功與失敗，亦決於當前的政治動員。

然則政治動員的中心任務在那裏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權機構或政治組織的健全，堅定，強化。所謂政權機構或政治組織的健全，堅定，強化，就是要使政治的「摩托」在各方面的指揮，調度，支配，操縱上，如在經濟，軍事，文化，民衆各方面的指揮，調度，支配，操縱上，都有「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之效，極度的靈活，極度的敏捷。

那麼，我們就只有在各方面推進加強政府中樞，政權機構的工作。

第一，我們要使國內的各黨各派，不分左右，不分大小，一個也不遺漏的統一在政府中樞之下。

第二，我們要使國內的軍政當局，地方當局，亦即國內過去不免對立的各實力派，一個也無例外的統一在政府中樞之下。

第三，我們要使國內各階層的民衆，各職業界的民衆，不分老少，不分男女，不分宗教信仰，不分漢滿蒙回藏，一個一個都忠實赤誠團結在政府中樞的周圍。

這就是說加強政府中樞，其向心力的因素，不僅限於政府本身的直接組成者，同時，還要使廣大的民衆擁護它。也就是說政治健全，堅實，強化的過程，不僅限於政權機構的一部分，還要及於全部的政治組織，即把政治組織過程，推廣到一般社會組織及人民意識的組織過程。

但是政治組織的強化，並不就是政府中樞的獨裁，恰恰相反，而是要在政治組織的本身包含最大最廣的民主性。所謂政治組織本身的民主性，就是將政權極度公開，就是把抗日救亡運動，甚至直接的抗戰組織，開放給全中國人民，乃至於全中華優秀的兒女們，把抗日救亡的各種自由——言論，出版，思想，信仰，集會，結社各種民主自由，交給全中國人民，乃至於全中華優秀的兒女們，使各種不同的意見有共同討論的機會，各種不同的問題有共同解決的機會，使全國人民的公意都有直接訴之於政府中樞的機會。這樣，政府中樞所執行的才是全國各黨各派各階層，各種職業界，乃至全國人民的公意，由是政府才變成全國人的政府，才能得到全國人的擁護，才能強有力的去執行抗戰，才能強有力的去動員各方面起來抗戰，才能在總動員的過程中去強有力的指揮，調度，支配，操縱一切。

譬如說，在目前直接走向抗戰，立即發動舉國一致的抗戰，是全國人民的公意。政府中樞即以抗戰的具體表現昭示國人，則各黨各派各階層的民衆，自然相信政府，擁護政府（過去割據的封建軍閥，亦失卻反對中央的口實），在抗戰的過程中，要求抗日救亡以至直接抗戰組織之各種自由，尤其是抗戰過程中的極度民主性，是全國人民的公意，政府中樞即以各種自由交給他們，則各黨各派各階層民衆，自然只有對於政府的信仰加深，對於政府的擁護加強。決沒有一個喪心病狂的人還在這樣的政府中樞領導之下搗亂。過去一方面用一切方法壓迫民衆愛國運動，壓迫其他黨派的抗日活動；而另一方面想在政府或政府黨的包辦之下來「統一救國運動」其方法是愚蠢，其結果是失敗。

已有充分的事實得到證明。

所以在總動員中，政治動員是最基本的，在政治動員中，政治組織的強化，是最中心的任務，而政治組織的強化並不是政府中樞的獨裁，倒是政治組織本身的民主化。所以爭取民主自由，成爲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要條件之一；同時，也是實現抗戰政治動員的主要條件之一。在和平——民主——抗戰一系列的步驟中，日寇不讓我們從容完成爭取民主這一步驟就發動了它的侵略戰爭——就爆發了蘆溝橋事件，而且佔領了我們的平津，我們只有在抗戰的過程中來完成它，只有在政治動員中來完成它。

西安事變以後，各黨派的合作談判已在日益進展，這可以說是政府中樞民主性之最大表現，也可以說從那時起已開始了政治動員，已完成了政治動員的主要部分，也即是說把各黨各派已開始統一於中樞政府之下了。

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中央雖亦曾幻想於委曲求全之中得到與日寇暫時妥協的和平，然而平津失陷，已超出了任何人可以容忍的境界，尤其是把蔣委員長廬山第二次談話所提示的四原則破壞無餘，我中樞乃亦不得不從準備抗戰時期走入立即對日抗戰的偉大時期。因此，各地方當局，各地方軍政領袖——如閻錫山，余漢謀，韓復榘，何鍵，白崇禧，黃旭初，劉湘，龍雲，譚氏，都紛紛入京，這是抗戰聲勢擴大之有力的表現，尤其是中樞政府加強，政治組織強化之有力的表現，亦即政治動員之具體

的實質的表現。這種表現當然更以廣西領袖之入京爲最尖銳最明朗。這樣，各地方當局也無例外的統一在中樞政府之下了。

再則自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全國民衆即風起雲湧組織抗敵後援會，發起募捐，慰勞，宣傳，組織等等運動，亦即開始各種動員準備，而各種動員準備，差不多以京滬武漢等處爲最熱烈，這是把各種抗日救亡的民主自由開放給全國人民之具體的表現，亦即政治民主化之具體的表現。最值得注意的，還有政治犯釋放及其通緝令之取消等。現在救亡七領袖是已出獄了，久被通緝的郭沫若已取消通緝，並已從日帝國主義的領土回到「諸夏」了（郭最近作詩有「願將殘骨埋諸夏」之句。）這尤其是政治民主化之最具體的表現，尤其是政治動員之最有力的表現。這也將會使全國民衆都忠實赤誠地團結在政府中樞周圍。

這樣，最基本的政治動員就可以完成了。政治動員的完成，同時就是總動員的完成。我們總動員起來去同日帝國主義拚命，我們一定要戰勝日帝國主義！我們也可能戰勝日帝國主義！

可是我們的政治動員，也不一定就是這樣順利的，這樣的政治動員，一定要受到漢奸，親日派，以及一切日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警犬們的破壞，所以我們一定要在總動員中，集中力量爭取政治動員，政治動員中集中力量爭取政治的民主性，即我們要在抗戰的過程中來完成民主運動。

（文化戰線）

抗戰中的政治問題

施復亮

一 抗戰底重心在政治

軍事是政治底一部分，戰爭是政治底延長。而政治又是經濟底集中的表現。在階級社會裏，人類底一切活動，都必然要直接或間接地表現在政治上，直接或間接地受政治底限制。人類底一切經濟鬥爭和思想鬥爭，都要遲早發展為政治鬥爭。歷史上一切重大的事變，都要在政治上得到解決。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着的抗日的神聖戰爭，也是一種政治鬥爭，也要在政治上得到解決。我們底抗戰能否堅持到底，能否爭得最後勝利，全看我們在政治上，有無辦法。我們底政治機構和政治設施，能夠發動全國一切人力和物力來支持抗戰到底，則我們底抗戰一定會得到勝利。不然，就遲早要歸於失敗。所以抗戰底重心在於政治，而政治底基礎又在於民衆。

先從軍事上看。這次華北軍事上的失敗，誰都知道，其根本的原因在於政治。因為過去政府沒有堅決抗戰的國策，所以養成地方當局親日媚日，苟且偷安的心理。因為有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等喪權辱國的協定底束縛，所以日本軍隊可以在中國境內任意駐紮，任意橫行，中國軍隊反而不許駐在本國領土內，日本底特務隊、間諜、流氓及中國底漢奸可以互相勾結，狼狽為奸，甚至盤據在中國政府機關內，而中國民衆底救國運動反不能不受壓迫。因為保持着官僚政治的機構和活動，所以大小官吏

只知道自私自利，升官發財，不以國家民族爲念，更不以民衆痛苦爲念，以致軍隊作戰得不到民衆底幫助，甚至有一部分民衆被敵人利用去當漢奸。因爲未能澈底肅清封建勢力，不能把私人軍隊改造爲國家的軍隊，所以軍隊長官把軍隊看作自己底私有品，爲要保全實力而不肯努力作戰，甚至企圖與敵人妥協以苟延殘喘。因爲軍隊中沒有政治教育，下級軍官和士兵沒有政治覺悟，所以一個高級軍官底誤國賣國也就影響到整個軍隊。因爲整個政治腐敗，軍隊紀律不好，所以民衆害怕官僚，害怕軍隊，一聽見戰事發生，只有四散逃走。凡這一切，都是政治問題，都是過去政治不良所生的惡果。所以我們說華北失敗原因不在於軍事而在於政治。假使我們底政治不是官僚政治而是民主政治，我們底政府平素不以壓迫民衆剝削民衆爲使命，而以擁護民衆利益，扶助民衆勢力發展爲職志，那末這次華北底抗戰一定會得到民衆底援助，幾十萬忠勇的將士一定會發揮出偉大的抗戰力量，決不會有今日的失敗，即使失敗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慘而且快。華北抗戰底經驗，很明顯地指示出抗戰底重心在於政治。上海抗戰得不到民衆底積極援助，甚至找不到民衆做嚮導，也已經充分證明過去政治上的失敗。無論南方或北方底抗戰，要能維持到底，都只有動員廣大的民衆來參加抗戰。動員民衆就是一個政治問題。

其次從經濟上看，我們知道：要我們底抗戰能夠支持到底，必須實行戰時統制經濟，必須把一切經濟活動放在國家底整個計劃統制之下。無論金融、貿易（尤其是對外貿易）、工業、農業、礦業、交

通，都應當由國家按照抗戰的需要，定出整個統制的辦法，應歸國營者便應立即改爲國營，其餘一切企業也應當受國家及民衆底雙重監督。一切技術人才和勞動者，也應當有適當的合理的分配，使他們都有報効國家的機會，發揮他們特有的長處。要實行這樣的統制經濟，必須先改革政治，使我們底政府建立在民衆的基礎上，得到廣大民衆底擁護，真正變成強有力的支持抗戰到底的政府。即以募集救國公債和對日經濟絕交二事來說，也只有發動政治的力量（包括政府的及民衆的力量）才能收很大的效果。五萬萬元救國公債募集了兩個月，爲什麼認購的還只有半數，且實繳的還不過幾千萬元？對日經濟絕交運動爲什麼在上海抗戰一個多月以後才發動？爲什麼最近還有許多奸商私自買賣日貨？這些都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是嚴重的政治問題。因爲政府沒有規定強迫「有錢人」購買救國公債的辦法，所以「有錢人」可以逃避責任，使得救國公債無法在短期間募足。因爲政府沒有對日絕交，沒有嚴厲制裁奸商的法律和辦法，所以對日經濟絕交無法澈底施行。尤其因爲政府沒有發動廣大的民衆運動，民衆底偉大的組織力量還沒有表現出來，所以不能以民衆底力量積極援助救國公債底募集，直接制裁奸商底行爲，更不能督促政府採取進一步的財政經濟政策。因此，我們堅決地說，要使抗戰的經濟有支持到底的辦法，必須先改革政治。政治是經濟底集中的表現。

復次，從教育上看，過去的教育是形式主義的，個人主義的教育，辦學者多半只曉得裝飾門面敷衍了事，求學者多半只注意分數文憑，以混得一種資格，解決個人職業問題爲目的（甚至以升官發

財爲目的。像這樣的教育，平時已經有「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的毛病，何況在這抗戰的非常時期。最近有許多處在戰區裏的學校，或者移到租界裏開學，或者移到內地去開學，也只是抱定得過且過的態度，毫無整個的應付非常時期的辦法。平津失陷之後，有許多大學在西安長沙聯合開辦戰時大學，所設院系，課程及教育方針和方法，據說還是過去的那一套，並沒有多大變動。最奇怪的是，在抗戰中成立的以支持抗戰爲目的的幾個大學，其所設院系，課程及教育方法，也與其它大學無甚差別。軍事上的全面抗戰已經發動了二個多月，而我們底教育還是與過去一樣，甚至比過去不如，不能與當前的抗戰需要配合起來，實在是一件痛心的事。軍事方面抗戰而教育方面不抗戰，我們要這樣的教育做什麼用？國家快要亡了，還苟且偷安地空談過去那一套「樹人的百年大計」，即使不是瘋子，也是自欺欺人的行爲！東北四省淪陷了，平津失守了，請問我們還能到東北四省和平津去談「樹人的百年大計」不能！一切「百年大計」只有在保得住國家獨立，保得住民族生存的前提下方能夠大談特談。不先爭取國家獨立，民族生存，一切都是廢話！所以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教育，是直接間接有利於抗戰的教育，不是那些粉飾太平的教育。一切教育，都應當站在維持抗戰的立場上，從新估定，澈底改革。但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先改革政治。沒有澈底抗戰的政治，決不會有澈底抗戰的教育。

此外，無論從宣傳方面或從民衆運動方面來看，都可以知道，種種缺點底根本原因都在於受政治上的妨礙。假使在政治上沒有辦法，假使你們不能趕快在短期間內實現適應抗戰需要的民主集

構的政治，假使我們不能用政治的力量（政府的及民衆的）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來支持抗戰，則我們底抗戰前途決無勝利的可能。所以抗戰中的中心問題是政治問題，我們必須爲支持抗戰到底來解決政治問題，使我們底政治變成真正能領導抗戰到底的政治。

二 制定抗日的政治綱領

我們這一次抗戰，是中華民族求生存自由的聖潔的革命戰爭。因爲我們不願做亡國奴，不願做奴隸，所以我們一致地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底侵略。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爭自由爭平等的中國革命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完成，革命的三民主義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實現，我們都要在這次抗戰中來完成來實現。這樣的抗戰是神聖的抗戰，必須有鮮明的政治綱領來領導，必須使全體民衆都在一個共同的抗日政治綱領之下團結起來支持抗戰到底。有了共同的抗日政治綱領，政府底一切設施和民衆底一切行動方有所依據，一切民衆才知道爲實現這一綱領而努力，才知道未來有光明的前途，才能自覺地積極地爲支持抗戰而犧牲一切。要使廣大的民衆積極參加抗戰，必須使他們知道抗戰底真實目的和政治內容，決不是糊里糊塗便可以把他們動員起來的。所以我以爲應當立刻制定一個抗日的政治綱領，以便政府和民衆共同遵守。這一綱領底重要內容，我以爲應當規定如下：

第一，應當明白規定這次抗戰底目的在於掃除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武力，廢除中日間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復華北及東北一切失地，沒收日本在華的一切財產，取消日本底一切債款，並建立

「民族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第二，應當明白規定這次抗戰底基本力量是廣大的民衆，尤其是占全國人口底百分之八十五的生產的工農大衆，必須把廣大的民衆尤其是農工大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才能保障抗戰底勝利。應當立即允許民衆有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以及武裝保護國家的自由。對於漢奸及一切破壞抗日的份子，應當施行嚴厲的制裁。

第三，應當明白規定抗戰的外交政策：與利害共同的蘇聯訂立互助公約，聯合同情我們抗戰的國家和民族；聯合受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和民衆。

第四，應當明白規定立即改革政治機構，肅清貪污份子，實現政治的民主化，以造成強有力的支持抗戰到底的民主集權的政府。

第五，應當明白規定實施戰時統制經濟，一切經濟活動都以「支持抗戰」爲最高原則。對外貿易、金融機關、交通機關、糧食、軍需品，完全歸國家經營或管理。其它重要企業也應當受國家監督。避免一切物力底浪費，嚴格執行「有錢出錢」的原則，不許少數人乘機犧牲大衆利益以謀個人利益。

第六，應當明白規定優待抗戰將士，改善士兵生活，保障抗戰將士家屬及傷兵不能工作者底生活，保障一切抗戰人員及其家屬底生活，救濟失業分子，改善或保障工農大衆底生活。

第七，應當明白規定改革教育制度，實施抗戰的教育，普遍地施行政治教育和軍事教育，擴張並

加快技術教育，盡可能地施行免費教育。一切教育機關除小學外，都應當以培養軍事人才、政治工作人才、技術人才及經濟管理人才爲主要任務。

第八，應當明白規定國內民族一律平等，男女在經濟上、政治上、法律上、社會上一律平等。

第九，應當明白規定廢除一切不適合於抗戰需要的法律，另訂以支持抗戰爲目的的新法律。除了漢奸及一切破壞抗戰的份子，其他罪犯都可以從輕處理，並須盡可能地用勞役代替刑罰。法院制度也須加以澈底的改革。

以上幾點，是我認爲應當在綱領中明白規定的。這種綱領是一種行動綱領，在抗戰期中，不但政府 and 一般民衆都應當遵守，就是各黨各派也都應當遵守。「共信不立，互信不生」這句話是不錯的。但要建立真正的共信，必須根據大多數民衆底公意，決不能一二人或少數人隨便來決定。因此，這種綱領必須用民主的方法來制定，即由人民代表會議來制定。

三 召集人民救國會議

我們屢次說過，我們底抗戰如爭得最後的勝利，必須發動全國一切人力物力來支持抗戰，要發動全國一切人力物力，必須運用民主的方法。換句話說，只有實行民主的抗戰，才能爭得最後的勝利。什麼是民主的抗戰？簡單說，就是以民主的方法動員全國一切民衆，使全體民衆都有抗戰的政治覺悟，自動地組成強有力的民衆團體，以民衆團體作政府底基礎，由政府來領導整個抗戰運動。只

有這樣的抗戰，才能根本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達到中華民族徹底解放。

抗戰底重心在政治，政治底基礎在民衆。因此，改革政治機構，發動民衆運動，是目前一切問題中的根本問題。要徹底改革政治機構，必須民衆運動有偉大的發展，要發動廣大的民衆運動，也必須政治機構有相當的改進。這兩者是互相影響，互爲因果的。但是根本的主觀的推動力是在民衆方面（客觀的推動力是日本帝國主義不斷的進攻），所以發動民衆運動是我們推動抗戰到底的第一個重要的任務。不過在目前，政府當局底抗戰決心及政府內部抗戰分子底努力，無疑地具有極大的作用。因此，我們希望上層抗戰的領袖及下層抗戰的民衆底共同努力，促進政治底民主化，促進民衆運動底發展，以鞏固抗戰的力量。政治越民主化，民衆運動越發展，政府底基礎便越鞏固，抗戰的力量便越擴大，世界上最有權力的政府，是以廣大民衆爲基礎的，得到廣大民衆擁護的政府。我們必須努力建設這樣的政府，使政府與民衆打成一片，一致努力抗戰到底。

在目前，我們必須立即建立一個政府與民衆合作的領導機關，即所謂臨時的民意機關。自然，我們目前要馬上召集一個真正代表廣大民衆的機關是不可能的，因爲現在大多數的民衆還沒有組織起來。但我們不能不向着這個方向去努力，不能不馬上建立一個比較能夠代表民意的臨時的民意機關。這一機關名稱可以定爲人民代表救國會，或用別的名稱也可以。其構成分子可以有四種：（一）抗戰的各黨派主要的是國共兩黨；（二）抗戰的各民衆團體（如各地抗敵後援會、救亡

協會等努力救亡的團體，)以民衆的方法選出代表(只有空頭招牌而沒有羣衆的團體不能選代表，)並須盡可能地在大會裏選舉，以免濫造會員名冊，包辦選舉等的弊病；(三)抗戰的各軍隊(以每一獨立作戰的部隊爲單位，)也以民主的方法選代表(由官長與兵士共同選舉，)這是現在最努力的抗戰勢力，不能不有代表；(三)過去有抗戰歷史及堅決主戰的政治軍事領袖如陳銘樞、蔣光鼐、蔡廷楷、馬占山、馮玉祥、方振武、宋慶齡、李濟、何香凝、李杜及救國會七君子等。總之，這一機關是抗敵救國的機關，絕對不許一切親日媚日的投機取巧的分子參加。召集底手續可以簡單，時間越快越好。人數以二百人左右爲宜。在會議完了後應設一經常機關，人數以五十人左右爲宜。這一機關是臨時的民意機關，執行職權的期間當以半年爲期，須於半年之內籌備召集一個真正以廣大的民衆團體爲基礎的救國會。

這種人民代表救國會，應當負起三種重要責任：第一種是制定抗日的政治綱領，以便政府和民衆有所遵循；第二種是制定改革政治機構的方案，選任政府最高官吏，組織並監督國防政府；第三種是發動並領導民衆運動，有權派遣幹部到各地去組織民衆，不受政府機關和軍隊底干涉。此外，國家底預算和重要立法，也須得這個機關通過。對於貪官污吏，也得隨時檢舉彈劾。總之，這一機關必須變成真正能夠代表抗戰民衆意志的機關，不能變成有名無實的諮詢機關，更不可變成段祺瑞式的「善後會議」。這是實現政治民主化的第一步，也是表示政府與民衆聯合抗日的第一步。走上這第

一步，然後才能一步一步地走上民主抗戰的道路。我們必須用全力來爭取這第一步。

四 改革政治機構

誰都知道，在抗戰中，必須有抗戰的政治機構來支持抗戰。平時的政治機構，決不能適合戰時的需要，非立即加以改革不可。任何國家在戰時都是如此，尤其是我們中國。我們現有的政治機構，誠如大公報所說，是一種官僚主義的政治機構。官僚主義的政治機構底缺點，主要地是：（一）只有由上而下的監督，沒有由下而上的監督，凡事只要對上面敷衍得過去，欺瞞得過去，便算完事；（二）官吏們多半替個人打算，很少替國家民族打算，甚至利用種種好聽的名義勒索民衆，欺壓民衆，利用種種機會營私舞弊；（三）辦一件很小的事件要經過許多不必要的煩瑣的手續，只重形式不重實際，甚至故意延擱案件；（四）官吏們心目中看不起民衆，處處用傲慢的態度對待民衆，使民衆害怕官吏，隔斷政府與民衆底聯繫。這種政治機構，在中國有幾千年的傳統，自然不是一時改得好的。但我們要進行持久的全面的抗戰，非趕快把這種政治機構加以改革不可。

我們主張改革現有的政治機構，並不是說現有的官吏都要不得，非全部撤換不可。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必要的。我們是認定爲要支持抗戰到底，非建立強有力的適合抗戰需要的民主集權的政府不可。我們敢堅決地說，沒有這樣的政府，決不能支持抗戰到底。我們不贊成「愚民政策」，我們也不贊成「諱疾忌醫」一個人生病並不要緊，只要有好醫生醫治是會好的。最可怕的是生了重病

還不肯請醫生醫治。個人的病不醫治，死亡了還只是個人，沒有什麼可惜。政治的病不醫治，滅亡的是幾百萬千人，甚至是整個國家民族。華北失敗底教訓，已經夠我們「心驚肉跳」了，難道我們還不醒悟嗎？難道一定要到國破家亡，做了日本帝國主義底奴隸之後才悔悟嗎？到了那時悔悟已來不及了！現在是何等緊急的時候，亡國之禍已迫於眉睫了！我們政治上的毛病已經到處暴露出來了！任何方面都不夠適合抗戰的需要！不趕快急起直追改正一切毛病，將會使前線忠勇將士壯烈的犧牲變成沒有意義！一切毛病底中心在政治，所以我們不能不大聲疾呼要求趕快改革政治！我們希望由抗戰領袖和抗戰民衆底雙方努力，趕快把平時的政治機構改變爲戰時的政治機構，把官僚主義的政治機構改變爲民主主義的政治機構！我們也希望一切政府大小官吏趕快覺悟民族底危機，拋棄一切自私自利的升官發財的觀念，自動地站在民衆方面來，爲擁護國家民族底利益而努力促進抗戰的民主政治底實現，把平時的官僚主義的政治機構改變成戰時的民主主義的政治機構！任何軍事政治領袖，任何政府官僚，只要從今天起進行抗戰到底，支持抗戰到底，一定會得到廣大民衆底擁護！民衆決不會計較過去的一切，民衆對於任何人都不會有成見和偏見，誰能抗戰到底便擁護誰！我們站在民衆的立場上，站在要求抗戰到底的立場上，無論如何都不能不要求趕快改革政治機構。我們並不是故意要強調改革政治機構，故意要與某一部分人爲難，更不願因此引起內部的摩擦和衝突，實在因爲不趕快改革政治機構，其餘一切重大事件都無法進行！

那末現有的政治機構，究竟那些地方應當馬上加以改革呢？我以為至少應當立即改革下列各點：第一，從中央政府起直到鄉村政治機關止，組織上應當根據抗戰的需要加以澈底的改革。就以中央政府來說，五院制度不適合於抗戰需要，應當馬上廢止，從新建立統一的國防政府，鐵道部應當歸併於交通部，海軍部應當歸併於軍政部，為統制糧食底生產、運輸和分配，應當設立糧食部；為集中並擴大軍需品生產，應當設立軍需工業部，為登記並分配技術人才及勞動者，保障他們底生活，應當設立勞動部為保障抗戰將士家屬底生活，保障傷兵（不能工作者）底終身生活，保障一切因參加抗戰工作而傷亡的人員及其家屬底生活，應當設立救濟部。（詳細理由，待以後有機會時再說）省政府、縣政府及鄉村政府機關，也應當按照抗戰需要加以改革。總之，一切政府都應當以動員一切人力物力來支持抗戰為根本任務，都應當根據這一原則來施行改革。第二，一切政治機關除了由上而下的監督外，都應當有由下而上的民主的監督，允許一切下級官吏對上級官吏底違法失職及營私舞弊的行為有告發權。第三，肅清貪污分子及淘汰掛名無能的分子，對於利用救國名義勒索民衆、欺壓民衆的貪官污吏及一切違法失職的分子，施行嚴厲的制裁。第四，用人以能力負責，勇敢等條件為標準，廢除一切有名無實的資格限制。第五，辦事要簡單敏捷，責任要彼此分明，廢除一切煩瑣的手續，有必要時須連日連夜工作，任何事件不許敷衍了事和延宕擱置。第六，取消高額薪水，任何人月薪至多不能超過百元，並不許浪費公款公物。第七，廢除一切不必要的糜費的機關。以上幾點，我認為是目

改革政治機構問題中最低的要求，是應當而且可以馬上實行的。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那抗戰底前途便很可悲觀了。

五 努力促進政治底民主化

根據以上的種種說明，我們知道：我們要爭取最後的勝利，必須制定抗日的政治綱領，以便政府和民衆共同遵守；必須召集人民救國會，作爲暫時的民意機關，實行制定抗日的政治綱領並發動民衆運動，必須改革政治機構，使它變成適合戰時需要的並逐漸建立在民衆基礎上的政治機構。簡單說，就是我們要爲爭取抗戰底勝利去促進政治底民主化。民主不但不會減少抗戰的力量，而且只會增加抗戰的力量，因爲只有用民主的方法才能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來支持抗戰。因此，我們要努力促進政治底民主化，努力推動民主的抗戰。

一切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同胞！我們爲要爭取最後的勝利，必須一致去推動民主的抗戰！

（文化戰線）

抗戰時期的民意機關問題

巖士復

一 爲什麼要有民意機關

要求「民主」的聲浪，在抗戰未發生以前，已經是很高漲了。抗戰開始後的三個多月中間這個

野聲並沒有減低，相反的，從各方面所反映的輿論看起來，抗戰時期的民主問題，已經展開了廣汎的討論，形成了迫切的要求，現在已經不是原則上的號召問題，而是怎樣具體實現的問題。聽說最近政府方面，在輿論推動之下，也同意設立一個代表民意的機關，可見這個問題已快要具體化了。

我們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要求民主呢？誠如章乃器先生在「抗戰時期的民主問題」中所說的：「抗戰以前我們談民主，是要政府執行人民公意，抵抗侵略；抗戰以後我們談民主，是要政府集中國力，動員民力，抗戰到底，以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認為祇有政府與民衆打成一片，然後才能動員廣大的民衆力量，作為民族抗戰堅強的支柱，亦惟有廣大的民衆在政治覺醒的前提下，自動的參加抗戰，然後才能支持長期的抗戰，爭取最後的勝利。

「事實勝於雄辯」，動員民衆的問題，並不是像少數人所臆測的這是某一部份人拿它來作政治變名的，這是一個迫切需要的問題，而不以動員民衆來作玩弄政治的手段。假如不是盲目的人，他總可以看見最近幾個月來的現實吧！前方英勇的將士浴血抗戰，在敵人現代化的殘酷武器之下，不惜為我們民族的生存，而拚其血肉，然而鄰近戰區的民衆，早已逃離星散，一方面沒有民衆積極的協助軍隊作戰，另一方面，因為好的民衆逃光了，反而使留下來的漢奸，得以乘間作危害民族的行動。「我們的軍隊是在自己的民衆堅壁清野下作戰」，這是西戰場退下的傷兵所指出的慘痛的經驗。我們能無視這般一般的事實嗎？

上面就是前方說的，至於後方情形是怎樣呢？抗敵後援的工作，祇限於少數有組織的民衆作部份的努力，而大多數的市民與農村中廣大數量的農民，仍然是散漫亂動，沒有被組織在堅強的民族陣線裏面。工商業家不肯恢復他的企業，金融資本對於救國公債勸募的怠工，豪紳地主仍然是農村的統治者，這些腐舊的情形，如果不用雷霆萬鈞之力，加以摧毀，加以糾正，我們抗戰的前途能有必勝的把握嗎？

我們爲健全前方，增強抗戰的力量，應該趕快的做到軍隊與人民一致；我們爲健全後方，鞏固抗戰的力量，應該趕快的做到政府與人民一致。這一任務的完成，不是僅憑政府行政權的力量所裏達到的，而是要以民意爲基礎的最高集權力量，才能摧陷廓清，走上進步的前途。

我們要動員民衆，一定要有民主的政治機構，而戰時民意機關的設立，是政治機構民主化的第一步。

二 民意機關會減弱領袖的權力嗎

有人以爲民意機關一成立，則最高領袖的權力將會因此而削弱，這是一種不明事實的杞憂。我們明白領袖的權力是集合權力的體現，領袖的意志是集合意志的體現；而這種集合的權力與集合的意志，正是民意的集中化與具體化。如果領袖不能得着全國民衆的擁護，體現全國人民的意志，他能發揮無上的威權嗎？

我們現在要求民主，還不僅是爲的掃除中層的障礙物，而恰是爲的增強領袖的權力，鞏固長期抗戰的基礎。我們可以說賢明的領袖，一定是代表民衆的意志的，然而領袖在萬幾叢集之中，聽聞或有未周，情報或不直接，對於遠居下層的民衆意見，不一定就能很正確的反映上去。如果任其隔絕，則政府與民意將走上不同的路線，而堅強的抗敵陣線，在某種情形之下，就要發生動搖的危險。

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的精髓，是要造成人民所能管理的萬能政府。這就是說作爲萬能政府的治權，是建築在人民的政權上的。人民能「管理國事」，不獨不會影響政府的權力，恰恰相反的，更可以增高政府的權力。這就是「民主集權」的涵義。

爲使政府與民衆間的意見不至隔絕，爲使動員民衆不至受中層的障礙，爲使抗戰的基礎日益鞏固與擴大，我們應該趕快的建立一個戰時的民意機關，來完成上面所說的種種任務。

三 民意機關在法律上的地位

我們在抗戰時期需要怎樣的一個民意機關呢？近來一般在討論具體的民意機關的時候，常常忽視了這一機關在法律上的地位。結果就要遷就事實，將一個應該具有權能的機關，變成一個政府的諮詢機關了。我以爲一個民意機關的成立，一方面應該有它範圍以內的權力，而另一方面又要現在客觀的情勢之下，可以實行，我想這樣雙方兼顧的辦法，是不能做到的。

其次，這個民意機關的職權，究竟是誰賦予的這個問題，也常被忽視。不錯，人民代表的職權，是

選派他的人民所賦予的。但選民祇選出代表去參加民意機關，代表他們去發表他們所要發表的政見，同時並沒有規定代表們發表意見的範圍與效力。所以民意機關職權的規定，是要另外經過一種手續，纔能取得法律上的地位。取得了法律上的地位，纔能確定它的權源，纔能不至於變成一個無權的諮詢機關。

在平時，民意機關的法律上的根據，是由國民會議所制定的憲法，議會的職權是在憲法上規定好的。議會根據憲法行使職權，行政機關遵守憲法而尊重議會的職權。這是平時實行民主政治必經的程序，我們在抗戰的非常時期，自然是不必固執的要去運用這樣的程序，而且客觀上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們就不能採用另外的方法，去取得民意機關的法律上的地位嗎？

我以為爲這個民意機關，它的名稱可以叫做「非常時期國民代表會」。它的代表在第一次集會的時期，就是一個「非常時期國民代表會議」，它的任務是應該先通過一代表全民意志的「戰時政治綱領」作爲一種臨時性質的根本法。在此根本法中規定國民代表會所應行使的職權，並明定卽以出席「非常時期國民代表會議」的代表，於通過臨時根本法後，卽組成「非常時期國民代表會」，作爲戰爭時期的常設機關，而使臨時根本法——「戰時政治綱領」所賦予的職權。這樣，代表祇要選舉一次，而行使雙重的任務，因而戰時的民意機關，也就取得法律上的鞏固地位了。

「非常時期國民代表會」的職權，應該是（一）決定和戰國策，（二）確立戰時外交及經濟

政策（三）制定戰時法律（四）預算（五）彈劾官吏（六）……等。

但是爲使領袖的權力不因此而減弱起見，可以對於領袖的否決權加以較強的規定，即議案經過代表會通過後，須經領袖核准，始能發生效力。但在一確定期間內（三日或五日）如領袖不聲明理由，行使否決權，則議案即發生效力，立應付之實行。如果議案被否決了後，代表會仍得提出覆議，若覆議而仍經過四分之三代表之同意通過，則此決議即應發生效力。

我以爲這樣的規定，對於領袖的權力是不會減少的。國民代表都是與民族有生死利害關係的人民，何者有利於民族，何者於民族有害，他們在常識上已有清明的判斷。如果經過否決的議案，祇要領袖能根據客觀的事實，剴切的說明利害，就一般的情形說，這個議案大概是可以打消的。有常識的國民代表決不會漠視民族的利害，而一定要堅持與民族抗戰有害的決議案。如果已經否決的議案，而國民代表仍經覆議而得到大多數的同意的，那就是這條議案一定是民衆所希望實行的，到了這個時候，領袖祇得接受民意而付之執行。

至於代表的產生，我認爲可以由（一）各法團，（二）各救亡團體，（三）抗戰軍隊，（四）各黨派（五）各大學（包括學生及教職員）用民主的方式選出若干名的代表。人數不必過多，以二百人爲最高額。但聘請及圈定的方式，是要絕對避免的。如果出席的代表不能稱職，原來選舉的團體力該是可以撤回重選的。

我想這樣的一個民意機關，才是我們認為比較理想的民意機關，一方面比較的能代表民意，一方面又不至於減弱了領袖的權力，反而可以增強領袖的權力，我想政府是不應該再有所顧慮的。

（文化戰線）

經濟動員

怎樣運用我們的經濟武器

無 患

一 敵人對我們的經濟武器

帝國主義國家對外作戰的時候，它所用的經濟戰爭的手段，通常終不外是「獨占」和「封鎖」。就充實本身的經濟實力而言，是一切經濟（包括原料、貿易、投資等）的獨占；就削弱敵人的經濟力量而言，是已國及他國對敵國的經濟關係的概行封鎖，使敵人不戰而自斃。（如世紀初年歐戰時協約國對同盟國的施行經濟封鎖。）

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又把這一套慣技施行到我們身上來了。國交尙未斷絕正式宣戰關係尙未成立，敵人公然宣佈封鎖由長江口岸起至汕頭止的我國海岸了！

這是敵人對待我們的最厲害的經濟戰爭的手段！它的用意是杜絕我國和其他各國的通商關係，杜絕我國內由華中沿海至華南沿海的通商關係。

除了這以外，我們相信，敵人對付我們的經濟戰爭手段，就只有轟炸我國的城市，工業中心地，破壞交通。

不消說的，敵人這樣殘暴地對付我們，我們也應該還他以殘暴的手段。它們企圖摧殘我們的經濟來源和命脈，以制我們的死命；我們也應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摧殘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的托根地，並且斷絕一切物質的供給。

二 我們對敵人的第一種經濟武器

我們的經濟武器不是封鎖，我們的經濟武器也不是獨占，這兩種武器只有讓帝國主義用的。我們的經濟武器第一是破壞和沒收，足以破壞敵人在中國的經濟勢力，或者沒收敵人在中國的財產。日本在上海的經濟投資及財產，據一般估計（根據中央日報發表）共在四萬萬七千萬以上，其中紡織業達一萬萬七千萬元以上，輸出入業達一萬萬五千元，金融業達二千三百萬元，航運業達一千八百萬元，雜貨製造業達一千五百萬元。文化事業財產達五百萬元，地產業達二百萬元，其他各項投資及財產約共達一萬萬三千五百萬元。日僑在上海的私人財產，尚不估計在內。

我們對於敵人的這些財產，應該趁這時機根本加以毀壞，免留禍根。一方面可以堅強我們的抗敵的決心；同時，也可給日本在華商人對其國內黷武主義者以一種反感。在這次滬戰中，最使我們痛快的，是日本日清公司輪船五艘，完全被我擊沉，這是根本破壞工作的一端。

在華北，日本帝國主義的投資及財產共十一億五千五百萬元以上。計用借款形式的共七億三千萬元，用投資形式的共一億八千三百萬元，用企業形式投資的共二億四千二百萬元。最近與中公

司大事活躍，其資本運用額在數億以上日僑在華北的財產，不消說比上海更來得多，我們對付敵人在華北的財產，應該採取根本破壞的手段。

在東北日人的投資，更難有正確的統計了，據估計，當在十四億元以上。我們也應該設法去破壞它們。

至於日人在華中的經濟勢力，我們應該無情地宣告沒收。

三 我們對敵人的第二種經濟武器

我們對敵人的第二種經濟戰爭的武器是堅壁清野，最好要做到讓日本帝國主義的劊子手，在中國境內不敢拿一點水喝的地步。換句話說，便是以嚴密的組織力量，對敵人施行斷絕一切供給。現在我們所感到最痛心最可怕的，是漢奸的到處密佈，這些漢奸，主要的却是官吏、奸商、豪紳、地痞，爲澈底地肅清漢奸計，我們單靠馬路上來糾察糾察，是不夠的，我們應該要求政府，立即公佈對付漢奸的連坐法及聯保法，一經究明確實，連保證人及介紹人，甚至關係最密切的宗族親戚，亦應同樣處以重刑。同時，更以組織的方法，斷絕敵人在我們領土內的一切供給。這樣才能使敵人感到極大的不便，而我們則能運用人民的組織力量，地理的熟悉關係，分頭殲滅敵人的勢力。

四 我們對敵人的第三種經濟武器

第三種經濟武器不在國內運用而應該在國外設法去運用。運用這一手段的方法，是喚起全世界

界人士對我們的同情，使更堅強地樹起一種對日經濟不援助，抵制日貨的廣汎運動。近年來，全世界無形中已築成抵制日貨的壁壘，在全世界六十餘國家中，有近三分二的國家，是限制日貨輸入的。我們更應該普遍這一種宣傳，揭出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世界和平的威脅。

讓我們趕快運用我們的經濟武器，制敵人的死命！

（抵抗）

保證抗戰勝利的經濟條件

姜君辰

怎樣保證抗戰的最後勝利，這是在全面抗戰已經開始了的今天，最最基本的迫切的嚴重問題。現代戰爭中最基本的一個特徵，便是經濟上的動員要跟軍事上的動員取得密切的聯系，而且要使一切經濟條件，對於軍事方面的需求，能夠應付裕如。所以，怎樣在經濟上來保證我們持久的全面抗戰的最後勝利，確是當前最值得我們研究探討計劃而促其實現的一件重要工作。

在經濟上保證抗戰勝利的條件有三個：

第一要實施戰時統制經濟。一般說來，統制經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獨佔資本的產物。但在我們的全面抗戰中需要施行的統制經濟，它的性質却與前者有個根本不同之點。這就是說，前者是在謀取獨佔資本的利益，是在給與軍火商以更優越的利潤，而大多數民衆所能獲得的代價，却祇是爲少數人在火線上的犧牲和在後方的飢寒交迫。但是我們實施統制經濟的性質和目的則完全不

同，在前方英勇犧牲的抗敵將士，是爲了整個民族的生存，爲了全國民衆的福利，同時在後方動員的民衆，也決不是爲了少數人的利益，而同樣是爲了整個民族和全國民衆的利益。因此，凡是於持久抗戰有利的任何經濟設施，都可以用統制經濟的姿態，來堅決執行爲全民族全民衆謀利益的這個最高原則。

第二要厲行對日經濟絕交。日寇幾年來所高唱的中日經濟提攜，本來只是它「笑裏藏刀」的一種侵略政策，今天則已由它的一切暴行揭露無遺，所謂「圖窮」而終於「匕首見」了，我們當然不會再對它有絲毫的幻想。不過，爲了杜絕過去贊成中日經濟提攜者的最後一絲念頭起見，斷絕一切對日的經濟關係，是有立即厲行必要的。何況這樣一來，我們不但可以沒收日寇在華的一切財產，停付對日的一切債務，用來充當抗敵戰費，而且可以對英美法蘇等及其他友邦，積極表示我們抗日的決心而藉以鼓勵它們對我們作經濟上的援助。

第三要嚴格執行「有錢出錢」「有大錢出大錢」的原則。「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一句話，的確是我們全面抗戰中需要全國總動員的一個最精練而最通俗的信條。但是要使這一信條之徹底而全部的實踐，却有兩點是必須補充的。一方面我們覺得單是有錢出錢還太嫌不夠，而非再進一步做到「有大錢出大錢」的原則不可。很明顯的，在事實上，直到今天爲止，所謂「有錢出錢」這個原則，恐怕大部份還祇做到了「有小錢出小錢」的程度，或者至多只有一小部份做到「有大錢出

小錢」的地步。至於真能夠得上「有大錢出大錢」這個條件的，可以說還是絕無僅有的事吧。然而，誰都承認，假如不要全面抗戰到底那也罷了，假如真要使全面抗戰堅持到底，那末非使「有大錢出大錢」這個原則，做到不折不扣的程度不可。因為祇有這樣，前方日益增大的軍需，才有源源不絕供應的可能，後方愈益增多的難民，才有做到充分「有力出力」的可能。

根據着上面三個基本條件，然後我們才能就各個經濟部門，來說明足以保證抗戰勝利的若干條件。

財政金融 戰時財政支出的需要，巨額膨大，乃是必然的現象。怎樣才能適應這種突然膨大的支出，我們以為祇有兩種辦法。一面要使行政費用合理化的緊縮，即使過去領乾薪或辦公不力的人應該完全裁撤，並按每一公務員（及其家屬）的實際生活負擔而酌量降低他的收入。另一方面，則應想盡種種方法，在使「有大錢出大錢」的原則做到十二分的程度。例如按照嚴格累進稅的辦法，積極進行遺產稅地產稅和所得稅的徵收，甚至現在已經發行的救國公債，也可以酌量採用這個原則去勸募。至於在金融方面，則以力求安定而膨脹信用為主要原則。要求安定，當然首先要使資金的逃避行為完全絕跡，特別是外匯的統制依然非常必要。說到信用的膨脹，當然是指有條件而有限制的膨脹而言。凡是與全面抗戰有直接間接關係的企業，應該儘量給予信用上的便利。因為祇有這樣，資金的順利流通，才能在金融安定條件之下，擔負起推進國防民族工業的任務來。

輕重工業：無論輕工業或重工業，我們都歡迎愛護和平各友邦的投資，不過所有的重工業都應該歸國家來經營。政府對於任何工業部門（除開製造奢侈品部門以外）都應給予遷移內地比較安全地帶的種種便利，例如搬運廠基廠房等。不但如此，政府對於重工業的設置，固應當由政府全權辦理，即對於輕工業的遷移，最好也應該是相當有計劃地分配到各地去。總而言之，政府對於民族工業的發展，在不違背戰時財政計劃的條件底下，是應該予以種種便利和援助的。不過，在這裡我們所要特別注意的，即所有被僱傭的職員和工資勞動者，不但應該規定他們的最低工資率和最高工作時間，而且應該盡量改善他們的生活，特別是在國防工業部門內的勞動者。因為祇有這樣，才能使他們在多方面做到十二分「有力出力」的地步。

農業：在全面的持久抗戰期中，農業部門的重要性，並不亞於重工業。這不但是爲了糧食和原料生產應該力謀自給而達到自足的地步，所以要使農業生產儘可能的增加，農業生產技術要在可能範圍內加以改良。目前更重要的，却在使全國農民都能自發而積極地來參加抗敵工作。因爲在持久的抗敵戰爭期中，軍事實力的補充既是萬分必要，而佔有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無論如何是將來補充軍事實力的最主要的來源。不錯，農民的意識一般說來是特別來得頑固保守而遲鈍的。所以，爲使農民們能自動地積極地來參加抗敵工作，除開應該加緊對他們的宣傳和訓練而外，最重要的却更在於解除他們所受的種種束縛（例如高利貸債務，和苛捐雜稅等）減輕他們所有

的負擔（如災荒時期的欠租和高額地租等），改善他們在幾年來農村破產中所受的種種痛苦，而使他們有餘力來接受政治訓練和軍事訓練等。當然，這里所說的農民，是指大部分的佃農貧農而言。至於地主和富農，除開獎勵他們增加農業生產以外，他們所有農產品的出售，固然應受政府統制價格的節制，他在戰時財政計劃底下，是應該負起「有大錢出大錢」的任務來的。

國內外貿易：由於敵人對我們沿海各地的封鎖，爲了適應我們持久抗戰中的需要，我們過去的國內外貿易，是不得不加以大大的改善的。在對外貿易方面，除開我們對日的進出口貿易應該完全停止以外，我們是歡迎其它各友邦的進口貨物的。不過在這里，整個的進出口貿易是需要政府來加以統制，而進口貨物中奢侈品我們是必要加以限制的。至於在出口方面，則所有過去大部分是輸出的糧食原料等，今天就非加以限制或禁止其出口不可。祇有那些對於我們有特別的物質上的援助的國家，我們才可以拿一部分的原料，輸給它們作爲友誼上的交換條件，而這些原料大部分也祇能以我們自己落後的工業技術所無法應用的貨物爲限。至於國內貿易在抗戰期中最主要的條件，即在使過去地域性的現象（例如一種貨物在某地是量多價賤，在另一地方是量少價高）應該完全克服過來而消滅它，同時在物價方面應該絕對制止抬高價格的事情發生。

假如上述各點都能切實做到，那末我們可以說，保證抗戰勝利的經濟條件大部分是具備的了。但願政府當局和各界人士努力促其實現吧！

（世界知識等聯合旬刊）

怎樣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

陳獨秀

我們的軍事力量，我們的一切物質力量，是打不過敵人的，我們可以打勝敵人的，是我們的民族精神，全民族一致起來，不做奴隸的偉大精神。

這種偉大的民族精神，不是空口說大話，而要有具體的事實表現，這種具體的事實表現，就是除了漢奸以外的全中國人民「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在堅決抗戰到底的政府領導之下，對敵人作戰，這是我們勝利之最大的保障。

假如我們有錢者能拿出十萬萬現金，有力者能拿出千萬壯丁，不待戰事結束，已足夠使敵人氣餒，無法繼續對我們作戰了。

大家萬萬不要笑我說大話，十萬萬現金，一千萬壯丁，實實在在能夠拿得出的。

或者有人說：自抗戰開始以來，「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這兩句話，在街頭巷尾都看見了，聽見了，可是誰出過多少錢，誰出過多少力，何以至今還不大看見聽見呢？我以為這是因為大家還沒有指出怎樣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之實行條件。

要使有錢者出錢，首先要問：誰是有錢者？頂有錢的是在外國銀行有大批存款的人們，我歸約起好幾個銀行界朋友的談話，中國商人存在匯豐麥加利等等銀行的款項，至少有一百萬萬元，如果政

府下一個決心，最客氣最少也可以請他們拿出十分之一卽十萬萬元來，購買救國公債，萬一不及此數，再加以農村富戶的窖藏，婦女首飾，及一般國民的獻金，十萬萬元是可以辦得到的，這個數目已經比政府現在發行的救國公債額加了一倍，而且都是現金，政府有十萬萬現金做準備金，便可以加印二十萬萬法幣，決沒有通貨膨漲後物價高漲和外匯跌落的危險。政府拿這二十萬萬元，一半加購軍火，一半助後方的紗廠，大小規模的織布業和運輸業，這樣一來，抗戰的勝利可以說有了一半把握。如果把「有錢者出錢」變成「無錢者出錢」，把救國公債的負擔，加在僅能養家活口的小職員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負各種捐稅已經困苦不堪的農民身上，若再加以不肖的官吏士劣藉此從中敲詐漁利，此不獨政府所得有限，且會因此造成後方可怕的危機。前天武漢日報「擴大獻金救國運動」一文中所說：「尤望顯宦巨富……出其所有，以身作則爲國民倡。」「勉力濟助政府者，多爲生計困難，節衣縮食之平民，而擁資鉅萬之人，反不數數觀。」這幾句話真是切中時弊之名言。

誰是有力者？當然是農村和城市的壯丁，要使壯丁出力，必注意兩個條件：第一，必須使他們有自動參加抗戰的情緒，不可依靠拉夫形式，拿繩子牽着來強迫服役，這種強拉來的壯丁，數目必不能多，不夠用，而且無論在前方或後方，均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送往前方補充兵額，比募兵更壞得多。在後方強迫徵兵和強派公債合起來，更會造成農村中可怕的危機。前天有一位黃埔出身的青年軍人，和我談到這一問題，他也承認強拉壯丁的危險，他也承認經過廣大的羣衆宣傳而招募的兵，比有名

無實的徵兵要好得多。第二，壯丁必須使之成爲有政治教育有自動活力的羣衆組織，有了這種組織，補充前方，保衛後方，都根本不成問題，尤其重要的是以游擊隊的形式，擾亂敵人後方，即令敵人利用近代武器占領了我們的大都市，而不能夠統治我們的全部領土，這種效果，當然不是簡單的強拉少數壯丁所得到的。據好幾個從河北來的朋友說：「政府這幾年，在河北各縣的壯丁訓練，是有了成績的，可是缺少政治教育，未能成爲有自動活力的羣衆組織，我們的軍隊從平漢津浦一撤退，各縣縣知事和警察一挾款逃跑，壯丁們便無人統率召集，一時羣龍無首，又沒有自行集合工作的習慣，敵人委派的縣知事和維持會一到來，已訓練好的壯丁，大多數都變成了敵人的力量。」他們說到這裏，都幾乎聲淚俱下！像這樣有力者爲敵人出力的可悲現象，是絕對不應該再使之出現的了。現在南方十幾省，每省以百萬壯丁計，能夠有一千多萬人，再多少的武裝起來，政府手中若有一千多萬武裝的有政治教育的有自動活力的壯丁，前方後方的問題，那一樣不能解決呢？

如果在現在的民族危急中，有錢者不出錢，有力者不出力，將來亡了國，大家都一樣要做奴隸，要受敵人的殘酷蹂躪和東北四省及冀察綏人民所受的一樣！

如果政府得到人民二十萬萬元和一千萬壯丁的援助，不但能夠打退站在眼前的敵人，即全世界各大強國，也永遠不敢小視我們中國人了！

抗戰時期的財政問題

周憲文

我們固然知道中國是一個弱國，弱國需要長期的和平，不應講什麼戰爭，但是九一八事變以來的環境，顯然不許中國有長期的和平，中國要求長期的和平，祇有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前，淪為它的殖民地，所以中國要求和平，自有一個限度，超過了這一限度，就得奮起抗戰，雖然明知這一抗戰會給中國以很大的損失，但為避免不戰而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起見，這一萬不得已的抗戰，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兇焰，愈弄愈烈，「神聖不可侵犯的」抗戰，已經開始，中國當此抗戰時期，在財政上究應如何處置，確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不過我們要答覆這一問題，首先必須估計中國對於這次戰爭究需若干費用，這關係戰事的範圍與戰期的久暫，在戰爭沒有結束以前，勢不能有精確的估計。如以歐戰為例，則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英國共支戰費四·一四二百萬鎊，法國共支戰費六六·〇七六·三九六·八三〇百萬法郎，德國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共支戰費三〇·〇九一·六四二百萬馬克，俄國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共支戰費二三·四五八百萬盧布，其為數之巨，乃至可驚人。這樣可驚的巨額戰費，自非中國目前的經濟能力所能勝任，所以有些「老成持重」的論者，認為中國簡直沒有參加現代戰爭的資格。這種「老成持重」的言論，實為「敗北主義者」的哀音，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毒素，他

們沒有知道中國的抗戰是出於萬不得已，他們沒有知道兩國戰爭的勝負，有關於世界各國的態度；他們沒有知道「窮人亦可窮幹」的道理，他們更沒有知道帝國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的戰爭（歐戰）乃與半殖民地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的戰爭，性質根本不同。然則，中國的戰時財政，究將如何籌措？當然，在理論上這不出於「開源」與「節流」的兩種方法。前者係謂增加財政的收入，後者係謂減少財政的支出。我們要在戰時增加財政的收入，首先必須知道中國平時的財政收入，我們要在戰時減少財政的支出，首先必須知道中國平時的財政支出。茲請分別言之。

中國平時的財政收入，以本年度的預算為例，約計十萬萬元，如與歐戰時英法德俄各國所耗的戰費比較，自然相差很遠；但是因爲一在戰時，一在平時，兩者的情況完全不同。現在的問題是在中國到了戰時，每年的財政收入究有多少的增加？可能性爲要答復這一問題，勢不能不一窺中國財政收入的内容。如以本年度的豫算爲例，中國的財政收入，以關稅、鹽稅及統稅三者爲最多，即關稅占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六·九〇，鹽稅占總收入的百分之二二·八五，統稅占總收入的百分之二一·七五。三者合計，共占百分之七十七·二。這種情形，不獨本年度如此，可說歷年皆然。以上所述，是中國平時財政收入的情況；至於中國平時財政支出的概況，如亦以本年度的預算爲例，則其數字仍爲十萬萬元。現在我們所應注意的是：中國當此抗戰時期，每年的財政支出，究有若干部份可以節省，可以拿這節省下來的經費用在戰事上面。爲欲答復這一問題，自亦不能不一窺中國財政支出的内容。按中國平

時的財政支出向以軍務費與債務費爲最多，在本年度，軍務費占總支出百分之三九·二二，債務費占總支出百分之三二·四五，兩者合計共占百分之七一·六七。

中國平時財政的收支情形既如上述，然則在此抗戰時期，其情形又屬如何？茲姑由支出方面說起。中國平時的財政支出，是以軍務費與債務費爲最多，在此抗戰時期這些費用究竟可以減少多少？這就是所謂「節流」的問題。關於這一問題，我個人認爲：這與中國的戰時財政並無十二分重要的關係。因爲中國原是一弱國，各種設施都還沒有走上軌道，每年的財政收入，比較各先進強國，固屬「嗟乎其後。」就是每年的財政支出，比較各先進強國，也是「渺乎其微。」況且在此抗戰時期，軍務費不獨不能減少，反將大大增加，債務費固然可以免支，但在整個戰時財政看來，亦祇有「小補」而已。餘如文化費，黨務費及內務費等，縱可減少若干，但對戰時財政，真有如「滄海」之與「一粟」，所以中國的戰時財政，固亦需要「節流」，但是尤須「開源」，這就由支出方面講到收入方面。中國平時的財政收入是以關稅、鹽稅及統稅爲最多；到了戰時，這些收入究竟可以增加多少？這就是所謂「開源」的問題。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此抗戰時期，這些稅收，不但不能增加，結果反會減少。何以呢？這事情很明白，中國的海口被敵軍封鎖，國際貿易大受影響，關稅收入勢必減少；餘如鹽稅與統稅，亦因中國的產鹽區域與棉紗、麥粉、捲菸、火柴、水泥、啤酒等廠，大多接近戰區，結果必因戰事而影響稅收。

這樣說來，在此抗戰時期中國的財政不免很困難，但惟其困難，故得另想辦法。這辦法普通不外乎三種，一是增加租稅，二是發行公債，三是通貨膨脹。先說增加租稅。政府新設之所得稅及擬辦之遺產稅，固無論矣，時人所提倡之徵收地價稅或土地增值稅，以及戰時利得稅或整理田賦等，均爲增加租稅的辦法。按所得稅與遺產稅的徵收，在現在經濟組織之下，即使拋開戰時財政不說，也是表示租稅制度的進步，而應當舉辦，但若謂中國戰時財政可以所得稅與遺產稅來挹注，那就是一種不明事理的幻想。這理由極爲明顯，因爲實行所得稅與遺產稅的條件，中國尙未完全具備。徵稅之國際的及技術的困難，還不能完全克服。再如地價稅或土地增值稅，其實這也不是在戰時謀增加稅收的好辦法。因爲戰事一經發生，平時昂貴的都市地價勢必一落千丈，影響所至，鄉面土地，亦將跌價，根本就無「增值」可言。至於戰時利得稅，這固然可以舉辦，而且愈該舉辦，不過因爲中國的軍需業不大發達，所謂「戰時利得」的數額，恐怕不多。比較可以徵集大宗款項者，還是整理田賦（田賦現屬地方政府的收入），但是，這也有一先決條件，就是戰事能夠持久。否則緩不濟急，於事無補。此外，有些租稅的自然增收，倒是值得一提的。例如鹽稅與統稅，雖因沿海各地鹽場與工廠的被占或被燬，而致這些地方的鹽稅與統稅所有減少，但在同時，內地的鹽場與工廠，由於需要的逼迫，將比平時來得發達，結果就可形成租稅的自然增收（專就內地這一部份而言）。

其次講到發行公債，這可分爲兩點，一是內債，二是外債；無疑的，不論內債或外債，發行公債總爲

中國戰時財政的一個主要收入申而言之，在外債方面，我們爲了要維持國家民族的生存，願意接受比較苛刻的條件，向外國多募集；關於此點，孔財長這幾個月來的努力，已經獲得有相當的效果；又在內債方面，五萬萬元的救國公債，早在勸募。雖然成績並不十分優良，但這不是因爲人民缺少負擔的能力，乃因勸募的程序尙欠考慮。再次講到通貨膨脹。論者每謂中國通貨膨脹的基礎業經築成，問題祇在通貨膨脹的危險太大，不得不慎重將事，因而主張實行有限制的通貨膨脹。但在我個人看來，如果通貨膨脹係指濫發紙幣而言，則歐戰時德國的馬克可爲前車之鑒，危險性之大，不言可知，至謂實行有限制的通貨膨脹，則限制的標準何在？實成問題。要知戰事一經爆發，通貨之趨於膨脹，勢所必然。如果戰事延長下去，而別無充分的收入可資挹注，則通貨必愈膨脹，而甚至於濫發紙幣，故有限制的通貨膨脹之論，在平時猶屬可通，在戰時則少可能。總而言之，在戰爭狀態之下，通貨膨脹是一必然的趨勢，這不是籌集戰費的特殊計劃。

現在抗戰已經爆發，最可能而且最有效的籌措戰費的辦法，祇有「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的十個大字。這又可分爲自動與被動的兩方面來說。在自動方面，凡有血氣之倫，不論貧富，無不知道這次的抗戰，是我國民族的生死關頭，「毀家紓難，一人同此心」，有力的人，自動參加服役，有錢的人，自動解囊輸將；（至於達官的財產，尤須儘先盡量貢獻，藉示提倡）後者固可直接增加國家戰時的收入，前者亦可間接減少國家戰時的支出。再在被動方面，國家如果需要夫役，固不妨強制徵調；如果

需要財物，亦大可強制徵發。至於漢奸的財產，尤須儘先盡量沒收，藉儆奸徒。這些方法，似乎有點「過火」，其實不然，因為這次抗戰，祇要當局領導得宜，大多數的人民一定會自動的「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縱有一小部分故意逃避，但因目前的中國，還有所謂「封建殘餘」的特性，強制的徵調或徵發，並不是一件奇怪或可恥的事情。

在此關係國家民族存亡的抗戰時期，「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是財政上籌集戰費最可能而且最有效的辦法；當然，我們爲欲加強這一辦法的可能與效力起見，尤其喚起民衆，組織民衆；祇有民衆的覺醒，才是半殖民地國家戰勝帝國主義國家的唯一關鍵，亦才是半殖民地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戰爭時能夠籌集戰費的唯一把握。

(申報)

論戰時金融

章乃器

戰時金融是什麼？簡單的說，是用金融的力量，去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應敵。詳細點說，是（一）節約私人的消費以充實戰爭的經費。（二）節約商業資本以充實農工業資本。（三）節約非國防工業資本以充實國防工業資本。（四）維持物價，穩定匯價，保護金融機構以增強抗戰力量。

根據這個原則，我們就可以明白，戰時金融決計不是很機械的提出「膨脹」或者「緊縮」的名詞就可以概括一切的。戰爭時期通貨應有適度的膨脹，那是沒有問題的。但決不是一般人想像中

的濫發紙幣方式的惡性膨脹，而是有意義有辦法的膨脹。也決不是籠統普及的膨脹，而是膨脹之中要有緊縮的。

先就國家和人民間的關係來說自然是國家的財政要膨脹，而人民的用度要緊縮。但是，就在國家財政當中，除了軍事費和國防建設經費必須大量膨脹外，一般的行政經費也是必須要緊縮的。

其次，就生產和消費的關係來說，自然是生產的方面要膨脹，而消費的方面要緊縮；就商業和農業的關係來說，自然是農工業的方面要膨脹，而商業方面要緊縮；就沿海口岸和內地的關係來說，自然是內地應該膨脹，而沿海口岸應該緊縮。所以說到農工商業，那情形是更爲複雜，而處置更要精密。比方，雖然我們應該在農業方面膨脹，但也只能鼓勵食糧生產，而不能過分鼓勵旨在供給海外市場的棉花生產，更不能鼓勵鴉片生產，就是食糧，也不能無條件的供給商人以資金，使他們可以大量囤積居奇。而只能在國家管理食糧法令的範圍之內，准予受押，對於工業和礦業的通融，除了依照國防是否必需的條件安排先後次序以外，還要視其所在地是否爲安全地帶，而加以區別，甚至一般商品的受押，也不能達此標準，像過去把全國工業集中在上海，把軍需用品也集中在上海，那種狀態，是不能讓他繼續的。

要之，在膨脹的方面，消極的要不要浪費國力，積極的還要能增強國力。在緊縮的方面，消極的要不要消耗民力，積極的還要能積蓄民力，我們要在戰時金融國策之下，鞏固國防，動員生產，使全國人人有

工做有飯吃，使壯了個個配稱壯了，兒童個個會成爲將來的壯丁，那才能持久抗戰，而取得最後的勝利。

自然，這一個偉大的計劃，是不能一朝一夕實現的。我們祇能希望一步一步的做。在開始做的時候，一時的紊亂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也祇能一件一件的補救。我曾經說過，戰時金融政策已經開始實施了。這個實施的程序，是先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把平時漫無限制的膨脹的門戶，一齊先閉塞了。然後，再依照國防的需要，一道一道的重新開啓。應該開啓而原來沒有的，我們祇可開闢新的門戶；原來有而不合用的，我們祇可就此不開，倘使說戰時金融的話，我敢說各國的先例都是如此這般，至多祇是時間上有一些遲早之別罷了。

從上月十七日開始的限制支付，到旬日以來由開放內地貼放而開放小額存款，而開放典當存款，再到最近擬議中的酌量開放本埠工商業貼放，我們不能不說財政金融當局正在逐步執行這正常的戰時金融國策。自然，在限制付款過程中，許多人會感到不方便。但是，我們也得想想，倘使不如此，金融機構能夠到現在不發生破綻嗎？物價的高漲，能如此而止嗎？資本不又已經大量逃避嗎？至少過去三星期中的金融國策，已經完成了大部分的消極任務。那就是，保護金融機構，節約個人消費，限制物價飛漲，和阻止資金逃避的任務。我們必須明白，從平時金融轉變到戰時金融，一些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別的國家的經濟恐慌時期都要停止支付。我們當這樣的空前難局，難道還不該有一個限制付

款嗎？我們既然不惜任何犧牲準備抗戰到底，那末，這一些痛苦，除了咬緊牙關忍受以外，還有何說呢？我們且再想一想。目前前方將士是在過怎樣的生活，後方難民又在過怎樣的生活，我們對於這一些身受的痛苦，難道還不應該甘之如飴嗎？尤其在上海的人，這時候必須放大眼光，看到上海在整個國防中，是處在如何的地位，想到今後，有沒有我們安居樂業的時候，再判斷在戰時金融的意義之下，我們應該不應該祇顧到一隅的利害和自己的事業，而要求在上海施行膨脹。時代空前的激變了，我們還能保持平時苟且偷安的心理嗎？

爲了感受到限制付款的痛苦，使主張澈底開放付款限制；爲了要補救開放付款限制以後資本逃避的危險，便跟着主張統制外匯和發行流通券；簡單的說，目的祇是要求一個膨脹。我更要鄭重的指出開放付款限制的危機，並不僅是資本逃避，而同時是個人消費的漫無節制，物價無限制高漲，和金融機構的發生破綻，破壞戰時金融則有餘，回復到平時金融則不足。所以，這種主張，在方法上是非驢非馬，在結果上必然要進退失據。

外匯應否統制，流通券應否發行，那是另一問題，但不能以統制外匯和發行流通券做澈底開放付款限制的手段，卻是鐵一般的至理。因爲戰時金融根本就不容許澈底開放付款限制。但是，只要付款限制不撤銷，外匯一時就沒有統制的必要。將來，只要華僑能夠踴躍承購救國公債，只要民衆組織一天一天的嚴密起來，能夠檢舉購買外匯者而課以新頒的重典，統制外匯也許根本不需要。到是在

目下高倡統制外匯，反足使華僑匯款承購公債者裹足不前，忘記了通貨膨脹對物價的影響，而主張發行流通券，尤其是萬萬不可。這兩個問題，內容很複雜，且俟將來詳加論列。

對目下金融國策不滿的論調，大概有兩種，一種是根本反對限制付款的，一種是認爲限制付款以後的積極開門工作還不夠的。前一種是錯誤的，上文已經檢討過了。後一種是必須重視的，然而我也有一點意見，我們應該迅速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應敵，這個原則是誰都同意了。那末，我以爲感覺目下金融國策積極性還不夠的人，還是應該從大處着眼，趕快提出一個全國動員的方案，請求政府採納。再依據這個方案，有條理有步驟的發動金融力量去執行動員以充實金融國策的積極性。沒有一個具體的方案，而只是枝枝節節的要求積極性，即使有一些效果，也不免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弊病。讓我們多多注意全國動員的整個方案，而暫時少談局部的金融問題吧。

（申報）

戰時工業問題

孫懷仁

我們目前的要圖是應該研究如何趕快把這個貧弱的中國工業，轉拗過來，讓牠能適應於抗戰。爲要解決這個嚴重而又急需的問題，我們以爲應該由兩點入手，一方面是想法子能保全目前這貧弱的工業基礎，利用之於軍需；另一方面是以最大的努力，趕緊建立起一些最低限度的國防工業。這兩點，可以說是問題的兩面，單有一方面是不夠的，同時，這兩方面又必須要有一個統一的計劃，然後實行起來纔會發生效果。這一個統一計劃的樹立，我們覺得有下面這三個最基本的問題，是應該首先解決的。（一）我們要生產些什麼？（二）在什麼地方生產？（三）如何生產？這三個問題，可以說是目前決定工業計劃的骨幹。這不問對於新國防工業的建立，或是對於原有工業基礎的保全，都具有着很密切的關係。換一句話說，這三個問題假若不解決，新工業的設置固然不易着手，就是目前盛唱的沿海工業移向內地，也就無從實行。即以上海一地而論，工業既不僅一種，大小廠家也有數十百家，說到遷移，自然不是一句話可能辦得到的。那些工業應該先遷？那些工業可以後遷？那些工業

應該遷到什麼地方去？那些工業又應該遷到另一個什麼地方去？倘若這些問題不解決，祇是亂遷一番，那不僅是不經濟與不合理，甚且對國防上不會發生什麼效果的。

關係那三個基本的問題，一切詳細的與具體的計劃，事實上有關國防的機密，我們未便公開的有所發表，不過對於解決這三個問題的原則，我們似乎不妨提出些意見來說說，這個假若可以作為政府的參考，固然頂好，否則，容或也許會因為這粗淺的意見，引出了大家更精詳的方案。

(一) 現在我們要生產些什麼的這個問題，不消說最重要的是軍需品，其次就是動力運輸器械，原料機械及半製品等。現在我們的抗戰，大都限於陸地，因此，所謂軍需品可以說是下列的幾種，即兵器（機械兵器及化學兵器）、飛機彈藥軍用燃料、被服及糧食、軍用建築材料、軍用衛生材料、獸醫材料、軍用通信用物件，以及修理上述各項物件的材料、器具、設備。這些東西之中，除掉飛機及新式兵器以外，勉強都還可以「急時抱佛脚」的。現在全國所有兵工廠，大部分在內地，步槍、機關槍、彈藥的製造，大概可以不生問題，這裏要改進的，就是加大生產的能力。其他有些軍需品的製造，一小部分可以用原有的工廠，一部分可以把類似的工廠改造，為符合這個目的起見，我們對於沿海已有的下列各種工業，主張首先遷移：(一) 機械工廠及翻沙工廠。(二) 化學工廠。(三) 纖維工廠。(四) 製藥工廠。(五) 電器工廠。(六) 賽璐珞玩具工廠。(可改作炸藥)。(七) 棉毛織物工廠。(八) 麵粉工廠。(九) 水泥工廠。(十) 火柴工廠。此外，在最短期間以內要新設的工廠，也還很多，主要的如

通信及交通機械製造工廠、電線製造工廠、硬化油製造工廠、代用燃料製造工廠、鍊鋼工廠等，這些都是與軍需有莫大關係的。

(二) 關於工業的地域問題，一般的講來，自然必須要符合幾個條件，第一個是要原料取給便利，第二個是要交通運輸便利，第三個是要勞力獲得能充分。這三個條件，在今日抗戰的時候，我們自然還須顧慮，不過，我們不能同昇平的時候一樣可以慢慢的分散的選擇。換一句話說，我們對於地域的選擇，不但要符合這三個條件，而且要符合便於統制的一個條件。因為戰時的工業，第一要適應於國防，至於個人營利的打算，是要置於次位的。在這裏，我們主張把全國劃成幾個工業管理區，而這個工業管理區，又必須與軍需區域有着密切的聯繫。在每一個工業管理區中的工業，分爲兩類，一類是因爲特殊原因（如因原料關係或技術關係等）的特有工業，另一類共通工業。這種共通工業，平均分散於各工業管理區，這樣不但可以就近供給產品於各軍需區，而且也可以避免集中的爲敵人所毀壞。同時每一個工業管理區，可以設立一個管理機關，分配各項軍需品生產量於各工廠，這樣使生產量既不會不足，也不會過剩。這樣的工業管理區決定以後，新設工業既可分地設置，而今日的沿海工業也可按着計劃，分別遷往各區。

(三) 第三個如何生產的問題，內容應該是包含着原料、機械與勞力的三部分的問題。關於生產原料的問題，這在現在的確是一個很困難而又嚴重的問題，海岸既已被封鎖，所以已不能全靠輸

入，因此目前所可挽救原料恐慌的，只有三個方策，第一是趕緊統制現有的原料，視需要的緩急，採用分配的優先順序制度，把原料的使用，可以分爲甲、乙、丙三級，甲級是指直接用作軍需品者，乙級是間接用於軍需者，丙級是用於無關軍需者，於是，原料使用時，就按級分配，先用於甲級，甲級有餘用於乙級，乙級有餘用於丙級。第二是利用廢物，如破銅爛鐵的重鎔，舊橡膠物件的製造「再生橡皮」，同時，還必須使用代用品，譬如以酸化鐵、鎳等代白金用爲接觸劑；以空中淡氣所製阿莫尼亞代智利硝石爲硝酸原料，以鑛滓綿代用石綿；以過氧化氫代石炭酸用於醫藥；以木炭代汽油爲汽車燃料，以頁岩油代重油；以絲代用羊毛，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也能幫助解救原料恐慌。第三是獎勵自己生產原料。這裏，關於農產品的原料，我們還可以不生問題，問題就是在鑛產的生產，尤其是鋼鐵與燃料。現在爲獎勵生產起見，對於人民的開採煤鐵鑛，不但應該像目前政府的給予以保息，同時，對於開採資本，政府銀行在可能範圍內亦應設法給予以金融上的便利。而且，中國目前已在開採的煤鐵，更應該即速擴大其規模。關於機械的問題，正同前述的原料問題一樣，全靠輸入是有些不容易了。因此，目前除掉必要而大規模的機械，無論如何只能靠輸入外，其餘的一切機械，應該趕緊自己來仿造，即令成本高一點，也沒有辦法的。此外，假若以手工可以代替機械的，那我們應該盡量利用低廉的手工，這樣結果反可以經濟些。關於勞力問題目前抗戰中人民正向後方移動的時候，祇要政府能有計劃，隨處都可以集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現在各都市熟練工人撤退的時候，不要讓它們分散，應該集團的向後移。

目前上海的遺散難民就根本沒有注意工人不應分散的原則。這裏，不但埋沒了許多有用的勞力，而且也根本不是一個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

以上所說的三個問題，祇是今日戰時工業中最基本的幾點。此外，自然還有着很多的問題。譬如說：（1）工業技術人才應該如何集中？（2）如何獎勵促進中國工業的技術？（3）戰時工業的規模應該怎麼纔是適宜？大規模呢還是小規模？（4）沿海都市工業移動時的交通問題，應當如何配置？（5）將來被敵人佔領之地的工業應如何破壞？這種種問題，目前也趕快要有一個決定纔是。

外交動員

請政府速定外交國策

胡愈之

一 外交國策是必要的嗎？

外交國策是不是必要的，這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

一個主權完整的獨立國家，必然而且必須有確定的外交國策。譬如在大洋中航行的船舶，必須有確定的航線。譬如一個意志獨立的人，對於職業或事業，必然有確定的計劃和企圖。只有一種國家，沒有確定的外交國策，就是半獨立國家，或半殖民地國家。半獨立國家或半殖民地國家並不是不需要確定的外交國策，但因為這些國家主權不能獨立，所以外交國策也不能獨立。這些國家在對外關係上頭，只好俯仰由人，讓帝國主義隨意擺佈，這樣就說不上有什麼外交國策。

但是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或者要竭力爭取獨立自由的國家，外交國策却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假如沒有外交國策，應付對外的一切事變，就沒有一個預定的方針，勢必至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但在平常時候，不能有充分的外交準備，在發生意外事故的時候，也不免手忙腳亂，倉皇失措，甚至於一切外交行動互相矛盾，互相牴觸，有外交竟不如無外交。

不但如此，在現代國家，不但國防是全民的國防，政治是全民的政治，外交也應該是全民的外交。所謂全民的外交，就是說，全國國民對於對外關係，有共同的立場共同的認識，並且以共同的行動，來作政府外交的後盾。因此也就必須預先有了確定的外交國策，才能把政府和全國國民的步調行動，完全一致起來，所以爲了內部的團結和對外的一致，外交國策的確定，也是絕對必要的。

但是另有兩種說法，認爲外交國策，並不是必要的，即使有必要，也決不能公開宣佈。我們再看這兩種說法，有根據沒有。

第一種說法認爲外交政策應該隨機應變，而不是固定的，刻版的。因此確定的外交政策，不但不能，而且並非必要的。這一種說法，是把外交國策和外交行動混合起來。外交國策和外交行動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外交國策是根據民族意志和國情來決定的。國情又包含歷史條件，地理環境和國內的政治社會制度等要素。這些雖然不是永久不變，但是斷不至於早晚不同。尤其是民族的意志，在一個相當的長時期內，是決不至隨便變更的。例如法德兩國民族相互仇視的意志，經過一百多年並沒有消滅。英國期望保持海上的霸權，經過數百年都如此。因此根據這些不變的民族意志和國情，決定對外關係的原則——外交國策，是絕對不可能的。反之根據此種外交國策所採取的外交行動，則儘不妨因時制宜，千變萬化。所以認爲外交行動應該變動不居，因此主張不要確定外交國策，這一種說法，當然不能成立。

第二種說法，認為外交當以國家利益為前提，於必要時儘不妨出以詭秘，甚至越秘密越好。要是預先宣佈外交國策，對方既已洞悉底蘊，勢將無從出奇制勝。這是一種主張秘密外交的說法。秘密外交實際上是一種帝國主義的外交。帝國主義外交的目的，是戰爭和侵略，這原為國內國外的民衆所反對，所以必須保守秘密。反之，弱小民族，或民主國家，根本上不需要有什麼秘密外交。因為弱小民族的自衛行動，民主國家的和平政策，本無不可告人之隱，只有採取完全公開的方式，才能引起全世界的同情，以增強外交的力量。要是採取秘密外交，反不免上了侵略國的圈套。至於外交機密，有時不能洩漏，但這和所謂外交國策完全不同。因為外交國策是指對外關係的原則，在這中間，斷無機密可言。所以認為外交應該秘密而反對確定外交國策，也絕對不成理由。

二 我們有沒有外交國策

外交國策是不是必要，既然不成為一個問題，現在我們要問的是：中國究竟有沒有外交國策？我們要是甘心自欺欺人，我們儘不妨說，我們已經有了外交國策。但是說一句老實話，却不能不承認，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一個外交國策。

中華民國創立已經二十六年了。可是不幸得很，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憲法；我們還沒有一個民選的代議機關；我們還沒有一個充分強大的國防軍備；甚至我們還沒有一個明白確定的外交國策。

這是並不足怪的。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以來這一百年中間，始終沒有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國最初發生對外關係是被動的，歷來中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是被動的。因此中國的一切對外政策也完全是被動的。清代末年所謂以夷制夷政策，實際上是「受制於夷」。在北洋軍閥時代，內政都受帝國主義的宰制，外交更不用說完全執行帝國主義的命令。直到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公開宣佈了對外政綱。這對外政綱的主要點是聯合全世界被壓迫民族，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可以說是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所手定的對外國策，也就是中國第一次公開宣佈的對外國策。可是在當時中國國民黨還沒有握得全國政權，對外不能取得代表全國的資格。十五、十六年，國民黨北伐勝利，南京政府成立，但國內採取反共政策，影響到外交方面，以至國民黨原來的對外政綱，不能澈底執行。十七年的濟南慘案，十八年的奉聯戰爭，充分表示出中國依然沒有確定的外交國策。在這時期中間，一面和蘇聯斷絕邦交，一面唱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高調，一面又縱容各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侵略。外交國策不確定的結果，使日本帝國主義得以乘虛而入。到了二十年，便發生了民國歷史中所未曾有的重大事件：東北四省，因不抵抗而遭喪失。九一八以後，中國最初打算倚賴國聯，以解決中日問題。後來發現被帝國主義操縱的國聯，並不能幫助中國奪回東北四省。於是在外交上竟至手足無措。甚至連抵抗侵略收復失地這一點民族自信力，都完全失掉。二三年前，竟有許多人提出「敵乎友乎」的問題。一個國家，對於直接行使侵略的國家為友為敵，

都沒有一致的認識，又從那裏去談外交國策，前幾年還有許多人爲了東京路線、莫斯科路線、日內瓦路線而爭辯着，這尤其證明了中國並沒有確定的外交國策。

因爲沒有確定的外交國策的緣故，所以一般對於外交的意見，非常紛歧，非常不一致。在這幾年以來，當局和在野方面，流行兩種完全相反的見解，這兩種見解在表面自成一說，在實際上卻把一般國民在對外問題上的最低限度的共同認識，弄模糊了。所以應該特別提出來檢討一下：

第一種見解可以稱爲無抵抗主義的外交。就是說，中國人是愛和平的，中國是和平的國家，所以一切國家都是中國的友邦，即使是直接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國家，也並不是例外。因此即使事實上是我們的敵國，我們也不能拒絕和它攜手。這種無原則無保留的『敦睦邦交』政策，實際上只是一種不抵抗主義的外交政策。這樣不但增長了侵略國的氣餒，而且認一切國家爲友邦，等於沒有一個真正的友邦，也就等於孤立外交斷不能成爲一種外交國策。

還有一種見解，可以稱之爲『自力更生論』。這在表面和不抵抗主義的外交，完全相反。而在實際上，這兩種見解却同樣的否定了外交的本質。自力更生論者，認爲一切的國家都不可倚靠，中國只有倚靠中國自己。這原沒有錯，本來一個國家都只有倚靠自己的力量，求生存和發展。可是一個國家要是不能閉關自守，便無法避免國際的關係。在國際關係中間，要是不能利用各國間的衝突矛盾，本國的生存發展也便一無保障。假如依照極端自力更生論的說法，簡直就不必辦外交，就不必有外交。

部和駐外使節。所以就整個國家的政策來說，自力更生是當然的，但是把自力更生當作一種外交國策，那就等於否定外交國策，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

三 怎樣決定外交國策

再看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宣言中所指出的「對外方針」……

「吾人始終如一之目的，厥爲對內求自立，對外求生存，即使蒙受損害，超過忍耐之限度，而決然出於抗戰，然亦祇有自衛之心，絕無排外之意。故犧牲之決心與和平之期望初無矛盾……

至於其他國際關係，自當循國際和平之路線，力謀友誼之增進。凡政治的協調，經濟的合作，必本兩利之原則，以求相互關係之日趨於密切。」

在這裏第一段說明對日關係，只指出了和平與抗戰兩者都有可能但是「忍耐之限度」在那裏，「和平」和「犧牲」的限界又在那裏，宣言裏面並沒有明白指出。至於「本兩利之原則，以求相互關係之日趨於密切」原爲一切國家對外政策的本來的任務。因此三中全會宣言雖然透露了一些政府自衛抗戰的決心，參加國際和平線的企圖，可是這些至多不過是應有的外交概念，如果說是外交國策，那是絕對不夠的。

要怎樣才能算得是外交國策呢？

第一，外交國策應該是整個民族意志的表現。一切民族都有共通的意志，就是求生存和發展。但

是除了這共通意志之外，每一個民族根據獨特的歷史地理條件，都各有獨特的民族意志。外交國策首先必須把這些獨特的民族意志，充分表現出來。不然就不能算作『國策』。比方說，英國是一個島國，英國人民有一大部分是依靠航海貿易為生的。因此保護海上的貿易道路，成為英國外交國策的基調。大戰後的戰敗國家，對於擺脫和約束縛這一點，抱着非常堅決的意志，所以修改和約成為主要的外交國策。美國由於獨立戰爭的慘痛經驗，最痛心疾首的，是歐洲國家的干涉政策，因此便以門羅主義為外交國策。沒有一個民族，沒有共同的對外意志。不顧到民族意志，根本就不成為外交國策。

第二，外交國策要和國內政策的目標一致。反之，國內政策也應竭力求和外交國策相適應。嚴格地說起來，內政和外交不過是達到一個共同目的所用的兩種不同的手段。拿法西斯國家來說，唯一的政治目的，是在發動戰爭，製造戰爭，因此在內政方面必然要實行獨裁，壓迫民衆，在外交方面必然要破壞一切保障和平的約束。反之，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對內對外，都以和平為目的。因此在國內自然傾向自由主義，在對外自然傾向集體安全主義。所以決定外交國策，必然同時應該把國內政策一併加以考慮，以免對內對外政策中間發生了矛盾和衝突。

第三，外交國策是根據各國的民族意志、國家需要和特殊國情來決定的。所以各國的外交國策，儘可以有種種不同。但是就一般的傾向來說，現代國家外交政策却不外三種原則：

(一) 孤立政策 像英美過去的外交政策，主張對一切國際關係，儘可能保持中立，或者像瑞

士、比利時那樣保持永久局外中立。

(二) 同盟外交 這是一種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主張聯合一部分帝國主義國家，以反對其他國家。同盟外交是以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人民的利益爲其犧牲品。

(三) 集體安全制度 和同盟外交完全相反。主張結合一切大國小國，共同保障和平與安全。這三種外交政策中間，孤立政策事實上已成爲過去的落後的政策。由於現代國際關係的複雜，空軍戰術的進步，無論何國，已不能以自力單獨保障本國的安全。連英國這樣的強國，也不能放棄其「光榮的孤立」地位，其他國家更不待說。因此現代外交政策原則的決定，不外同盟外交和集體安全制度這兩種。前者是舊式的侵略的外交政策，而後者是大戰後產生的和平的外交政策。

第四，決定外交政策，必須根據目前階段的國家需要，而確定一個立場：不是進攻的立場，便是防守的立場。一個國家需要內部建設或者遇到外來侵略的時候，應該採取防守的立場，而對於國際局勢主張保持現狀。反之，在內部建設已告完成，國力充實，而國家對外需要還沒有達到目的的時候，當然採取進攻的立場，要設法變更修改國際的現狀。舉例來說，德意兩國以及在大戰後受和約束縛的國家，在外交上採取進攻的立場。但是法國的外交，却始終採取防守的立場，就是維持現狀主義。

四 我們需要怎樣的外交國策

我們需要怎樣的外交國策，這本不是本文的目的。因爲外交國策，應該由政府作最高的決定，而

且要確定一種適合於目前中國需要的外交國策，決不是這一篇短文所能濟事，但是根據上節的說明，我們却可以想像出中國外交國策應有的一個輪廓。現在寫在這裏，以供一切研究外交問題者的參考：

第一，中國民族對外意志，這已經由過去二三十年以來不斷發展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事實，充分表現出來。中國民族運動的目的，在於解除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一切壓迫榨取，在使中國由半殖民地國家而成為獨立自由的國家，這一點已經是沒有疑問的，而且中國民族除自求解放之外，絕對不願意威脅任何其他民族。中國所企圖的是遠東和世界的和平。而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却是和平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中國任何時期，任何種的對外國策，都要以民族獨立自由與和平為其基礎，這是絕不成問題的。

其次說到中國的國內政策，倘使依照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政綱，目的在於建立民主共和國，同時實施社會改良政策。因此要使內政外交趨向共同的目的，我們的外交政策，就應該傾向和平與自由，而和現世界的民主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互相攜手。反之，對於法西斯獨裁國家，斷沒有發生密切關係的可能。這也是十分明白的。

第三，說到三種外交政策的原則，孤立政策本來已是過去落後的外交政策，而且中國的地理位置，國防實力，國際環境，和英美瑞士比利時都不相同，中國要是採取孤立政策，就等於自殺政策。因

爲中國即使要孤立，帝國主義決不會讓中國孤立的。除這以外，同盟外交也決不是中國所能採取的。中國不是帝國主義國家，沒有資格和帝國主義國家訂結平等的相互的同盟，假如訂結這一類的軍事同盟，就是拿自己當作帝國主義的犧牲品。因此，中國的外交國策，除了採集體安全制度的原則，別無他途，而且集體安全制度和中國民族的和平意志以及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完全適合的。

第四，中國自廣州國民政府成立，以至九一八爲止，國民黨的對外政策，採取了進攻的立場，就是變更現狀的立場。因爲當時帝國主義各國正在穩定狀態，而中國亟需恢復已失的主權，所以外交活動，集中在廢除不平等條約這一點。但是從九一八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作大規模的不斷的進攻，這時中國一面需要抵抗侵略，一面需要經濟建設，培養國力，因此在一般對外政策上，自然只有採取防守的立場，除了對於已失的領土主權，抱收回的決心外，對於其他非侵略的關係，自不妨以維持現狀爲滿足。自然，這種防守的立場，並不是放棄中國民族解放的一切基本要求。但爲應付國家民族的緊急危機起見，却無妨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工作，從緩進行，以避免陷於外交的孤立地位。

從上面所提出的幾點，我們可以設想，中國的外交國策，應該包含以下的幾個具體原則：

(一) 以對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堅決的民族抗戰爲手段，求貫徹中國民族獨立解放的目的，並確保遠東和世界的和平。

(二) 不惜一切代價，以求收回九一八以來喪失的國土和主權。

(三) 以中國爲中心，聯合英美法蘇等民主國家，促成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的建立，藉此以增強國際聯盟及其他國際和平事業的力量。

(四) 在抗戰時期內，除日本帝國主義外，其他外國在中國的權利及利益，中國暫時不要求變更現狀。中國並歡迎日本以外的國家，尤其是各民主國，給予資本援助以完成中國的國防建設。

五 結論

自從最近華北事件爆發以來，一切對於侵略國家妥洽的幻想，一切委屈求全苟安旦夕的迷夢，全被華北日本駐屯軍的大砲，擊得粉碎了。政府軍隊和民衆已一致表示了發動民族抗戰的決心。在這時候，除了軍事和政治上的加速準備外，有一件最迫切需要的事，就是對外國策的決定和宣佈。我們不能否認，我們到今天還沒有一個爲全國上下一致認識的外交國策。外交關係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我們不能永遠含糊了事。而且中華民族所要求的只是國家的獨立自由與和平，所以更應該把這些正當要求，向全世界公開坦白地提出，使國內政府與民衆對外認識獲得一致，使外國一切公正輿論對中國增加同情，更使敵人因此而寒心。總之，在這發動全民族抗戰的前夜，外交國策和憲法有同樣的重要。國民大會固然應該除製憲工作之外，同時決定外交國策。但政府却不妨在目前立即決定宣佈外交國策，等到將來，再請國民大會加以追認。總之在目前，決定抗戰和決定外交國策，都是非

常迫急的事，早決定一天，對於國家民族，就減少一天的浪費和損失！

（中華公論創刊號）

抗敵救國要厲行聯俄政策

張西曼

中國優越的文化，雄長亞洲大陸已有三數千年之久。加之，它長期地停滯在農業經濟狀況中，絕少外來優越文化作主力的觀摩、激盪，所以養成了一種「故步自封」的頑固保守的劣根性。但是，自從歐洲科學的昌明，商業資本一變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經融資本以後，藉可恥的鴉片戰爭（西元一八四〇道光二十年庚子）開了對中國不平等條約的先河，震驚了「妄自尊大」的局部迷夢。接連着各帝國主義者單獨地或聯合地對於中國節節的進攻勝利，中國呢，無疑地是着着處於屈伏、失敗的地步。近百年來，割地、賠款、瓜分勢力範圍，既得權利等等血帳，在一套的「和平」「親善」和「尊重國際條約義務」等美妙外交詞令之下，填入了帝國主義者虎狼的慾壑。可是，我們由各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利害關係的不同而各異其侵略的手段和程度中，要注意到所謂「列強」在歐戰以前，確祇有地理和歷史的條件上佔優勢的英、日、俄三國對我中華民族生存的影響為最大和最密切，其他不過是一幫「從犯」趁火打劫和較小案件的主犯罷了。所以，總理所領導的救國救民的革命運動，雖則微伴有辛亥的成功，然而仍是在國際陰謀阻變破壞之下，促成了殘餘封建勢力的利用，

流毒了十五年。同時有片馬的失陷，外蒙、西藏的獨立，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佔領膠濟路和二十七條件的脅迫，英、日分別援助袁、段反動的鉅額借款等等，在在足以證明這三國打擊中國革命完成的狠毒手段。

但是俄帝制政府因參與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促成了本身腐毒的崩潰，急轉直下，改建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勞農政權，自此世界有了帝國主義陣營和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營尖銳的對峙。在此關頭，中國仍願繼續投入環攻的帝國主義的膝下做個順民奴隸呢？還是毅然決然加入反帝的陣線以爭取國家民族獨立生存的出路？無疑地，在此種過渡的時代，中國政治社會上內在的矛盾和衝突隨時隨地可充分以發露。然而，中國覺悟羣衆對於本身解放的要求日益迫切，加上國內外帝國主義者和其工具造成了陳炯明的叛亂，我們偉大的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接受了時代的要求，奠定了國民革命的新基礎。所謂三大政策，就是達到三民主義的革命手段。它的要義，不外「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中先聯合以援助弱小民族解放自任的蘇聯；同時集中國內一切革命的力量「喚起民衆」以扶植農工大衆的利益。而三民主義的「民族」和「民權」——方面，對外在「打倒帝國主義」以求「中國的自由平等」；對內在剷除一族專制黑暗的政局，而求國內各民族在政治經濟上的自由平等。「民生主義」是要用「建立國家資本」和「保護民族資本」的方式來完成「社會主義的初步建設」。這確是我們這經濟落後的國家改造途徑中正當不移

的至理。可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勢力在民十五六居然由珠江一隅發展到長江流域。其中不免有多少行動的幼稚和誤會，一經帝國主義者和其工具的盡情挑撥離間，却阻礙了它的長足進展。不幸，內部接連着離析分崩，國計民生兩蒙巨害結果是促成了倭寇長驅入犯的機會。我們要知道，日帝國主義者的大陸和海洋政策，雖則擊蘇聯（和以前的俄國）和英、美做它的假想敵，它的最後目的，仍是在滅取全中國。日帝國主義的長存，純是我中華民族不爭氣的罪過！自始至終，我國變成了它這渺小惡毒的寄生蟲的宿主（Host）。自甲午（一八九四）戰役至今，它以略大于甘肅的一百十四萬餘方里的島國，直接間接地實際佔領我國屬地和領土，竟有本身五倍之大。而意外所得賠款、權利、財產和其他立國資源更不可概計。東北失陷後，深入冀、察，進窺晉、綏，經營西北，囊括中國沿海省區，更提出所謂「經濟合作」、「防共協定」、「這是企圖一九一八年所謂「中日軍事協定」的廣續，要中國擔任東方法西帝國警犬的義務」等亡國條件，甚至妄圖消滅我們民族精神所寄的「主戰」和賣國賊的無恥「屈膝」（見八月廿八日路透社電近衛宣言）……這類癩狗撲人的狂勃無恥，現在已由我最高革命領袖動員全國武力大張撻伐了！要滴雪四十三年來的國恥，要清算生死不共戴天的血帳，我們中國民衆自不能顧惜一切的重大犧牲，來策進最後必然的勝利！

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我國一般知識不足和意志薄弱之徒，受著小鬼的愚弄，過分重視了敵人的武力準備，蔑視了數千年的文化歷史、廣大的版圖和民衆力量。連同偉大 總理的遺囑和國

際的利害關係，也不在他們的心目中。有時竟把意、阿戰爭的結果搬作「前車之鑑。」殊不知阿比西尼亞，還是個人口僅有千萬而情形非常複雜的遊牧封建國家。它在抗戰九月餘之久，仍然失敗於內奸的夾攻。我們中國自不宜自視過分卑劣，連昔賢所昭示的殺賊勇氣都要丟掉。老大的自私的英帝國主義者對於人道正用之不足恃，固意中事。它祇以要求競爭的對方尊重它的既得權義和兢兢維護殖民地的安全為滿足。在歐洲大陸，它是怎樣地運用着法、德的衝突點來均衡大局。在亞洲方面，已有日本做了帝國生命線的敵對。它自不願中國的獨立強盛，增加它解決印度、香港民族國防和遠東市場等問題上的困難。甚至它要盡量利用中國半生不死的現殖民地地位來當英、日衝突的緩衝。就是日本要整個奪取華北，也可得着英國的默契。爲什麼呢？日本北向大陸的發展，正可紓緩它那賤價的輕工業品南侵之勢，這于英國在南洋的經濟地帶有莫大的實益。去年李滋羅斯來華，也曾誘導我們承認滿僞和經濟的合作，而交換有利于遠東英國地位的條件。不過，他在日本撮合的時候，就已由「夜郎自大」的亞洲門羅主義的日本聲明不許第三者干涉中、日的糾紛了。這事的經過很可能說明英國內在的自私觀念，絕似那哭貓兒的假仁假義啊！

由上述情形說來，英日對於中國態度，是前者重保守，後者主進攻。我們中國對於本身命運的決定，無疑地，是要格遵「總理最後的政策和遺囑」，力求和那同以社會主義立國的蘇聯樹立道義的交誼。本來我國昔賢治國的良謨，對於外交政策，嘗有兩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教訓，就是「國于大地，必

有與立」和「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列強之間，尙且要縱橫捭闔，作一時利害權宜之計，何況在弱小民族，豈能坐以待斃，所以在今日弱肉強食的世界，必須於增進各鄰國的邦交之外，樹立攻守互助的同盟國家，爲非常時期應援的地步。以往的實例且不說。歐戰後，土耳其的聯蘇聯，目的在抗敵復興（它的退保昂格拉，是在便利蘇聯的軍事接濟，並不是因丁文江所謂「退回岡察加」的不合理，）總理的聯蘇聯，是在完成「中國的自由平等。」（雖則以後未能善始善終地把握住時代的使命，却也奠定北伐統一的基礎。）法國的聯蘇聯，重在防制敵人的進攻。甚至外蒙的聯蘇聯（參看去年四月十六日世界知識四卷三期一二三面鄙著遠東情勢的蠢測）是在保障我國局部領土主權的安全和完整。我們誠能秉承 總理完成革命的遺志，在此倭寇猖獗年甚一年的關頭，雖則有忠義奮發的將士和國民偉大的潛勢力來制裁這世界文化、和平、人道的蠱賊，但如能早日和蘇聯成立了互助的共同戰線，必可從速促進日帝國主義的崩潰滅亡，而使日本的勞動羣衆和中華民族得個澈底的解放，永遠奠定太平洋和平的基礎。

惟我國以往一般對於中國國民革命的偉大使命與現實環境和蘇聯的正義立場認識不清之弊，每每受了帝國主義蠱惑之毒，對於 總理所堅主的「聯俄政策」不免多所懷疑和顧慮，甚至神經過敏樣的恐怖，是不得不略爲分析以破除他們的錯誤而促進他們的覺悟。

1 是「人家不願與我聯合」說。——這種見解，頗有「自知之明。」因爲中國政治人才的失位，

影響到整個國計民生的正當發展，積弱百年，不足自保，那有資格來高攀一般暴發戶的門第呢。不過，一般殖民地——尤其是中國——當國的人們，在俄國大革命前，絕不能存此妄想。世界上那有身為大盜式聖人（借老子語意）而以「主人公」自命的強權者願和弱昧（弱小真如比、丹瑞、挪一類國家，政治比較清明，人民各安生業，也足周旋於列強之間。）的奴隸講公理和平等呢！然而，我們不必亂舉春秋戰國封建割據時代同種相殘中鈎心鬥角的歷史污點為標榜。在近代史上，不是有意聯法勝奧和日聯英敗俄一類的好例子麼？可是我們要知道，利害有相同，而時勢已各異。這種相互利用以暴易暴的帝國主義發展方式，絕不能妄冀它們「霸道」中人的助我成功，更非我們「王道」主義者所屑效尤的。

——惟中、蘇兩國國境的綿長二萬餘里，較之美、加邊境長且一倍，單就這偉大的自然條件，已足證明兩國政治經濟關係的非常密切。何況彼此同以社會主義立國，有高尙的「自利利他」的大同理想。這種思想和精神上的契合，尤可為東西新舊兩大文明主潮的調和，產生偉大的新文化生命（民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北平晨報載譯著我們對於中俄會議應有的表示一文，早有此主張。）

至於蘇聯對我態度究竟如何，迄今不一其說。就我所知，除前述蘇聯對國際的正義援助外，近年對阿比西尼亞的獨立，對西班牙民主政府的維護，對地中海的安全，均主張積極的干涉。對於我國殺賊救亡的英勇戰蹟，更有熱烈的同情。祇要我們能貫徹 總理的革命精神，必能恢復固有道義之交。

作進一步的協調。這是我所深信不疑而敢力爲保證的事。何況，違反日本民衆公意的法西斯帝國主義的橫行，對我固爲心腹之害，對蘇也是肘腋之患，利害已相同，實可同心協力剷除這滅絕人道的敵，奠定東亞和平的集體保障。

2是「赤化的恐怖」——「赤化」二字，理不可通。照時代常識判斷，它就是「共產」或「蘇維埃化」的曲解。說到共產，據經濟大師馬克斯的見解，必要具備「全部生產機械化」和「有廣遍勞動軍」的兩個經濟成熟的條件。缺掉這種先決條件，就是共產黨來當權（如蘇聯），也祇能用「社會主義的建設」來促進經濟條件的成熟。而且全世界真正實行的期間，或者要遲到吳稚暉先生所斷定的「五百年後」也未可料。我們中國的經濟狀況呢，已經有「總理的「民生主義」和歷年實現的資料爲之說明。祇要不是義和團或貪污的頭腦，絕不必「神經過敏」地中了法西斯敵人的造謠毒計。

這裏要附帶補充的，就是有人說：「蘇聯赤化了外蒙和新疆。」或者又說：「東三省不亡于『白色帝國主義』的日本，也要亡于『赤色帝國主義』的蘇聯……」這確是片面地中了法西斯敵人的造謠之毒，而非出於理智的判斷。我們要知道，我們本身陷在「自顧不暇」的境地，我的兄弟妻子能夠得到正人君子（自然，不是騙子）的扶助來講求根本的自立之道時，我們應該對於他們的向上有至情的慰望，却不可稍存卑劣猜忌之心。這就是我們中國民族精神和 總理遺教發揚之點。我們

革命黨人更要深信，他們力量相當充滿時，必有幫助我們解決外來困難的一日。

信如第二說，豈不是世界都是敵人，總理更犯了「妄交匪類」的錯誤！不然，不然！在國際問題上社會主義（三民主義包括在內）不同於帝國主義之特點，就是它的主要使命，在扶助各個民族的文化生存和發展，決不是消滅或同化另一民族固有獨立的文化。而且自從蘇聯做了國聯柱石之一，又加上史達林的「共產主義不是輸出品」和「蘇聯不要別國寸土，也不以寸土送人」一類宣言，同時它屢次肅清反革命勢力，加強「鐵的紀律」後，國勢蒸蒸日上，一變而為反法西的陣營，已使歐、美民主國家為之解仇釋嫌，伸手商談合作。

現在倭寇在各方積極向我進攻，我國萬三千餘里的海岸線全被封鎖。太平洋對岸的美國要嚴守中立，英、法對意、德正被牽制在西戰，殖民地地中海盜案的糾紛。（這也是法西同盟的陰謀之一，我們要認清。）我們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絕不許再事「歧路旁皇」，斷送民族「自求多福」的機運。況且改編紅軍和大赦政治犯問題，已在最高革命領袖偉大人格寬容解決之下，促成全國的精誠團結。最近的將來，如何策動全國民衆，擁護最高革命領袖，實行總理「聯俄政策」，消滅世界人道正義的共同仇敵，完成「中國國民革命」的使命，要在覺悟的革命同志齊下最後的決心了！

（時事類編）

打擊敵人的外交陰謀

王亞南

敵人「二元外交」的原委及其運用

日本由其資本主義經濟的落後性與脆弱性，從而也由其政治組織的畸封建性，以致金融資本不能建立起寡頭支配，以致金融資本家階級的政治統治，處處都遭受封建的軍國主義勢力的劫持。結局在政府的對外關係上，特別在對華政策上，資本家階級的「利潤」要求，和軍閥的「勳功利祿」及「發揚國威」要求，表示了緩進與急進的參加和磨擦。這是日本的「二元外交」政策的由來。

不過，在這種分析上，我們儘管承認日本政府外交與軍閥外交的相當距離；比如，就目前戰爭的情形說，我們儘管肯定日本金融資本及其直屬政治系統及文化系統的反戰爭動態和要求，但我們却不能因此就忽視它對於這「二元外交」政策的統一的狡猾的利用。

讀者想未忘記「九一八」事變當時的情形：「九一八」事變的發動，無疑是日本軍閥的主謀。最能體現日本金融資本意圖的當時民政黨政府，大體的持着反對立場的。但對華侵略活動既經發動後，軍閥的那種積極冒險政策，不但爲政府所支持，政府甚且運用它與軍部之間的某種對立，作爲其緩和國際空氣，打開外交僵局的的手段，即當時日本政府一方面任軍閥在中國東三省擴大軍事侵

領，一方面則向世界直接間接傳出似是而非的淆惑聽聞的消息。表示那種武力活動，全是出於一部分少壯軍人的企圖，使各國把日本政府的責任減輕，並使各國認定操切的制裁步驟，將激動日本國民公憤，致政府更失其駕馭軍人的權力。在各國對遠東政策徘徊不決的當中，這種外交戰略能收到莫大的效果。在實際，日本輕易奪取了東北三省，這不能不說是它的成功祕密之一。此後對於熱河的佔領，對於華北各省的特殊化，一部分都由於它在或隱或顯的運用這祕訣。

不過，日本狡獪運用這外交手段或祕訣的對象，並還不僅是在遠東有利害關係的各國，同時還有其對手方的中國。因為中國方面在遭遇日本侵略的場合，它不能由遠東關係各國獲得積極的支援，就極容易墮入日本所設的這種「玄」中，期望日本政府阻制其軍閥的操切冒險活動。「九一八」以後的一列外交慘痛事實，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由於我們太不肯注意敵人的這一套陰謀。

「自動以外交手段結束戰爭」的企圖

可是，在我們方面不論有了怎樣苦痛的經驗，敵人一臨到它緊急的關頭，它自會毫不遲疑的把一向救急的法寶或成功的祕訣運用起來。

據我們前面分析的，日本在戰略上，在國際及國內關係上所處的逆境，正是它軍國主義者「速戰速決」政策敗北的說明。近兩週來，經過日本軍事機關嚴格統制的新聞及其他言論機關，竟吐露出了一些與軍部意見不一致的消息。本月一日，日本法西斯色彩非常濃厚的東京都新聞，首先提出了

從速結束戰爭的要求；其社論表示：「日政府應事先準備，免蹈往昔日俄戰後東京暴動的覆轍。」並表示：「長期戰爭雖非所辭，但非日本之利，亦非東亞之福，事如可行，俟上海戰事告一段落時，似可由日本自動以外交手段結束戰爭。」——這是從正面表白敵人最近在作何打算。

不能以戰爭結束戰爭，自然祇好「自動以外交手段結束戰爭。」然則怎樣自動用「外交手段」呢？本月四日的東京朝日新聞社論，曾就華北新政權向世界，向中國表示了日本的「王道」與「正義。」它說當前華北的新政權，不求脫離南京獨立，不求日軍久駐華北。但如中國不再考慮其態度，不肯與日本合作，並繼續訴之於持續戰爭，日本就顯然不能撤退軍隊，並還可能的迫而永久的佔據中國重要地點，以圖控制持續的反抗行動，和促起中國的反省。」

可是日本表示的這種「王道」精神，究還不夠轉回世界的反日輿論。在國際聯盟宣佈譴責日本違反條約前一日，即本月五日，美國大總統突然向世界發表了斥責侵略國的演說，接着美國政府於次日正式宣佈日本為侵略國，說日本「在中國的行動，不合國際關係之原則，並違背九國公約與凱洛公約之規定。」由於美國態度之直角度的轉變，英法蘇諸民主國家，乃都有進一步的反日表示，而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之召集，遂成爲不久即可實現之事實了。在這當中，各國民間反日空氣的濃厚，和抵制日貨運動的抬頭，更使侵略者於國際名譽的損失外，復對於經濟制裁的前途，抱着莫大的惶慮。

但狐狸精式的日本外交，却仍得面對着這種不利場面，表演其傳統雙簧戲法。羅斯福總統發表其反日演說之次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即以異常橫蠻的態度，表示「日本不惜以戰爭掠取資源，」其露骨闡揚大陸政策，說者稱之爲「爆彈宣言。」可是過了兩天，同一外務省的外務大臣廣田宏毅，却又發表了一種類似更正其發言人之「爆彈宣言」的聲明，表示日本並未違反條約，其曲解事實的措辭，雖令世界人士聞之冷齒，但其態度却較不橫蠻得多。並且對於那種「爆彈宣言」在閣議上，還引起責任問題的波瀾，東京朝日新聞等報紙，還有攻擊政府發言不慎的非議。這種紅黑花臉的演出，縱會不完全是故弄玄虛，以淆惑世界人士的視聽，但至少總可表明日本軍閥這時已需要以「外交手段」結束這非戰爭所可結束的戰爭了。我們可用以次幾件事實，來補充說明。

德富蘇峯是日本的一位以文章報國的名記者，他的言論，向爲日本一般較不進步的社會人士所尊重，對於大陸政策，他是最感興趣的。在前週中，他竟在大阪朝日新聞發表一篇「準備應付最惡時局」的一篇社論，其中指斥「擊敗中國，事件即可結束」的觀念爲狂妄；全文雖在警戒日人如何應付擊敗中國以後的問題，但字裏行間却是暗示日本當前應有懸崖勒馬的覺悟。尤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軍部新聞班長竹原的態度；他原是一位澈底膺懲中國論者，他在最近講演中，却表示華北方面日本軍隊現正求與中國主力作一激戰即行結束，並表示中國當局如願誠意合作，仍可提攜。此外，如起用穩健派宇垣一成等參加國策審議會的組織，亦表示日本在對華問題上，已打算向着如何結束

的方面推移。

不過所有上述的種種事實與動態，都還是日本速戰速決策略的應有註腳。特日本在目前雖明知道戰爭不能結束戰爭而必得藉外交以繼武力之窮，以達成其「速決」要求，但在華北沒有一個決定的勝利，特別是在上海沒有一個決定的勝利，它知道外交手段無所展佈，所以它一方面儘管向世界向中國乃至向其國內放出許多緩和的空氣，安排許多外交步驟，並在實際進行某種「妥協」運動工作，但同時却在中國南北部更積極更熱烈的從事總攻擊戰，意謂這兩方面的戰爭一照預定的期間，得到了勝利，已經佈置好的或正在暗中活躍的，外交行動就可表面化，就可成就與中國的「提攜」了。如其這兩方面的勝利，而很快的在九國公約會議以前實現，它的成果，就會更加「美滿」。但可惜這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片面的打算。

從那些方面妨阻敵人的陰謀活動

日本帝國主義除了用武力宰制我們之外，更圖用這種外交策略來欺侮我們，愚弄我們，但我們已有充分的苦痛經驗了。蔣委員長在本月八日對美國記者談話中，已正堂堂的表明了我們的抗戰態度。他說：「吾人現正奮鬥，必使日本侵略之武力退出中國爲止；吾人爲和平建設自衛而奮鬥之決心，始終如一，雖至最後一人，一寸土地，亦不稍變此旨。」在國慶日前夕，他更表示：「這次抗戰，斷不是一年半載短期間可以了結的事。」實際上，蔣委員長並不是以他個人的資格講話，他是以中國全

體民衆的代表資格，向世界也向我們的敵人，表達我們全國人民對於這次抗戰的共同決心和信念。本來，在我們全國上下抱定「抗戰到底」的堅定國策之前，敵人的一切外交陰謀，似皆無所施展，但爲了順利推進戰爭，並加速爭取最後勝利計，我們仍應從以次幾個方面，嚴密注意敵人最近的詭譎外交活動：

第一要注意：當前的國際環境，已在有利的向我展開。除德意暹波少數國家外，全世界的輿論，都站在中國方面，並且，還在各方面採取了反抗日本，制裁日本的姿態，像九國公約會議的決定召集，至少已表示列強不復迴避中日戰爭問題的干涉行動了。我們如能在這當中妥爲利用外交機宜，定可收到莫大的效果。不過，單就外交方面說，我們固可推動列強積極干涉日本，同時，日本亦會設法緩和英美法蘇諸國對它的積極干涉。在實際上，它已在國際間從事這種活動了：它不但向各國表明它對中國沒有領土的野心，表明對華戰爭即將中止，並還在不久以前，謊稱中國政府有意與它直接妥協。這種種似是而非的欺騙宣傳，大可影響列強積極干涉的決意。而且，除此以外，它還通過其德意法西兄弟，故意在歐洲造出一些牽制英法等國的亂子，使英法等國對遠東問題的處理感到躊躇。凡此種種，都是我們要非常當心，並且要在外交方面加倍努力的。

第二要注意：上海方面的戰爭，當前變成了整個中日戰爭的樞紐。敵人拚死命想從速結束上海附近的戰爭，在它總攻第一次第二次直到最近第五次全歸慘敗以後，它似已採取了半分軍事半分

外交的策略：一方面打，一方面派遣伊藤等外交界的聞人通過上海的有力外國人，從事斡旋活動。它雖明知道這種活動不會得到結果，但（一）可以投合一部分因產業關係，希望上海戰爭早日結束的外人的心理；（二）可以偽裝日本對於華中區的海，並無侵略野心；由是（三）可以緩和日本最近在上海一帶的野蠻行動，所激起外國人士的反感；特別是（四）可以由這種「調解」空氣的散佈，而鈍滅中國大無畏將士們的敵愾心。此外（五）幸而上海戰事能照松井司令一再宣佈的預定時間結束，這又不失為一件預備的外交工作了。所以，敵人最近在上海方面的外交上的陰謀活動，我們是不能不盡量設法揭露的。設我們更把這種活動與下述的「願慮」連繫起來，其影響就非同小可了。

第三要注意：過去中國各社會層裏面，特別是政治組織經濟組織裏面，都滿佈着對日本特別感到「興趣」的人物，他們在主觀上也許不自認是有「親日癖」，但其言論行動之有利於敵人的加深侵略，那却是千真萬確的。抗日戰爭發生以後，這般人依舊「原封未動」的留在那各社會層中，他們有的也許表示得「非常抗日的」了，但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的骨髓裏面，却會由敵人通過政治經濟權利脈，而注入了某種毒汗或不可醫治的病根，一到時候，或者一有機會，他們就不免要舊病復發，而在客觀上（其主觀上的想法，當然聽便）成爲敵人的「內應」，敵人想藉外交手段從速結束這次戰事的場合，這般人的行動，就最值得大家注意。日本帝國主義儘管在國際間散佈欺騙宣傳，

儘管在上海方面頗作間離運動，如其我們沒有「內奸」，我們全國上下都表示抗戰到「最後一人，最後一寸土地」，它的一切技倆，將毫無所施了。

所以，在上面三點中，以最後一點最值得注意。我們可以附帶在此這樣指明：以「持久抗戰」答覆敵人的「速戰速決」，是中國此次對日戰爭的指導原則，是中華民族當前爭取生存的最高原則。在敵人侵略軍隊不掃數退離中國領土的限內，一切中途調解妥協的運動，都是為敵人運動，都是反民族運動，都是漢奸運動。

我們得以蔣委員長戰至「最後一人最後一寸土地」的決意，來粉碎並消滅這種運動。（十月十五日）（原題注意敵人最近的外交陰謀）

（文化戰線）

文化動員

怎樣動員我們戰時的文化

葛伯贊

誰都知道，日本帝國主義不僅僅在奪取作爲我們民族生存條件的物質地盤，同時也在企圖澈底地消滅作爲我們民族解放意識的文化——正確的說來，在毀滅非侵略主義的人類文化。所以跟隨在那些強暴的日本法西斯軍閥軍事屠殺的後面，同時又湧來了一批一批的日本法西斯主義所御用的文化浪人隊，在大砲飛機的掩護下，宣揚他們吃人的「王道文化」對我們施行殘酷的文化的大屠殺，那不僅在企圖根絕中華民族的生存，而且在根絕數千年艱難締造的中國文化的遺留。

從「九一八」以後，所謂「王道文化」的毒氣，就瀰漫了我們的東三省——並且在我們全國，差不多都已有這種毒素的散佈。他們組織許多文化別動隊，深入到我們的都市和農村，利用一切的報紙雜誌，在中國的各種社會層，盡量地利用一些文化的奴才，往復的去擴大奴化我們的文化運動。他們改編我們中小學的教科書，從最根本的地方作根絕中國青年對於國家和民族復興的意識。他們企圖以文化去毒死中國人民的心靈，使中國人民像死人一樣貼伏在他們那些強盜的腳下。因此有人說：這種帝國主義的文化屠殺，便能亡我民族的說法，却不是過分的。

遠在盧溝橋事變之前，日本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先鋒隊不但就侵入了我們的華北，而且隨着其侵略勢力所達到的區域，也都留下了一個陰影。他們首先就取締作爲我們現階段革命最高原則的三民主義，以至其他革命理論的宣傳，禁止中國國民黨以至其他革命團體及革命份子個人，在華北的活動，及一切國恥紀念日之舉行，與現代國民應有的民主主義諸權利的享與——在相反的方面，他們普遍地傳播各種奴隸文化，製造並宣揚各種漢奸理論，積極地煽動中國人民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去執行敵人危害其祖國的各種險謀毒計的企圖，使中國民族的內部自己分化，去實現其「以華制華」的迷夢。

近來牠更毫無人性地焚燒我們的天津、北平，轟炸我們的上海、南京、廣州、南昌以及沿海沿江一帶的文化機關，殘殺我大學的教授、青年學生，以及他們認爲有抗日意識或表現的著作家、新聞記者、雜誌的編輯人，以及一切與文化有關係的中國人民，同時並給予一切愛護人類文化的「中國的友人」以種種的危害。企圖以暴力給予中國文化以拔根地剷除，在中國領土內重建其侵略主義的文化。

隨着日本法西斯侵略主義的毒鎗在中國的進展，中國的文化，仍然繼續地在遭受摧毀。由此可以看出法西斯日本文化侵略——正確的說來，法西斯主義在其本質上，便是人類文化的劊子手——不但與其軍事侵略並駕前進，而且往往先行於其軍事侵略而作爲其先鋒。日本帝國主義並不絲

毫輕視文化在戰時的效能，並且把文化的機構緊密地結合於軍事的機構，一方面以軍事推進其文化的屠殺，另一方面又企圖以文化的屠殺去保證其侵略主義的強盜的勝利。由於物質與文化之統一的運用，才得以構成日本侵略主義之有機的內容。

在中國，一兩月來的事實，我們深切地感到，在這一一次的抗戰過程中，我們的當局對於文化在戰時的作用，至少還沒有注意到。我們不必諱言，在過去，在東三省淪亡以後，平津失陷以前這一個長期間中，作為我們的文化運動之領導的中央各機關，對於文化政策，完全偏重於盲目的、消極的防範政策，而沒有何種較積極扶植的計劃，以致平津和上海一帶所生長出來的抗戰文化的嫩芽，不但沒有得到政府的灌溉而使之成長，反而在於涉政策，檢查制度之下，遭受了相對性的打擊，這點殘餘的抗戰文化的嫩芽，現在又遭到日本帝國主義強盜所施行的拔根剷除的毒辣手段——自然却又造出了這種民族的新文化之發育成長的許多有利的客觀條件。

平津失陷以後，曾經長期的作為我們民族文化中心的北平，以及文化中心地的文化基礎，已經被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炮打得粉碎，雖然在文化移動的形勢下，各地的文化團體與機關，紛紛成立，但那並不能完全符合現實的需要，並不能作為大衆的抗戰文化的發展地盤，仍不是我們少數同胞的玩弄品；另一方面，抗戰的大衆的文化運動，仍不免受着相對的無理的限額。例如我們的政府和人民再三往復說過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等起碼的民主主義諸權利，至少對我們文化界在目前

還是一個看得吃不得的「畫餅」我們並不否認在抗戰期間文化運動應該統一領導與統一組織，但我們以為統一領導的意義，是領導文化向於抗戰的同一目標而使之集體化，並不是不允許文化在同一抗戰的目標之下，自動地發展。統一組織的意義，是把各地的各種性質的文化團體聯合起來而使之集體化，使一同成爲創造新的民族文化的構成份子，並不是除開那些看得最熟，聽得最慣的文化組合機關之外，便不能再有其他的抗敵的文化團體之組織現在，已經是我們民族最後鬥爭的一個機會，而且我們的政府已經在領導這一個最後的鬥爭，我們最高領袖，並已表現着最大決心在領導着這最後的鬥爭。那麼所有的文化界人士，除非是甘願作亡國奴的漢奸，誰不願意盡力去協助政府和軍隊作戰，竭誠地去擁護最高領袖的抗敵主張呢？不談統一領導與統一組織，領導與組織自然會統一。如果在前線戰士浴血苦鬥的現在，我們後方的文化運動，還表現着十足的落後性，從這表面上看，似乎是文化工作者放棄責任，事實上，文化工作者，却又自有一種「啞子吃黃蓮」自己知道的苦衷。

爲了保證抗戰的勝利，我們有把文化重新再編製的必要。我們誠懇地希望我們文化的領導機關，能夠檢查過去的錯誤，認識當前的責任，而能負起這個非常時期的文化領導任務。

本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的基礎上，外的矛盾與內的矛盾諸關係的構成，已足夠複雜的。從「九一八」以後，隨着民族的危亡局勢之顯明地到來，存在於法西斯日本的侵略和中華民

族的要求生存之相互的矛盾，已經演着主導的作用，這超越了其他一切矛盾諸關係，而構成了中國民族內部統一的基礎。在這種基礎上，抗戰的、作爲全民族的新文化，應該能取得每個不願作亡國奴的中華民族兒女的同意，應該能蓬勃地成長起來的。但是事實上，因爲我們是一個弱國，因爲我們抗敵需要相當的準備，反而構成一種新的政治的矛盾，以致對抗戰的民族的新文化運動，反採取干涉政策——現在已經不是這樣。這也許是我們感覺力的遲鈍，也許是當局的苦心，也許是我們眼光的近視，然而「往者已矣，來者可諒。」

在那種新的政治矛盾的基礎上，以致內在諸矛盾反而未能即行和緩下來，從而仍表現爲各黨各派的政治見解之紛歧。在其間，雖然都有抗日的共同要求，但緣各自拘泥於政治經濟上之近視性的利害，以致不會立即產生全國統一的局面，從而不能表現出一個文化的統一的動向。我們所謂新的文化動向的內容，不是某單一團體或某些少數人的文化，而是全民族的文化；不是舊有的或外來的文化的抄襲，而是在一切人類文化的基礎上的一種新的文化的創造。那不管是民族自己的舊有的文化或外來的文化，只要是抗敵的民族新文化，有用的東西，都將一一的被吸取；反之，便毫無容赦地都要給以排除的。

現在全面抗戰，業已開始，在軍事上我們已經動員了廣大的武力，在文化方面，雖然也漸漸生長出許多抗戰的民族的新文化的組織，但是談到文化之全面的總動員，還是相差甚遠。因此，我們感覺

對於文化，有在抗戰意識上重新加以編製，擴大固結與充實的必要。

第一，要使我們的文化大衆化；正確地說來，文化本來就是屬於大衆的，牠就是大衆的現實的物質生活的反映。不過，後來因爲一部分人擁有對於物質的統治，因而也就擁有對於文化的統治。所以文化在歷史上的諸時代中，都往往作爲一部分權力者的意識表現出來。不過，我們這一次的抗戰的性質，既不是依於資本家的意識所表現的侵略戰爭，也不是依於封建軍閥的意識所表現的地方的內戰，這即是說，不是依據於某一部分人或某一地域人的私的要求而表現的戰爭，而是依據於我們全民族四萬萬七千萬人之一致的共同的要求所表現的殖民地的解放運動的戰爭。像這樣性質的戰爭，如果要取得勝利，唯一地，只有使全民族四萬萬七千萬人，不分性別，不分等級，不分種族地都把他們的力量表現出來。因此對於我們全民族廣大的人民大衆的抗戰熱情之喚起，使他們從各方面直接間接地去參加我們的抗戰，在目前是一個急務。爲了要現實這一個急務，首先就必須把文化歸還於大衆，即是把文化大衆化。所謂文化的大衆化，即是：在質的方面，放低文化的水準，加深文化的內容，在民主主義的原則上把抗戰的意義，廣播於一般人民大衆，使他們之中的每一個，都能澈底地了解這一次戰爭的神聖的內容，和偉大的意義，這一次戰爭與他們自身的密切關係，以及在這一次戰爭中，他們每一個人所應負的任務，而自發地自願地負起世界史所給與他們的一個偉大的歷史使命。在量的方面，便是要擴大文化的對象——從學生普及到農民與工人——和文化的領域——從

都市伸展到田野和工廠。我們必須要使民族中的每一個人都有接受文化的機會，要使全國的每一地域都有文化機關的設置。這樣，我們的文化，便會從少數人玩弄聰明的東西變為啓發大眾的戰鬥意識的工具，反之，在大眾的戰鬥意識的燃燒之中，又必然地會鍛鍊出一種文化之新的內容。

第二，要使我們的文化集體化：這就是說把以前在散漫的、不聯系的狀態之下的各種文化團體，嚴密地組織起來，去構成一個文化的有機體。每一個文化團體或文化人都成爲這個有機體的一個細胞而緊密地結合於這個有機體之內，形成一個生動的系體的文化機構。這里所謂組織，當然不是站在某一單一團體、黨派或個人的私的利益之上，而是站在全民族解放的整個利益之上，把一切紛歧的見解統一起來，使之形成一個偉大的堅實的集體的陣線。集中文化的力量，擴大文化的隊伍，統一文化的目標，整齊文化的步伐，去集體地創造並發揮我們文化的威力。這里所謂系統，也當然不是某一部分人的刻版式的系統，而是在民主主義的原則上，依照文化團體的性質或文化個人的技能，促成其自覺地自動地向於集體化發展，如社會科學的集團，自然科學的集團，這些集團又再相互結合爲一個全體，在中央組成一個文化的最高司令部，在各地，也同時組成文化的指導機關。這樣，我們便可完成我們民族文化在戰時之有機的構成，以適應於軍事與政治的步調，現在客觀的條件，已經促成了我們文化集體化運動之萌芽，比如各地之文化界抗敵後援會之先後成立，各地教育界之救亡運動的興起，這自然是一個有利於我們抗戰的現象。因此，我們目前的任務，便是要以全力

加速這種集體化運動的萌芽之發育滋長，使之成熟，我們不僅在後方組織文化宣傳隊，在前線，也要組織文化突進隊，在國外，組織文化遠征隊，甚至在敵人的勢力範圍內，也要組織文化游擊隊。我們不僅要有橫的組織，而且還要有縱的組織，如國際政治經濟研究隊，軍事普通常識宣傳隊，戲劇隊，……一切的文化團體和文化人，都集體地去教育並鼓勵人民大眾之抗戰的精神。

第三，要使我們的文化現實化：文化本來就不是一種空洞的玄虛的東西，而是某一定民族的社會的政治經濟的構成之反映，換言之，即是某一定民族的現實的物質生活之反映，所以只要某一定的民族的現實的物質生活有了變革，也就變革了這一民族的文化。我們民族在以前的政治經濟的構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因而所表現的文化，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文化，現在戰爭已經開始改變我們的政治的經濟的原來的構成，而走上民族自由平等的解放的歷史路程，因此，我們的文化，客觀地必然要隨着我們的社會的變質而變質，即必然從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文化而轉向民族解放的文化。所以我們可以說，文化的自身就具有一種現實性，而且文化在現階段的中國之現實，就是完成他本身的一個革命的飛躍，因此，我們以為在全面抗戰的今日，對於文化，我們必須剷除一切虛偽的粉飾，經院的空談，應該樸素地把文化去應用於現實的方面，不但暴露現實，而且進而改變現實，使文化不致成爲一種空虛的呻吟，有閒的玩弄，而成爲作爲現實的諸事實之具體的表現的工具。比如在消極方面，隨時分析國際政治的傾向，暴露敵人的社會的矛盾，以及對中國所施行的一切

無人性的野蠻的事實；在積極方面，宣傳防空防毒以及一切戰時人民所應具備的普通常識，鼓勵後方人民之生產……等等。總之，把文化從空洞的玩弄轉變為與實際生活——尤其是戰時的人民生活——密切攸關的東西。

第四，要使我們的文化積極化：一個戰爭的勝利，不僅需要前線的物質力量之鬥爭，尤其需要一般人民的抗戰情緒之高漲。要使人民的抗戰情緒之高漲，對於激發人民之民族意識是必要的。同時把我們民族目前之悲慘的遭遇去坦白地告訴人民，尤其是必要的。尤其要告訴人民，這一次的戰爭不是像從前一樣為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戰爭，而是為全民族每一個人的生存而戰爭，而且除了抗戰以外，便沒有得生存的可能。因此我們在文化上，我們必須消除一切假裝的中庸，以及一切畏縮的、懷疑的、妥協的、保守的後退主義，我們必須在解放鬥爭的原則上重新建立一種戰鬥性的、積極性的民主主義的文化。剷除封建主義文化中之一切腐敗的、消極的因素和一切殖民地的奴性文化，我們要以文化的積極性，去提高我們民族的鬥爭精神，去加強我們抗戰的意識。我們再不能要人民在這樣民族危亡期中，不發出神聖的呼籲，我們要把人民從睡夢之中喚起，在我們最高領袖的領導之下，一批一批的走上抗敵前線，把每一個人的血管中去充滿了抗戰的因素，因而我們覺得從今以後，我們的政府，應該取消文化的干涉主義，甚至限制主義，盡量讓我們的文化走上積極的、戰鬥的新階段，盡量地讓我們的文化在戰爭中發出驚人的怒吼，盡量地讓我們的文化去和殘暴的法西斯主義的

文化英勇地肉搏，在東方放出正義與人道的光芒，寫出我們民族解放戰爭的光榮的歷史。

以上四點，實際上就是文化動員這一個問題的多方面。這四點決不能孤立的進行，而必須把他們在民族解放鬥爭的意義之上緊密地互相聯系起來全面地推進，才能達到文化動員的目的，也才能實現文化動員的任務。

現在，大多的人民，對於這一次抗戰的意義，還不甚理解，這種情形，在許多方面——尤其是漢奸之蠶起——表現出來。這都是由於缺乏民族意識的原故，因此，也就是我們的文化沒有負起牠的戰時的任務的原故。所以在現在去發動我們民族文化的總動員，是再不能，而且也不應絲毫遲疑的事。

文化工作與國民動員

鄒韜奮

國民革命軍北伐時代的所向無敵，五四運動的文化工作可以說是先鋒隊，由文化工作所傳播的種子和革命的軍事配合起來，才開出光輝燦爛的花。當時打倒北洋軍閥，有如摧枯拉朽，主要的原因就在一方面為民衆所唾棄，一方面却有着民衆的基礎，得到民衆方面種種的支持。這種民衆的基礎，這種民衆方面種種的支持，決不是派出幾支軍隊就可以號召起來的，在軍事發動以前，以及在軍事進行的過程中，都必須有文化工作在民間廣播革命的種子，培植鬥爭的情緒。軍事動員也許可

由幾道命令而咄嗟辦到，國民動員便沒有這樣簡單，必須在思想上及意識上下一番工夫，必須在鬥爭的過程中繼續下工夫。

蘇聯的積極建設是世所羨稱的，尤其是他們在那樣落伍的農民羣衆中間，受到種種的障礙與困難，居然成功集體農場的偉大事業。可是他們曾經動員整千整萬的刻苦忠誠的黨員深入農村裏去做教育和宣傳工作，使頑固守舊的農民深切明瞭農村改革對於他們的意義，由此改變他們對於這新運動的態度。在最初期間，甚至有下鄉工作的黨員被無知農民所暗殺的，但是他們不怕艱苦，根據整個的計劃，繼續不斷地向前努力，到了後來，不但一掃頑固守舊的積習，而且動員數百萬數千萬的農民共同努力於農業生產的偉大的建設。世人徒知驚歎於他們動員國民的偉大運動，却很容易忽略他們在文化工作上的慘淡經營。

我常常想中國要作持久戰，國民動員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而此所謂動員，一部分固然是動員直接參加前線的戰事，還有大部分却是要動員來參加大規模的有整個計劃的迅速而緊張的國防經濟建設。與此經濟建設相輔而行，兼程並進的，是動員大量文化工作者參加大規模的有整個計劃的迅速而緊張的文化工作。

(申報)

文化戰線的組織問題

金則人

我以為文化戰線的組織，應即時有個通盤的計畫，一切文化工作馬上要變為適應戰時的需要，加以統制，我們不反對集權，並且絕對地擁護民主的集權，成立一個總的領導全國文化工作的文化界救亡協會，按照各地的情形，把文化人有計畫地分配到各地去，適宜地担負起戰時的文化工作。即時分佈一個戰時文化工作綱領，使全國文化人有所適從，以糾正現下的無政府狀態。但所謂文化統制決不能作限制言論自由解，應該開放最大限的言論自由，尤其是批評自由，這樣纔可以鞏固文化戰線。

在總的統制文化工作的機構尚未成立以前，我們文化人首先應該自覺，把過去的許多壞現象克服過來，尤其應該把門戶之見放棄，把上下的隔膜打破，決不能再使文化作為文化商人營利的手段。許多類似的團體該合併的合併，該統一的統一，許多刊物要分門別類地集中起來，交由各種性質的團體去主辦。這樣，這些刊物纔能真正地和工作發生聯繫，成為工作的指導者，成為羣衆的組織者。

(文化戰線)

文化的抗戰與抗戰的文化

沈志遠

「文化」這一概念，是包容很廣的，可以說在物質和精神，政治和經濟諸領域內，莫不有文化的蹤跡。但是這樣說起來，未免太廣泛了。如果依照這樣的解釋，那末文化抗戰就無異全面抗戰，因而這

樣的解釋實等於不解釋。

這裏我們所講的文化，當然是指平常人們所理解的文化，亦可以說是狹義的文化。這種文化，主要地是指所謂意識的『上層建築』（Ideological Super-structure）而言；政治覺悟、思想、學術、文藝、戲劇、教育、新聞、出版等等方面。因此，所謂文化抗戰，就是這種種方面動員起來以加強和推進全民抗戰的陣勢，它須跟軍事、政治、經濟、外交各方面的抗戰緊密地配合起來，以促成真正的最後勝利。

我們明白了這點之後，前面所提出的問題——拿什麼或從那些方面去進行文化的抗戰——就有了解答的頭緒了。

我認爲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環，是喚起民衆，啓發民衆的政治覺悟。大家知道，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中，至少有三萬萬以上是政治的盲人。我們常拿人口的衆多，民衆的政治力量，當作我們超過敵國的優勢之一着，這固然是事實，但同時也不能抹煞另一事實，即敵國人口雖祇七千餘萬，但至少有五分之四是多少具有政治意識的，而我們有三萬萬以上即三分之二以上的同胞，却連個『國家』觀念都沒有，莫說理解什麼『救亡禦侮』、『民族解放』這類深奧的口號了。不但如是，即其餘的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民，縱然多少有些政治意識，但真能認識這次全面抗戰之意義和理解自己在抗戰中之責任的，到今日爲止恐怕還要大打折扣，真是少數中之少數了。

這樣，四億五千萬人中，有三億以上對於政治完全迷盲無知，而其餘的一億多人中，到大多數又

對這次抗戰和自己的任務沒有明確認識；這種情形，假如任其繼續存在下去，試問我們的民衆力量的優勢在那裏？我們的抗戰勝利的把握又在那裏？

因為我們的抗戰是爲自衛，爲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戰，是天經地義的戰爭，我們是絕對地站在正義和真理方面的，所以我們就絕對地需要把這種天經地義的正義和真理，向四億五千萬同胞的意識中灌輸。相反的，敵人的發動戰爭是爲侵略，爲滿足少數日本統治者羣的慾望和野心，這種戰爭不但對日本廣大的民族毫無利益而且大大地有害，因此日本的統治者不可能把發動戰爭的真實動機公開坦白地向民衆宣佈；他們對付民衆的唯一手段是欺騙、蒙蔽、造謠、麻醉。

這樣我們可以明白，只有站在侵略、橫暴、自私的貪慾和野心之動機上的統治者，才不需要喚醒和啓發民衆的政治覺悟，而反需要麻醉和窒息民衆的自覺意識，亦即需要大衆文化的阻塞和反動。反過來講，站在天經地義的正義方面的我們，不但絕對不能阻塞民衆的文化，（在現時惟一的這就是民族抗戰的文化）使之走向更黑暗的反動，而且萬分急迫地需要積極提高大衆的文化水準——首先是啓發大衆的政治意識，使他們不但立即認識國家和民族的意念，而且須理解此次抵抗日本侵略的意義和自己的責任。敵人是害怕他的民衆覺醒，我們却不怕，而且用不着怕這個，我們怕的倒是民衆的迷盲、不覺醒、不理解現實的真相。

這裏要順便講到一事，即目前國內也很有些人（當然主要的在統治者羣中間）是害怕民衆

覺醒的；他們以爲民衆一覺醒，現存的領導權就要發生問題，因此他們用種種方法和藉口去阻塞喚醒民衆的工作，去妨礙大衆的抗戰文化的開展。實際上這種害怕是毫無根據的。我想現在只有漢奸才會將民衆「喚」起來去反對抗戰的政府或奪取領導權。我要敬告害怕大衆覺醒的先生們：大衆的政治覺醒不但不可怕，而且大大有助於抗戰之進展的；可害怕的倒是先生們自己的不堅決抗敵，假如先生們自己沒有蔣委員長所昭示天下的「抗戰到底，犧牲到底」的最大決心，那末民衆抗戰文化的開展，民衆一致抗戰到底的覺醒，才真成爲極可怕的东西了。

文化抗戰中的另一重要的環節，是思想的抗戰。在我們的思想陣線上，直到今日，蠹賊始終是很多的。在過去，主要的有唯武器論；在抗戰前夜，等待主義和失敗主義這兩個蠹賊特別猖獗；而現在則彷彿「唯軍事論」又在大抬其頭；此外，「左」傾的高調主義和阿Q主義，也隨時都在活躍。所有這些思想上方法論上的蠹賊，無疑地都是澈底抗戰和爭取最後勝利的道路上的重大障礙。因而跟這些思想蠹賊堅決地鬥爭，創造思想統一的陣容，實行抗戰時期大衆的思想武裝，乃是目前文化抗戰的重大任務之一。

文化抗戰的第三個重要的環節是教育的抗戰和抗戰的教育。關於這個問題，政府和社會輿論已經相當地注意到了；各種非常時期的教育方案被提出來了；學校的課程也在修改和補充起來以適應戰時的需要了；有些戰區大學已準備遷移到內地去或組織戰時的臨時大學了。所有這些事實，

彷彿在在表明抗戰的教育已在着着進行，但是稍加細察之後就知道目前抗戰教育的準備工作，還遠遠落在一般的抗戰形勢之後。嚴格地說，現在還沒有抗戰的教育，因而教育的抗戰自然也還談不到，最明顯的事實是除了一部分國立大學課程中添設一些所謂非常時的選修科目和相當地注重軍事訓練以外，在整個教育領土內（尤其是中小學教育和社會教育）完全看不到一點抗敵救亡教育的影子。例如教育當局對於各級學校特別是中小學校尚未提出抗戰時期的整個教育計劃，普遍實施抗敵救亡的政治訓練的計劃，也未聞提出中小學校的教科書至今猶無修改的動議，敵人於強佔我平津之後當知立即實行修改教科書，以磨滅我青年兒童的民族意識，而我們當此民族存亡的緊急關頭，還不動議修改教科書，以適應非常時期的要求，這是何等嚴重的疏忽呀！至於社會教育，我國向來就很不發達，現在抗戰期內，為加強喚醒民衆的救國意識計，就更有特別努力提倡的必要，普遍地設立戰時的閱書報室，努力推廣救國播音與演講，張貼抗戰救國書報等等，都是十分急需的步驟，這當然可與民衆運動同時並進。

最後新聞的抗戰也是文化抗戰之重要的一環。這可以分爲消極和積極的兩方面：消極的呈報紙應當用各種可能方法去根絕一切足以動搖和分裂我抗戰統一陣線的各種謠言和各種言論，做劇烈的鬥爭，使之對民衆的意識不致發生不利於抗戰的影響；積極的是報紙應當號召推動組織和指導民衆的抗敵救亡運動，以加強軍事抗戰的力量。直到現在爲止，新聞界同胞對於全面抗戰確已

有了相當的貢獻，但依據上述兩方面的任務來估量，實不能不說它距離應盡的任務還遠得很。總之，我們文化人，在這全面抗戰的時期中，應該動員全部力量，拿抗戰的文化以實行文化的抗戰！

（半月第一期）

不能放鬆思想的崗位

艾思奇

目前有許多關於實際問題的論爭，已經就是一種思想戰。我們不能說現在的實際工作者真的都會忘了思想戰，但也確有不少的人對思想問題已表現了輕視的態度。這態度根源於兩個理由：第一是說，我們現在忙於緊張的實際工作，埋頭努力去做還來不及，那有工夫去注意思想問題或理論問題？這是從工作的必要上來否定思想問題的重要性，意思是我們只需要幹，不需要想。其次是認為，現在我們要一致抗敵，人人只許統一於整個的愛國熱情之下，去努力，去行動，這時候不許再鬧思想問題，這對於一致行動會有妨礙；這是就工作的性質上來反對思想的重要性的；意思是思想戰會破壞統一，所以現在的工作中不需要它。

這兩個理由，是出於兩種錯誤的見解。第一種錯誤的見解是忘記了思想和工作的關聯，工作和思想雖有分別，但工作中隨時有思想的運用，而真正的思想也必須隨時能解決實際問題，所以，工作問題常常同時就是思想問題，思想問題也不能不常常在工作問題中具體化。倘若所謂的思想只是

學究的書本上的思想，只是「純理論」「純邏輯」的思想，那對於我們的實踐工作當然沒有用處。我們也不需要這種思想。倘若我們的工作只是純憑熱情的蠻幹盲動，那當然也不需要思想。然除了空理論的思想之外，我們還有不能離開實踐的思想，而我們的救國工作，也必須是有整個的計劃和整個的估量的工作。我們必須有堅定的一貫的態度，必須有正確的行動方法，我們必須從許多種的工作意見中找到最正確的意見，必須把不正確的意見克服，清除它的壞的影響。這樣一來，就不能說我們只需要幹而不需要想了。

第二種錯誤的見解是忘記了思想問題也有它的發展過程。只要不是學究式的「純邏輯」的思想，只要不是離開了人類實踐活動的思想，那麼，它的問題的提出方式也是跟着人類實踐活動的過程而不斷地變化的。思想的爭論在某一個時期會造成派別的分歧，但另一個時期却也會是真正的統一所不可缺少的東西。統一抗敵的力量不能是盲目妄動的羣團，而是需要最清醒的意識的結合。馬路上打死漢奸的行動，是人人一致認為痛快的，但如果單憑一時感情的衝動來行動，不能夠採取最好的方式，就有被人利用反而打了自己人的危險。真實的思想活動只對於我們的一致行為有益無慮，倘若客觀現實具有了統一的必要條件時，最能反映客觀現實的思想，一定也最能促成我們的統一。現在全面抗戰已經發生，全國人應該愛國，應該一致抗敵，已經是誰也不容疑義的前提。然而在這前提之下，仍可以有種種的結論：一個結論是說我們最後必勝，一個結論是說我們將化爲焦土，

而敵人也沒有利益。一個結論是說我們也有亡的前途，戰也亡，不戰也亡，與其不戰不如一戰。結論的不同，可以形成不同的行動，而不同的結論，又根源於不同的思想。如果我們要在不同的行動中選擇正確的行動，就不能不在種種的結論中找到最合乎現實的結論，也就是要選擇正確的思想。在這選擇的時候，思想的爭論就有了意義。

現在的思想戰不是爲內戰而戰，是爲抗戰而戰，不是爲要給各派人分門別戶，而是爲了要決定最好的方法走上共同的前途。不是要打自己人，而是要在打漢奸的時候防止誤打了自己的人。不是爲存宗派的獨佔權利，而是要盡各人最大的民族義務。這是思想戰的目標，站在思想崗位上的人是不能放鬆自己的任務的。

但這只是一個大的原則，要使我們的思想戰在實踐中發揮最大的力量，是不能停止在空洞的大原則範圍內來討論的。思想的討論，必須在各種更實際的日常工作問題中具體化起來，我們要把正確的理论應用到最切實的問題裏去，而不要盲目的，沒有原則的工作。我們要有工作的理論，要通過理論去工作，才能把工作和理論同時健全起來。

我們的實際工作者，在工作中有了充分的思想的自覺，雖不能說全然沒有，但却決不能說充分。試看吧，抗戰發生了，是人人積極地向前去做的時候了，然而却有不少的人很消極，很苦悶。這不單是由於碰到了事實阻難，也還由於對工作沒有思想上的確定的把握。有的人在咀咒團體無用，把組

纔看做精力的浪費，半悲觀地去做他們的小組的工作。有的人却又因為找不到組織，因此說工作全無辦法，有的人只管組織組織，組織的空架子有了，却不曉得從何做起。倘若我們有了思想的自覺的話，我們是不是應該排擊那組織的至上主義和工作的高蹈主義？我們是不是應該正確地來了解工作和組織的辯證法的關係？我們是不是應該從正確的把握中來澈底清除自己的無益的苦悶？

工作者沒有思想的自覺，那麼，羣衆又怎能思想的訓練？熱情、憤怒在這抗戰的期間是不會少的，而且只怕太多！我們缺少的是冷靜考量，堅定的認識。打漢奸的熱情可以被抓手來利用，却不會想到應該有計劃地來杜絕漢奸的根源。馬路上無辜的人被打得半死，戰線上大羣的漢奸縱火却無可如何。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民衆組織的工作不夠，另一方面也正由於思想的訓練沒有普及到下面。我們現在還有人輕視民衆的力量，以為單靠軍事就可以殺敵，又有人太輕視軍事的作用，看見民衆運動不能立刻展開，就非常悲觀。我們現在還有着種種單純的、片面的、形而上學的思想，在千萬人的頭腦裏橫行，阻礙着最全面抗戰力量的結合。

困難是要一步一步克服的，是要把各種工作配合在全面的戰爭中來克服的。我們不是觀念論的精神文明主義者，不把思想戰當做萬能的法寶。如果沒有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以及一切實際的民衆工作做基礎。那麼，思想戰毫無意義。然而在這些基礎之上，如果竟忘記了思想的戰鬥和訓練，那也必然會在過程中產生莫大的困難和苦痛。因此，我希望在實踐工作中努力着的戰友們，不要忘記

思想的自覺。不忘記在這條線上設立一座警戒的崗位。

(文化戰線第二期)

附錄一 文救訓練工作大綱

張勁夫

甲 總說

一 訓練之目的在造成救亡工作人員或促進各工作人員之效力，同時並訓練一般民衆，使之具有抗戰時期之常識。

二 爲造成救亡工作人員，設立工作人員訓練班；爲促進工作人員之效力，設立工作人員座談會；爲訓練一般民衆，設立民衆戰時常識訓練班。

乙 工作人員訓練班

三 爲適應各方需要，造就實用技術工作人員訓練班，須依工作之性質及種類，分別辦理之。

四 工作人員訓練班暫時設立下列各班，以後得應於必要增設之。

1. (甲) 民衆運動訓練班。

(乙) 民衆師資訓練班。

軍事訓練班。

防空防毒訓練班。



4. 救護訓練班

5. 儲信訓練班……

- 五 各訓練班又應視其內容深淺及受訓者之程度與性質而再分組分期辦理之。
- 六 各種訓練均投以必要之知識與技能，使受訓者於受訓後能實際盡力於各種救亡工作爲要。
- 七 訓練之時期，須盡量求其短，惟因技能難易與程度深淺之不同，各訓練班之時期均臨時決定之。
- 八 各種訓練班以由本會直接辦理之爲原則，惟爲技術及其他便利，亦得與其他團體合辦之。
- 九 各訓練班之課程另行訂定之。
- 十 各訓練班之受訓者，均由參加救亡協會各團體選派，參加實際工作者不另招生。
- 十一 各受訓者於受訓完畢後，必須回至原屬團體工作，或由救亡協會另派工作。

丙 工作人員座談會

- 十二 工作人員座談會，由各團體工作人員組織之。
- 十三 座談會依工作種類及地區分組舉行。
- 十四 每一座談會參加者以不超過五十人爲原則。
- 十五 座談會談話之內容，主要者爲政治的認識，但必要時得有工作之報告，批判，解決困難，研究改進方法。
- 十六 每一座談會開會時，本會務須派員出席演講政治問題或作時事分析，並根據工作討論性質之不同，分別介

紹專家去列席提供意見，非不得已不可缺席。

十七 各座談會如有不能解決之問題，或其他請求時，本會務須設法幫助解決之。

十八 每一座談會須推定一人爲主席，負責召集座談會並主持一切。

十九 本會得召集各同種類座談會之負責人，舉行擴大座談會，以交換意見，擴大座談會之主席由本會所派出席人任之。

二十 各座談會每星期舉行一次，擴大座談會每月舉行一次。

丁 民衆訓練班

廿一 民衆訓練班，對一般民衆施行抗戰政治教育及戰時之必要知識——如防空防毒，救護，電信，偵查牒報，避難等之時亦得課以歌詠，演劇及各種戰時生產技術。

廿二 民衆訓練應依戰區及後方而異其訓練內容，詳細之課程，另行訂定之。

廿三 民衆訓練班，由各民衆團體（如職工會，里弄會等）辦理爲原則，本會則盡輔導及聯系之責任。

廿四 爲促成各團體設立民衆訓練班，本會宜經常派員訪問各團體，調查情形，督促創辦，或協助其辦理。

廿五 各團體對於設立民衆訓練班，要求本會幫助——如請代爲設計，聘請訓練員，供給教材等——時宜盡量援助之。

廿六 各團體設立民衆訓練班後，本會宜經常派員前往視察指導之。

廿七 本會宜訂一民衆訓練班條例，分送各團體，供其斟酌採用。

廿八 本會宜編印民衆訓練班適用的各種教材，以備各團體採用。

廿九 爲供給各民衆訓練班之訓練員，本會宜辦民衆師資訓練班或舉行師資登記。

三十 本會宜經常召集各團體負責訓練之人員或各民衆訓練班主任舉行談話，以交換意見，促進民衆訓練工作。

卅一 爲訓練全國救亡工作人員，宜辦一大規模之訓練學校。

卅二 爲推廣民衆訓練，宜編印各種訓練小冊子以分散於全國各地。

以上兩條除卅一條應由中央政府或全國救亡協會辦理外，卅二條即因上海爲全國文化中心，本會宜辦理之，其計劃當另行擬定之。

(戰時教育)

附錄二 戰時文化研究室工作計劃大綱(草案)

柳 湜

一 爲什麼要組織戰時文化研究室？

甲 文化是一個民族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意識形態全部的總稱，在戰時，這一切的方面，不免都在急激的變化中，爲了保衛文化的繁演，理解戰時文化的發展諸特點，我們有於戰時作有系統的研究的必要。

乙 就今日戰爭組織狀況說：文化(狹義的解釋，單指意識的動員)是全面抗戰之一分野，全民族全面的動員，文化這一分野，自然也應動員，爲了幫助長期抗戰中文化的動員，我們有研究過去，現在一切文化活動，並求出戰

時正確的發展的道路以配合戰爭，完成文化在戰時的任務。

丙 戰爭是破壞的，今日抗戰的範圍又普遍全國，在戰時一切的變動都非常迅速，文化資料容易散失，毀滅，爲了保存抗戰中中國民族英勇奮鬥的史蹟，我們有組織文化機關，搜集文化資料并整理之必要。

丁 戰爭破壞了一切文化人過去安定的生活，許多專家的私人的圖書室收藏等，有的被燬於炮火，有的因生活變動經濟困難，不能維持。況且，在今日散佈全國底活的文獻，也決非某一個人的力量所能蒐集的。因此，爲了使許多專家繼續研究方便，也有設法集體的收藏，創辦集體研究機關之必要。

戊 提高文化人自己的文化水準，戰時文化工作的效率，以及集體自動研究的精神。

二 準備做些什麼工作？

(甲) 搜集材料。

一 徵集抗戰文獻：中日兩國對戰爭所發表的文件，中國與其他各國外交文件，國內外輿論，各戰場上抗戰的實紀，抗戰中民族英雄個人的史蹟等。

二 徵集政治，經濟資料：國際的（特別是敵人的），國內的。（此項包括法令，調查，統計，著作物等。）

三 徵集戰時藝術作品：文學，戲劇，詩歌，攝影，木刻，漫畫，以及各種戰時宣傳品。（并包括文學戲劇，歌詠等運動的實紀等。）

四 徵集有關民族戰爭的論著：政治，經濟，哲學，科學，社會等著作物，或新發明的紀錄（包括圖樣），不僅是國人

的著述，同時包括國際的。

(乙)整理與研究。

- 一、整理以上各類之資料：黏貼，編輯，登記，抄錄，分類保管。
- 二、研究各類中各個問題，關於抗戰中政治問題，政策，戰略的問題；戰時經濟問題；思想問題；外交問題；或屬於各項問題中之某一部門。（特別注意國內各種論戰。）
- 三、對於有害抗戰之思想，政策，策略等的批判。
- 四、良好言論，著作物之批判的介紹。

(丙)供應與出版。

- 一、接受國內各地著作者關於資料查詢事項。
- 二、接受國內各地青年對於戰時文化工作，自學（如關於政治，經濟，哲學等基本知識的問題或代介紹讀物等，通訊諮詢事項）。
- 三、辦理戰時文化工作與社會事業的委託設計工作。
- 四、出版各種資料專冊。
- 五、出版戰時文化叢書。
- 六、出版研究員的一般著作。

(丁) 附屬事業。

例如：流動圖書館；民衆學校；防空；防毒；攝影展覽等。

三 組織

- 一、本研究室爲有志從事戰時文化工作者自由的組合。
- 二、本研究室最高機關爲董事會，執行決定工作大計與籌集經費等。
董事會由全國各界領袖，學術界權威若干人組織之。
- 三、本研究室設幹事二人，一任研究室學長，一任本室總務。幹事由董事會聘任之。其他，在研究中需要專家指導之處，得聘請專家若干人。
- 四、本研究室招收研究員若干人——凡大學畢業，或有同等學力，對於政治、經濟、哲學、文學有一項專長，而有志繼續從事文化工作，提出著作一種，或論文一篇，經過審查合格者，即得爲本研究室之研究員。

- 五、本研究室設資料與研究二部，各部主任由幹事兼任，各部設若干組，每組由研究員中推定一人爲主任。
 - 六、本研究室研究與搜集工作由研究員集體討論決定。最後經過學長考核批准執行之。
- 出版工作，另組出版委員會負責處理。

四 經費

- 一、本研究室擬先籌足若干元購買圖書、用具，作爲開辦費。

二、向本研究室所在地政府當局要求供給房舍。

三、向本研究室所在地政府或最高行政教育機關，各界領袖，按月籌募經常費若干元。

四、本研究室研究員自力籌募。

五、本研究室出版的收入撥充。（預期本室出版收入，足以支付自給時，即停止向外籌募經費。）

五 工作與生活

一、本研究室幹事、專家、研究員，在日常生活上採取共同刻苦的精神為原則。惟幹事、專家之待遇，須由董事會按其家庭經濟狀況決定之。

二、研究員由本研究室供給食宿零用。但此項供給，係依借貸方式辦理。研究員並須保證在經濟能力足以償還時期，按照規定辦法如期償付之。

三、研究員除担负搜集整理資料部分工作外，每月應有三萬字編著成績提出。在三個月內無成績提出者，停止供給食宿。

四、研究員之編著，經過審查後，得由本研究室出版委員會或委託其他書店出版。版稅或稿費除抽百分之二十為本室公積金外，研究員應在其所得部分款額中，履行其對本室償付貸款之義務。

五、研究員在加入本研究室前，應填具限定工作一年的志願書，倘有中途退出情事，除應清償本室食宿零用及借貸一切費用外，得按定額賠償損害作業耐金。

六、附則

一、本研究室如得各省、市或大學請求，並供給費用後，得在各地設分室。

二、各地專家，有藏書或收集資料者，凡願與本研究室互取聯絡，或願作爲本室分室者，均當與之合作，交換供給文化資料，介紹出版等。

三、本研究室準備先在湖南長沙開辦，一俟準備完畢，即行登報徵集文化資料，並徵求研究同志。（抵抗）

教育動員

戰時教育問題

楊東蓀

戰時教育和平常時期教育不同之點是：

第一，從全國總動員一點來說，政治、經濟、軍事諸部門既然由平時狀態入於戰時狀態，集中一切力量於抗戰這一點，則教育這部門自不能單獨例外。並且教育不是獨立的東西，只有在它與政治、經濟諸部門取得密切聯繫時，才能夠發揮其積極的作用；因此，當一切部門都在變動的時候，教育這部門也不能不跟着變動。

第二，從半殖民地國家反侵略國的戰爭來說，更顯示出智識分子在戰爭中地位的重要。現代學校教育制度，原係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把它移植到處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國來，自然是「橘過淮爲枳」，發生了「鑿枘不相入」的現象。但從另一方面看，却不能否認中國最近幾十年來智識分子在屢次改革運動與革命運動中所起的積極的作用。目前是全民族的統一的抗戰時候，要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就必得發動全國民衆起來支持抗戰；而所謂全國民衆，主要的就是指着那人數最多而力量又最大的工農大衆而言。但是由於工農大衆文化水準的低落，要他們起來支持抗戰，固然主要

的應該把改善工農生活這問題聯在一塊；可是我們也不能忽視智識分子在目前有着組織並教育他們的任務。因此，教育在這時便起着特殊作用，而這作用在平常時期是向來被教育工作者所漠視的。

單就上述兩點來說，已經充分地表明出戰時教育與平常時期教育的不同之點。現在且讓我們來談：

戰時教育的方法問題

這第一是實施集體主義的訓練方法。掃除自私自利的觀念與行動，養成爲民族國家而犧牲的精神；嚴格執行自我批判，克服智識分子的動搖性與浪漫主義；實施嚴肅而有紀律的有戰鬥性的集體生活，在集體生活中體煉出組織的方法與工作的技術；提高政治教育，在政治教育中養成強有力的幹部；側重有組織的活動，在有組織的活動中養成民主的精神；廓清一切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與「我行我素」的感情衝動，提高現實主義與崇尚理智的精神；這一切，都不是過去個人主義的訓練方法所能做到的，只有集體主義的訓練方法才能夠完成這些任務。我們堅決地認定：戰時教育只有緊緊地把握住集體主義的訓練方法，教育在抗戰中才能夠充分地顯示其積極的作用。不但如此，同時，我們還誠懇地要求全國教育工作者徹底地了解並執行「教育者也應被教育」的原則，在教育過程中要認定自己同時也是被教育者；只有這樣，教育工作者才能夠實現集體主義的訓練方法。

第二是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過去形式主義的學校教育，真是漏洞百出；它把教育與現實生活打成兩橛，把學與用，知與行分離起來，教育活動變成了沒有靈魂的木乃伊。它在平時，既是空洞無物，到了戰時，由於良費才力，勿力與人力，它將成爲抗戰展開的障礙物。要補救這缺點，便只有拿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來代替它。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把教育與現實生活打成一片。把學與用，知與行聯繫起來，它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的教育；它的最高原則，就是在一切集體組織中，在一定的計劃之下，把一切活動，一切工作以及經常發生的事件，都認定是教育活動的主要內容，也即是教育活動自身。但這裏所謂一定的計劃，必然是通過其一正確的理论與認識而得到的結論；不然的話，便會犯着實用主義與經驗主義的錯誤，澈底地了解了這原則，教育工作者就會懂得那具備了教室、實驗室、研究室以及圖書館的教育活動固然是教育活動，但根據這原則而發生的一切活動，又何嘗不是教育活動呢？尤其是在戰時，我們更有理由認定後一種教育活動將成爲最有效而又最廣大的教育活動，將成爲支持抗戰的最有力的支柱；甚至說，一種教育活動，在目前，也必得根據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的原則，才能夠發揮其最大效能。

上述兩個方法，其實只是一個。如果要改造中國教育，我們認定首先便應該從方法上着手，而方法中最有力而又最有效的就只有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這一改造，不能實現於平時，我們但願爲着增強抵抗力量起見，能夠實現於戰時。方法問題談過了，現在且讓我們來談

戰時教育的實施問題

戰時教育的實施，有着兩個主要原則：第一是戰時教育的實施，即戰時教育的一切活動，都有一個總目標，這就是集中於抗戰這一點上，以爭取最後勝利；第二是戰時教育合理化的原則，即費最少的財力物力以收得最大的效果。

根據這兩個原則，我們對於現有學校的處理辦法是這樣的：第一是對於專門以上學校的處理，把不必要的即與抗戰無直接幫助的學校，一律停辦，而由政府擇定幾個地區，開辦幾所與目前抗戰有直接幫助的大學或研究院，例如醫科大學、理科大學、工科大學、抗日政治大學之類，在這一改革過程中，希望政府把那一向爲學閥所把持而視爲一己私有物的專門學校與大學校予以澈底的改造，我們認定學術與文化是全民族的所有物，決不能讓少數學閥把持，一方面造成壟斷的局面，使得許多有學識的人不能展其所長，一方面造成派系的鬥爭，把整個教育界學術界鬧得一塌糊塗。其次，我們主張把不必要的學校停辦，不但合於抗戰的需要，並且合於眼前的事實：一則由於私人經濟的窮困，能夠負擔鉅額學費的專門學校以上的學生一定大量的減少，因此，即令各大學各專門學校按照老模老樣辦下去，其結果恐怕是教授多於學生，而不免於浪費；一則由於民族解放戰爭的展開與持久，還拿着「教育爲百年大計」的理由，叫大批學生在學校裏過着平常時期的生活，即令學生一向是綿羊，到這時恐怕也要變成了覺醒的獅子，教授們在教室裏只管講得眉飛色舞天花亂墜，學生們

恐怕也不會安坐在那裏靜聽你們這些撈什子。這些是事實，是鐵一般的事實，離開這些事實，而高唱「教育爲百年大計」的理論，主張維持原狀，這不是自欺欺人，便是別有用心。

其次，是對於中學的處理。中學這階段，是過渡的階段，但爲着要養成更多的幹部，來配合目前的民族解放戰爭，我們便不能僅僅這樣了解就算了結了對中學教育的任務，我們還應進一步，認定中學在某種教育活動之下，可能地養成多數的爲民族解放戰爭而努力的幹部。基於這個認識，我們主張提高中學的政治教育，並按照戰時的需要，來改革中學的整個課程。同時，基於上述兩個原則，更希望中學教育在數量上在性質上都有一個改革。

再其次，是對於小學的處理。小學原來應該是國民義務教育，但在過去，我們仍舊有着廣大的兒童，被摒除在這個國民義務教育的圈子外邊。目前，我們並不主張停辦小學教育，恰恰相反，我們要求今日的小學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在怎樣把那些失學兒童都能享有他們的受教育權；同時，基於上述兩個原則，更希望小學教育在性質上有一個改革。

再其次，是對於職業教育的處理。過去職業教育的最大缺點，就是把它與現實社會打成兩橛，學校造就的人才，現實社會並不能夠充分運用，並且有許多人才，由於學校教育過程把學與用，知與行分離起來，根本就沒有用處。在持久抗戰中，由於海口的封鎖與戰事上迫切的需要，一切有助於抗戰的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的大規模或小規模的經營，都有着相當的前途；因此，職業教育便應當朝着

這個方向充分地發展下去，以支持持久的抗戰。

最後，便是對於民衆教育的處理。民衆教育最主要的部門，是農民教育與工人教育；這是戰時教育中最主要的對象，我們要動員全國民衆積極支持抗戰，首先就得動員全國教育工作者積極參加民衆教育的工作。在抗戰這一總目標之下，全國教育工作者應該擔負起新啓蒙運動的重大任務，起碼的工作，至少應該是提高並強調民衆的政治教育科學教學與文字教育。關於這點，作者在戰時教育旬刊有一篇要從戰時教育中樹立起新文化的基礎，說得頗爲詳盡，這裏用不着贅述。但主要的，我們必得強調民衆教育在戰時教育中的重要性。

對上述這些道理，我們還得重複述一遍的，就是要在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這一原則之下來處理這些問題，這即是說有學校設備的固然是我們的教育場所，就是那沒有學校設備的一切集體生活也一樣是我們的教育場所，定要一座洋樓式的民衆教育館才來談民衆教育，這簡直是夢想。我們不要忘記，在戰時，一切活動，一切事物，都是我們教育的園地與資料。並且，沒有這一原則，作我們教育的骨幹，就是齊集許多專家對這些處理作更詳細的規劃，到頭來，也只落得一場空。最後還讓我說幾句，以作本文的

結尾

第一，全國教育工作者應站立在自己的崗位上，集中自己一切力量，支持抗戰到底，並擔負起新

啓蒙運動的重大任務。

第二，戰爭熾滅了文化，但同時也創造了文化，在民族解放戰爭中更有着這樣的前途，我們正不必緬懷舊的一切，打從今天起，我們應從全民族的新的生活中，從新啓蒙運動的工作中，樹立起新文化的基礎。

第三，全國教育工作者，應當從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中，體煉出新的教育經驗，建立起新的教育理論，我們的主要任務，不但是用自己的力量支持抗戰到底，並且進一步要替教育與文化的領域創造出一個嶄新的局面。

第四，在民族解放戰爭的巨流中，每個教育工作者都應過着克苦耐勞的生活。在過去正常工作中，生活所需，有着恆定的收入，一旦轉變爲戰時，收入減少，自不免於感到多少的苦痛。但我們不應忘記，在火線上正有着千萬萬爲民族爭生存而流血而拚命的將士，我們多少感到一點苦痛，又算得什麼。小市民的生活方式，應該溶化在偉大而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洪爐中。至於一向待遇最薄的小學教師，則爲着增強他們工作的力量，却必得予以相當的生活改善。

第五，關於失業教師的問題，一方面固然靠政府來解決，一方面也靠自己在工作之中來解決。一向錯誤的見解，都只把教育的對象，局限於學校一個部門，千千萬萬的勞苦大眾又何曾享有過受教育權，又何曾被當作是教育的對象。我們應該打從今天起，把教育對象的視野展開到千千萬萬的勞苦

大衆方面去，同時，就從這些工作中運用各色各樣的社團關係以解決自己最低限度的生活問題。至於說：爲着維持失業教師的生計，主張把學校維持原狀，這就等於說：爲着維持失業舞女的生計，主張跳舞廳復業，同是一樣滑稽。全民族的統一的抗戰有一個原則，就是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朋友們，現在正是我們出力的時候啊！

（文化戰線）

非常時期的兒童教育

陳鶴琴

我們知道，國家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他的教育尤其是兒童教育，若不能積極的參加國家戰事的活動，這教育是無用，是破產，應該予以解散。所以我們在全面戰爭開展時，應該針對着目前的局勢，未來的需要，把兒童教育的設施方法，整個的改革一下。茲將改革要點，畧述於左：

（一）充分利用校舍。凡在安全地點的校舍，可將其餘屋、走廊以及課外時間，供給非安全地點學校上課之用。必要時，酌量改爲二部制或半日制。

（二）添置避難設備。如音響警報器，信號燈，防毒面具，防毒室，地窖，偽裝用具等，應有最低限度的設備，以防空襲。對於火災，房屋倒塌與機關槍掃射等普通危險，尤須設法避免損害。

（三）改變平時課程。平時課程不適用於非常時期，應以戰事活動爲全部課程的中心。如抗戰意義，我民族的地位，以及防毒避災，救護警備等活動，均應列爲主要的課程。

(四) 選擇適用教材。平時教科書上的教材，多不適用；應由教師隨時注意編選。編選的標準：要根據兒童學習心理的興趣，要根據當前社會的需要。如中日國力的比較，中國和國際間的關係，「消滅我們後方的敵人——漢奸外國間諜」（見抗戰三日刊第一號）、「黃梅與壯烈之死」等，都是非常時期中比較適用的教材。

(五) 採取整個教學方法。以一個非常時期的戰事問題做中心，把各科打成一片，混合教學。這樣，教材既能適合社會的需要，教學時，亦易引起兒童學習的興味。

(五) 注重課外工作。課內教學時間，可以酌量減少。課外實際工作，要特別注意組織與指導，茲提出幾項於下，以供參考：

1 全國自十歲以上的兒童，由教師與家長督率指導之下，每人製造簡易防毒面具一件，分贈民衆使用。

2 全國八歲以上的兒童，每人每月收集金屬碎片繩索破布及其他有用的廢物一斤，作為軍事應用的原料。

3 全國兒童，每人每月儲蓄救國金至少五分，直至收復失地為止。

4 全國十歲以上的兒童，每人每學期教不識字的民衆一人，至能讀完短期小學課本為止，並使民衆了解戰時常識、防空、防毒、防疫、衛生等淺義。

5 在可能範圍內，全國兒童，每人每年就家中或隣近隙地，種玉蜀黍、蕃薯、山芋或其他糧食副品，每人收穫量至少兩斤。

6 在可能範圍內，全國兒童，每人每年養雞或鴨一隻。非常時期兒童教育的設施，內容甚為複雜，以上所說，不過是個大綱，詳細，容再討論。

（大公報）

戰時教育的具體辦法（生活教育社提出）

滿力繕

戰時教育之根本路線是在有組織的抗戰行動中，執行經常的艱苦的自我教育。但是在全面抗戰中，各種人羣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所以我們在執行這種教育時，必須按照實際的情況，採用各種不同的形式。這些形式歸納起來約有如下數者：

（一）戰時工作組織，如軍隊、抗敵後援會、各界救亡協會，以至救護隊、各種服務團、劇團、歌詠團等等，這些組織是比較直接的戰鬥團體，他們的行動，也是比較直接的戰鬥行動。所以他們推行戰時自我教育也比較便利。在這些團體中，我們認為目前第一步應該立刻在自己的組織系統中成立一個自我教育委員會，或自我教育部，專門負責發動、設計、監督、指導本團體內集體的自我教育工作。在這些團體內，我們不需要在實際的工作之外，再另外劃分出很多學習的時間；我們可以在實際工作

本身中有計劃地打進教育的活素，讓他開出教育的花，其具體的方法如下：

- a, 每天或每數天有一次嚴格的集體生活討論及時事討論，並由時事討論更深入到一般的政治討論。
- b, 在日常的工作討論和工作佈置中隨時隨地注意到自我教育的工作。例如檢查過去的工作，接受過去的教育；詳細研究工作的方式、條理，克服各種各樣的錯誤等等。
- c, 在日常工作中，有計劃有程序地培養新的幹部，注意每個幹部的進修。
- d, 有計劃有程序地提高必要的技術的訓練。
- e, 嚴格的執行自我批評。

(二) 一般的職業團體，如書店、商行、工廠、報館、行政機關等等。這些地方固然有集團的生活，但未必都已直接參加抗戰行動；所以我們決不能僅僅要求他們在本身工作中訓練自己。我們認為在這些團體中必須用如下的方法來辦：

- a, 推舉或者聘請一個戰時教育設計員，負責計劃指導戰時教育工作。
- b, 認清自己的團體在全面抗戰中間的特殊使命，把自己的工作和教育着重在這個方面。
- c, 單獨或是合其他團體舉行集體生活討論、時事討論，或政治研究。
- d, 和同性質的團體聯合起來組織戰時服務團，或各種有利於抗戰的團體。在這些有組織的集團工作中，提高自己的技術訓練。必要時也可以請求有經驗的人來作實地指導。
- e, 其他訓練幹部自我批評同上。

(三) 大學或各種專門學校研究院等等。這些地方現在有一個很大的矛盾，就是他的組織和課程簡直和抗戰毫無關係，而事實上他又不能不受戰事的影響，並且在這時要想把學生關在與抗戰隔離的圍牆裏，也很不容易。對於這種地方，我們認為目前應通過如下的大改造，來執行戰時教育：

a, 設立一個戰時專門教育委員會，按照戰時的需要，看全國應有那些最高的專門研究機關，然後再看各大學的特點和特殊情況，將各大學改成各種專門研究所。性質相同的可以合併起來，性質相異的可以分開，多餘的就裁撤掉，沒有的立刻補設起來，大概現時極需的有如下的幾種：

- 甲 機械工程研究所（附兵器研究所）
- 乙 化學戰爭研究所（附防毒研究所）
- 丙 戰時經濟研究所（附戰時財政研究所）
- 丁 糧食管理研究所
- 戊 交通管理研究所
- 己 電信研究所
- 庚 軍事政治研究所
- 辛 航空研究所（附防空研究所）
- 壬 醫藥研究所
- 癸 其他。

容易團集起來，所以我們認為這些學校仍可以暫時存在，但必須照如下的方法加以澈底的改造，使能適應戰時需要。

b, 使這些研究所和各該部門的工作組織，緊密地聯在一起，全所的指導員和研究員，都要儘可能全體參加各該部門的實際工作。

c, 各研究所應完全放棄舊日那種迂緩無用的課程，而以各該部門之緊急需要為課程。

d, 各研究所除去專門的研究外，也應有經常的時事討論，政治研究，及其他必要的訓練。

(四) 中小學校，照我們的想法，應該全部停辦，但如果把學校解散了，則學生都分散開來，很不教育。

a, 全體師生皆停止一切平時的生活程序，而組織中學生救亡協會，兒童救亡協會，或各種戰時服務團，以此等救亡生活為教育生活。

b, 在此等組織中，成立自我教育指導委員會，依據一般救亡團體的方法，執行政治的，時事的，工作的，自我教育。

c, 組織戰時普及教育服務團，或小先生服務團，推行民衆教育。在教育民衆的工作中，教育自己。

d, 在一般的工作以外，更儘可能地注意到語言文學方面的進修，和各種基本常識的學習。

(五) 一般散漫的民衆。在這些地方，執行戰時自我教育比較最為艱苦，但也最為重要，這裏的

辦法大概如下：

a, 由政府，救亡團體，教育團體，切實合作，組織戰時普及教育委員會，負責設計指導，同時動員大中小學生之

文化人組織戰時普及教育服務團，深入民間進行教育活動。

b, 活動方法，最好完全改變舊日的態度，注重民衆組織工作。首先根據他們的日常生活，組織一般的互助團體，爲難民互助會，戰時互助會，民衆消防隊，村鎮里弄聯合會之類，然後再漸漸把他轉化爲直接的抗戰團體。在教育活動中進行這些組織，在這些組織的生活中，進行普及教育工作。

上述五種辦法，可以代表現時執行戰時自我教育的五種形式。但形式雖不同，其根本路線還是一個：就是在集團的抗戰行動中，推動抗戰的實踐教育。所以我們一方面應該顧慮到各種人羣的實際情況，一方面也應該集中火力在這一條總的路線上，不過爲了保證這種教育能很好做到，我們最後應該提到一個最高的組織問題，就是建立一個全國戰時教育設計委員會負責領導一切。這個委員會可由教育部，救亡團體，教育團體，共同組織之。但這個問題，是組織與行政的問題，本篇限於篇幅，留待下次再談。

(抵抗第八號)

附錄一 戰時教育方案（生活教育社提出）

王洞若

(一) 對於戰時教育應有之認識

(二) 戰時教育的必要

目前大規模的抗日戰爭已經發動，我們必須繼續抗戰到底，用我們的人力物力財力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持久

戰，消耗戰，才能消滅我們的敵人，取得中華民族之自由與解放。所以在抗戰過程中，我們必須把一切人力財力都集中起來，用之於抗戰，把一切活動，一切武器，都以爭取抗戰勝利為唯一前提。關於這一點，在目前已成爲成千成萬人的共同信念了。因此我們要求目前教育應完全適合於戰時的要求。過往的平時教育，我們應該使其全部改造過來，成爲戰時教育。

有許多人不明瞭目前戰時的嚴重性，不瞭解目前是一個生與死的鬥爭的開場，因而把戰時看做平時，把戰時教育看做平時教育。他們所考慮的不是怎樣改造平時教育，以適應戰時的要求，而是怎樣及早開學，讓青年們在砲火下上課讀書，他們引證法國歐戰時某地中學在地窖上課的故事來斷言，只有這樣的處危若安，處亂若定來辦教育，才能够鞏固國本。這種百年樹人的教育觀，在平時原未可厚非，但在國難嚴重期間，尤其是作戰的時候，便不能不顯得是一種有害於整個民族抗戰的理論了。我們主張戰時教育有四個理由：

(一) 在抗戰過程中，我們應集中一切人力直接間接用之於抗戰，倘若我們還是繼續平時教育，終日上課讀書，我們將給幾百萬青年被擱於抗戰的門外，這和國民總動員的主旨完全是不符合的。我們爲什麼不能運用那幾百萬青年的力量來訓練民衆教育民衆以鞏固抗敵的力量呢？

(二) 在抗戰過程中，我們應集中一切財力用之於抗戰；但平時教育論者在這時却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保持平時教育要求國家支出像平時一樣的數萬萬元的教育經費；另一條出路是因爲經費減少而把教育活動範圍縮小。這兩條路對於抗戰顯然都是有害的。因此我們必須建立一種戰時教育，以謀教育經費之節省，並保證其不至因這種節省而使教育受了影響。

(三) 從教育效能上來考察，我們更有將平時教育改造的必要。在平時，我們學校裏所教的與社會所需的，已

經隔了一道鴻溝；可是一到了戰時，這個鴻溝便越發要加大了。誰要希望這種教育成爲有效的救國教育，就好像緣木求魚。

(四) 對日抗戰，不是可以立刻結束的，倘若我們是真心求民族解放，我們就不應該有這種苟且偷安的心理。中華民族解放戰爭是一個長期的艱苦鬥爭的過程；那些把教育看做是百年大計的人，擔心戰時教育破壞了原有的教育精神，認定這一個變革只是一個短短的期間，因而是徒勞無益；這實在是一種謬誤的短見。

從以上四點看來，我們實在有改革平時教育建立戰時教育的必要。

(二) 戰時教育之基礎的原則

(一) 我們要承認戰時的生活，就是戰時的教育。在抗戰的生活中，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個人，落後者與前進者之間所起的生活上的變化和作用，隨處都是教育。在救護的生活中，便是受了救護的教育；在作戰的生活中，便是受了作戰的教育。只有這樣的的教育，才是最有效的教育。我們不需要在這種戰時的實踐生活而外，還另立一個普通教育系統，在那裏專門上講堂，讀死書。這樣就等於「放下金鑊不採，在砂裏淘金」。只有和實踐需要打成一片的教育，才是目前我們所需要的教育。它可以節省時間上的浪費，所學的就是實踐的生活所需要的，過去的那種讀書，實習，然後再實行那種冗長的分割的過程，是被絕對刪除了。不僅如此，它可以節省財力與人力的浪費，過去一提到辦教育，就是校舍教員薪水辦公費一大筆開支，招收學生，聘請教師，入學考試，月考，會考這一堆麻煩，但是只要我們一承認戰時的生活就是戰時的教育，這一切浪費都可以避免的了。一切軍隊一切民衆團體和藝術團體只要略加計劃與調整，統同立刻可以成爲我們戰時的學校。

(二) 我們要認定和整個抗戰（軍事，政治，經濟）配合的有計劃有組織的生活便是上好的戰時教育。我們

不僅零星地拾取生活教育，我們還應該和整個抗戰配合起來，作成精密的計劃，作成有組織的生活，在這當中來取得最好的教育。這就是說我們絕不零星地把抗戰中某一部份的生活算做我們的教育，我們更要求把有關抗戰之全面的認識（空間的與時間的）算做我們戰時的教育。

（三）戰時教育在基礎的意義上便是戰時的一個普及教育運動。中國義務教育辦得幾十年了，但是文盲的百分數直到近年來還是沒有怎樣地減少。這種現象絕不能完全歸之於人事上努力得不够，主要地還是由於客觀上沒有感着最迫切的需要。現在迫切地需要普及教育的時代已經到來了。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倘若不能喚起千千萬萬的民衆來支持，來參加，倘若不能提高他們的文化水準，增加他們的認識，來頑強地鞏固這一個運動，誰也不能保證它會獲得最後勝利的。因此普及大眾的教育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已經作為相互作用的兩個東西。我們要普及戰時教育，來鞏固我們的民族解放的抗戰，同時我們要在民族解放的運動中來開展普及大眾教育運動，提高大眾的文化水準。我們幾十年來所沒有完成的一時工作，使它與民族解放運動同時完成，這實在是太值得我們幹的一件事業了。

（四）平時教育應切實地考慮戰時的要求，作全部徹底的改造，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教育成爲一個鞏固抗戰的支柱。不過，倘若爲了事實的牽制，一時不易辦到的話，我們要求它逐步向戰時教育的推移。

（二）戰時教育方案

（一）戰時教育之目的

1. 培養并充實軍事力量，以作持久戰，消耗戰之人力的補充；
2. 培養技術人才，以謀抗戰物力之數量的增加及效能的提高；

- 3, 謀民衆力量與軍事力量之携手;
- 4, 普及民衆教育, 提高民衆文化水準。

(二) 戰時教育之總則

- 1, 把一切產業組織, 戰時工作組織, 及任何可以形成集體生活的地方, 統在爭取中華民族之解放這一個目標下面, 變做戰時的學校。
- 2, 抗戰之一切活動及對於抗戰之全面的認識, 便是戰時教育課程。
- 3, 在上述新的戰時學校內所施行的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自我教育, 便是戰時教育的橫杆。

(三) 戰時教育之機構

- 1, 除研究院而外, 各級學校皆予以改造。
- 2, 全國設戰時教育設計委員會, 省設戰時教育工作委員會, 縣設戰時教育指導委員會, 來主持整個戰時教育工作。
- 3, 按(甲)各人之生理狀態;(乙)工作能力及(丙)當前工作需要, 將原有學生, 民衆以及失學兒童分別加入 4 所列各項組織。
- 4, 戰時教育機構。

(甲) 文化細胞與文化網。

文化細胞是戰時教育基礎的機構; 家庭, 工廠, 店鋪, 軍隊, 里弄, 村落統可以組織, 它的工作有識字, 傳信, 口頭新聞報道, 衛生, 唱歌等活動。

文化網則爲若干文化細胞之總體。它對文化細胞的活動負着輔導的責任。此外，它可以舉行壁報及其他文化細胞所不能單獨進行之事項。

(乙) 戰時工作教育機構。

利用戰時各種各樣的工作組織作爲戰時教育機構倘若文化網文化細胞代替了過去的小學教育及民衆教育，那麼這種戰時工作教育機構便多少是代替中學教育及普通科的大學教育。按工作性質分，可有義勇團護救隊，偵察隊，新聞網，國防生產突擊隊等新的教育機構。

(丙) 各種戰時工作幹部訓練班及救亡大學。

各種戰時工作訓練班有類平時教育之師範學校，救亡大學則類平日教育之師範大學。當前工作需要某種幹部便開辦某種幹部訓練班。

(丁) 研究院

這是與國防生產及軍事技術有關的研究機關；實科教授，成績優良的實科大學生及專家方得加入。

(戊) 戰時宣傳與教育機構

如劇團歌詠團，戰時普及教育隊，戰時教育服務團，農村服務團，宣傳隊等等。

(四) 戰時教育之方法

1, 如何把普通的團體和戰時工作組織轉變爲戰時教育機構

(甲) 建立嚴肅的集體生活。

2. 自我教育之具體方法。
 - (甲) 配合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情勢，訂定工作計劃。
 - (乙) 工作執行。
 - (丙) 工作檢查。
 - (丁) 自我批評。
 - (戊) 工作經驗的總結。
 - (己) 理論的檢驗及變化。
 - (庚) 理論與經驗的紀錄（時間與精力可能允許的話）。
 3. 每一機構內應設一專人或專組，負責主持計劃，檢查批評，總結，及校閱工作紀錄之責。
- (五) 戰時教育之課程
1. 必修的課程。
 - (甲) 集體生活中之各項知能爲集會，衛生，秩序等知能，團體與個人之認識等。
 - (乙) 世界大勢之認識。

- 一 近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
- 二 帝國主義與殖民地。
- 三 世界主要國家對立之陣容。
- 四 世界前途的瞻望。
- 五 其他。

(丙) 中國與日本的認識。

- 一 中國與日本之歷史地理的認識。
- 二 日本侵略中國之歷史。
- 三 中國國內之和平與統一。
- 四 中國全面抗戰與意義。
- 五 中國之必然的勝利。

(丁) 戰時常識如軍事常識，防空防毒救護之知能。

(戊) 民衆訓練工作的經驗與理論

(己) 識字教育工作的經驗。

以上可按各人，各戰時教育機構之文化水準而異其學習之程度。

2. 選修的特種科目。

按戰時工作組織之性質異其科目。

3. 研究事項。

(甲) 機器之製造與修理。

(乙) 賤價而又耐用的防毒面具之製造。

(丙) 汽油之代用品。

(丁) 生產合理化之研究。

(戊) 其他。

(六) 戰時教育之教師

1. 戰時教育之教師，已失去了它絕對的意義；不僅是教育者影響了教育了被教育者；同時教育者也為被教育者所影響，所教育。

2. 在不同的工作領域內相師相學。

3. 但在相對的意義上，教師還是存在的。

一切工作幹部都是戰時教育的教師；

前進的知識份子，前進的大眾，前進的兒童和技術專家——都是戰時教育的教師。

附錄二 戰時教育的課程（生活教育社提出）

張宗麟執筆

(一) 擬訂戰時教育課程的四個原則

第一，根據戰時教育方案，平時的各級學校應該暫時停止，另行建立教育機構，所以戰時教育課程必須依着新

的機構而訂立，不應該在舊時的學校課程裏加入幾許戰時材料與科目，（如在課餘加防毒等科，在其他各科中加些戰時教材）就算得戰時課程。

第二，新的教育機構必須根據當前的需要，及各人生理狀態和他的能力，所以這個新的機構在縱的方面可以有文化細胞，文化網，幹部訓練班，救亡大學，研究院等，在橫的方面仍舊存留着兒童，工人，農民，商人，士兵，家庭婦女和智識份子等，同時在工作的另一方面還有直接參加抗戰工作與做後方生產工作的不同，所以釐訂戰時課程就比平時的課程要複雜得多了。既要根據機構的縱橫兩方面，更要顧到工作的另一方面。

第三，釐訂課程必須先決定幾個重要原則。戰時教育課程的總原則當然是「抗戰」，在這個總原則之下，必然要分析到爲什麼要抗戰？怎樣纔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民衆怎樣加入抗戰的各部門？這三點也就是（一）抗戰的意義與認識，（二）發揮集體生活的力量，（三）民衆盡力學得戰時各種技術，並且盡力供獻各種技術到抗戰的途上去。這三個原則，在戰時教育機構的任何一方面都要完全遵守。

第四，課程的實施，是釐訂課程者必須顧到的。在抗戰期中不允許個人隨便生活，在戰時教育課程裏也就沒有給個人自由享樂的材料，或者造成個人將來可以享樂的科目，實施戰時教育課程也就必須用集體的生活中來配合戰時的需要。我們再不能用過去獎勵個人的風頭主義，再不應該用以前形式的班級制度，我們今後實施戰時課程必須通過集體的生活。換句話說，人民戰時的集體生活就是戰時教育課程。我們更可以說，將來抗戰勝利民族解放成功以後，全國人民都必須過集體的生活，今後的課程都必須通過集體生活而得實施。這裏所謂集體生活不是形式主義者的集體，就是說不是只有集體的形式的形式就算是集體生活。能够發生集體力量的集體生活才是實施戰時教育課程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在我們提出的教育綱要裏曾經提出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自我教育。這點雖然屬於方

法方面，但是不顧到實施方法的課程，根本就是不能實行或行了無效的。在平時還可以騙人，在生死關頭的戰時就不應該自欺欺人，危害整個民族。

(二) 課程綱要

有二點得先聲明：(一) 爲着討論方便起見，這個提要是依照年齡與職業等自然分界的，計分兒童，工人，農人，士兵，店員，中學生與大學生，婦女，其他等九部分。(二) 因限於篇幅，各級課程只是大綱的大綱，比較詳細的大綱，另行發表。

第一屬於兒童的 從初生到前期青年期(約十四歲)都屬於這期，暫時分列三個時期：

(一) 嬰兒期的課程 嬰兒唯一的課程是按時吃，睡，便溺洗澡等幾種養護。爲着集中人力起見，嬰兒似有公育的必要。在經濟力量不能做到盡善盡美的養護時，必須做到能够不妨害嬰兒的教育。

(二) 幼兒期的課程 在課程的形式方面如遊戲，故事，唱歌，工作等都可以保留，但是整個幼兒生活必須緊緊把握住「集體生活」的原則，盡力克服幼兒唯我獨尊的心理。各科的材料，必須利用兒童興趣，集中在「抗敵」「世界和平」二點上。戰時的幼稚園與嬰兒院應該合辦，並且應該採取公育的辦法。

(三) 兒童期的課程 在戰區的兒童，直接可以做抗戰的工作。如間諜，通信，救護，檢查等。所以戰區的兒童除一般課程外，必需選擇體力能够勝任的兒童，特別注重這許多工作。一般的兒童課程是：民族意識，抗戰意識，戰時常識，一切文字語言等。必須用這三點做實質。用每一村或每一街里爲組織單位，實施集體的生活教育；根據即知即傳的原則，採用小先生制等，實行前進的小孩教小孩兼教成人。

第二屬於工人的 工人本來是有組織的，並且對於本身的意識也相當清楚。利用工人原有的組織，實施集體

的生活教育比較容易。不過必須強調「抗戰意義」、「民族意識」二點。這樣纔能使工人了解在現階段必須先抗戰才有工人出頭的希望。工人的技術是需要相當學習時期的，訓練抗戰必需用的工人技術是工人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點。改變平時工業學校的迂緩方法及徒弟制的壟斷方法也是必要的，在戰時訓練工人技術，必須用突擊的方法。

第三：屬於農民的。農人是安土重遷的，利用這一點可以實施抗戰教育。擴大保鄉的工作便是抗戰。聯保組織不是農民組織，所以必須從農民自身利益上來組織，從這個組織裏來施行教育。農民也有相當技術，改進耕種的方法是農民教育中極重要的一科。不過必須與抗戰有利一點配合起來，各種烟草鴉片等是有害於抗戰的，必須即刻停止，又如爲着敵人種棉花等也應當停止。所以「農民技術」一科，必須遵守整個抗戰國策進行，不能以個人的收入爲利誘。

第四：屬於士兵的。中國今日抗戰士兵，都經過多年訓練。但是在訓練上是否應該增加二科？一是游擊戰，二是政治訓練。這一科有一部分是互相關聯的，如游擊戰的基礎是民衆組織；軍隊要做組織民衆的工作，能夠與民衆組織配合起來作戰，必須有充分的政治訓練。

第五：屬於店員的。店員佔市民的多數，但是從來沒有很堅強的組織。所以「組織店員」與「了解抗戰的重要性質」是店員課程中最重要的一科。許多補習學校平時以補習店員的技術爲唯一目的，今後應該把這些技術科目放在第二位。

第六：屬於中學生和大學生的。過去教育賬雖然不應清算，但也不能不急去補救。過去中學生和大學生的政治訓練是不夠的，尤其是實踐方面很欠缺，所以這方面應該特別加強。其次中學生與大學生已有的能力是各各不

同的，應該斟酌他的能力，立刻在實際上學習，使他的能力突進，例如學工科的學生，過去學了三年還不能實用，現在必須在一個月內使他已有的知識在實踐上與工作緊緊地配合起來。其他如文科，法科，醫科，商科，教育科等都應該如是。

第七：屬於婦女的 凡女學生，女工人，女店員和農家婦女都可以引用前幾項課程。只有一般家庭婦女，平時真是過着天高皇帝遠的生活，戰時不但不能有助於戰士，反而爲壯丁們的累贅。在抗戰期中可以運用許多臨時組織如里弄組織等，使這批婦女從家庭裏跑出來參加集會，又從集會中加以初步的政治訓練，同時分派她們做各種有助於抗戰的工作，如做戰士的衣服等。經過一個時期，指導這批婦女自己單獨組織起來。

第八：其他 不屬於上述七類的民衆很多，如和尚，尼姑，道士，教士，無職業的遊民，（靠幫口吃飯的流氓也應列入這類）妓女，舞女，肩販等。這許多不同職業的民衆，有的在戰時不得不失業的如妓女等，有的可以歸類的，如和尚等可以總稱爲教民，分述如下：

（一）教民 各種宗教爲着維持他的當地勢力，對於戰爭決不會袖手旁觀的。所以這次抗戰發動，教民參加救護等工作很踴躍。我們應當趁這個機會給他們正確的政治教育，使教民明瞭抗戰的真義，參加抗戰中救護等工作不是爲着神道。

（二）遊民 遊民與失業羣不同。遊民是各業中都有的，平時完全靠蔽詐過日子。這般遊民在戰時的危險性很大，——做漢奸。不過遊民都有封建的組織。通過這個組織，抓住他們的龍頭，施行正確的政治訓練同時用分配失業羣的辦法，分配他們到各業去。利用遊民已有的能力給他各種技術的訓練，也是很重要的功課。

（三）肩販等 與肩販同性質的有車夫，挑夫等，在鄉村裏都是農民的副業，在都市裏才是專業。這些人本來

有組織的，不過是驚口的組織，缺乏政治作用的，所以改進他們的組織，應該是最重要的一科。初步的政治訓練當然可以在改進組織中做去，就是說改進組織與初步政治訓練是一件事的兩面。

(四)屬於官吏及公務人員一部分 在戰區內的，只能在各項公務上受訓練，在後方各省可以用最迅速的方法，集中訓練，科目注重於消除養尊處優的態度，養成辦事迅速與認真的精神，並糾正對於政治的認識，至於各種技術訓練，在事實上是來不及做的。

末了，必須提出來的，就是對於有專門學問的學者。平時已有的研究院，不但不應廢棄，並且應當擴大，同時也應當竭力增加研究的效率，真理與學術決不會騙人的，在今日的中國，誰能夠對於民族解放的抗戰有供獻的，誰就是。有真本領真學問；同樣的，無論那一門學問，倘若對於世界和平與中華民族解放運動最有供獻的，這門學問，我們必須盡力研究。不然，無論是玉皇大帝創造的學問；無論是天之驕子的學者，我們只好請他罷休！

(抵抗)

附錄三 戰時教育的教師（生活教育社提出）

張勁夫執筆

根據前面我們所提出的基本意見，戰時教育的中心準則，便是「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或「集體主義的實踐教育」。我們認為戰時教育的教師，已隨着戰時教育內容方式的根本改造，而變其性質了。他雖然還是存在的，但已失去了超然的地位，絕對的意義。他已不是像過去那種如「教死書」、「死教書」爲生的教書匠，而是集體實踐抗戰工作上面的工作，指導員，或文化技術輔導員。他教育人，同時也接受人的教育；他影響人，同時也接受人的影響。在集體生活裏面，他不是一個超然的空頭先生，而只是執行集體工作，推動集體生活最積極主動的一員。我們必須肯定所謂教育的作用，不是死知識的傳授，而是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生活與生活磨擦下面發揮的。所謂教育的效能，

不是死知識的記分，而是在具體工作的實踐與開展上面來考察的。

根據我們所提出的具體辦法，我們認為要開展戰時教育工作，目前迫切地需要着如下的教師：

第一，在各種大學專門學校研究所方面，需要自然科的各種技術專家，以及各部門的專門人才。

第二，在中小學生的抗戰工作組織方面，需要大批的青年兒童的工作指導員，文化技術輔導員。

第三，在各種戰時工作組織，職業團體方面，需要政治及戰時常識的技術指導員。

第四，在一般民衆方面，需要着最大量的民衆教師，——民衆運動的工作幹部。

推行戰時教育有一個核心要求，便是要「速」而「有效」。目前究應如何很快的來解決上面所提出的教師問題呢？我們認為有兩個根本要點：第一對原有的教師，絕對不能估計過高，須得很快的把他們大大的訓練改造一番，改造他們必須是要合乎：一，對抗戰有正確的認識，二，適於集體主義的生活，三，能在實踐工作上面輔導人影響人的條件。第二，對七十二行的手藝人，廣大的前進青年兒童及民衆，絕對不能估計過低，他們只要加以短期的緊急訓練，便都可以成爲有力的技術人才，政治文化輔導員，宣傳與組織的幹部。依此我們認為須迅速的用如下的方式來解決教師問題：

在各種大學專門學校研究所方面，首先要將原有的教授技師，加以短期的訓練，如不夠，再向國內及友邦去廣泛的搜羅。

在中小學生的戰時工作組織方面，須把原有中小學教師加以根本的改造，再充分運用大學裏面的優秀份子，加以短期的教育訓練，便都是很好的中小學教師。

在戰時工作組織及各種職業組織方面，重在集體自我教育。臨時需要的政治教師或技術教師，可與政治工作

的團體及技術機關取得聯繫。

在一般的民衆方面，這是戰時教師最主要的一個部份。我們認爲須舉辦大量的幹部訓練學校，每縣至少辦一所。招收文化人、普通科的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及前進的大衆，分成若干組，加以軍事政治文化技術的普遍訓練，其訓練辦法可分三點：一、首先集中在一起，訓練基本的學科。爲期最長可過半年，頂好是兩個月。二、然後分發出去担任各部門工作，每週分區舉行訓練一次或兩次。三、再以工作性質分成若干組，經常作研究活動，另請專家巡迴輔導。出席各組研究會，作經常的巡迴訓練。戰時教育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把一般散漫民衆訓練組織起來，因此，解決一般民衆的教師問題，是當前最迫切的一件工作。

目前也正有着許多人在談戰時教育問題，然而他們所談的戰時教育，內容既不求根本改造，對廣大的民衆教育更忽略不管。因此，在教師方面，他們所考慮的，只是替原有的找出路尋飯碗，既不改造舊有的，又不提訓練新的幹部。我們可以說，這種戰時教育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我們要向廣大的教育工作者號召，要實行戰時教育，絕對不是你過去那副身手所能勝任的，你必須自動自覺的來在當前偉大的抗戰洪爐裏改造自己，鍛鍊自己，使自己真正成爲一個能幹而強有力的戰時教師——不，抗戰工作指導者。

我們要向廣大的文化人青年學生前進民衆小孩子號召，你們不是要獻身抗戰嗎？請到教育的戰線裏來作普遍而深入的民衆動員。請不要忘記，沒有廣大的民衆起來，我們的抗戰是不會有光輝的前途的。

當客觀存在着變革的根據時，人的努力，便是舉足輕重的條件。全國教育工作者擡起手來，加強我們的戰鬥力，擴大我們的戰線，守緊我們的崗位，面對着廣大的青年民衆努力吧！——作艱苦而實在的努力吧！

上海市戰時普及教育服務團工作大綱

一 工作總路線

- (一) 在戰時工作的組織中進行教育。
- (二) 將民衆組織起來，進行教育。

二 工作的原則

- (一) 在有組織的行動中，執行全面抗戰時的自我教育以輔助他人計劃學習爲主要任務。
- (二) 在各個不同的對象中運用各種不同的形式；但以抗戰爲歸宿。
- (三) 教育民衆的組織，應從文化的、經濟的發展到戰時工作團體，在每一個進程中引起其自覺。
- (四) 全面抗戰越發展，都市將越縮小，因此本團工作，應特別注重鄉村。
- (五) 文字符號爲民衆取得抗敵救亡知識的必要工具，因此本團應鄭重注意文字之普及的工作。
- (六) 接受黨政機關指導，並取得當地駐軍人士密切聯絡。

三 工作內容

- (一) 在各種與本國有關係的組織（包括已有的及新創的）內，進行集體主義的教育。
- (二) 在各種與本國有關係的組織內，進行一般政治教育。
- (三) 在各種與本國有關係的組織內，就主觀力量所及的範圍內，進行戰時技術教育。
- (四) 在各種與本國有關係的組織內，進行宣傳，組織民衆之理論經驗的教育。
- (五) 在文盲中施行識字教育。

(六) 運用原有的學校及教育團體改造質的內容，進行適合戰時的教育。

四 工作及其進行

(一) 本團之下層基礎工作

甲 在已有的各種戰時組織中，如：

a 軍隊 b 義勇軍 c 救護隊 d 傷兵醫院 e 偵察隊……等。

乙 在鄉村裏，在生產與職業性的組織裏，如工廠，店鋪，礦穴中，建立經濟性，文化性，或戰時工作性的團體，如：

a 互助會 b 讀書會 c 歌詠會 d 國術隊 e 俱樂部 f 工人義勇隊 g 保衛團 h 農民義勇隊 i 除奸團 j 偵察隊 k 失業工人會 l 婦女救國會等，按需要分別舉行 1. 2. 3. 4. 5. 四種教育。

(二) 推動地方當局及學校當局改變教育機構。

1. 建立中學生救亡協會；

2. 建立小學生救國團；

3. 建立小先生團，小先生隊。

輔助其執行上款 1. 2. 3. 4. 5. 各種教育工作，並進行彼等自身之自我教育及上款之第四項教育。

(三) 在上述各組織中，選擇優秀分子開辦訓練班，培養各團體自我教育幹部。

(四) 本團團員自身之自我教育。

1. 一般的訓練（包括政治集體自我教育、宣傳與組織）

2. 戰時技術的分組訓練；

3. 其他文化上的修養。

（五）擴大戰時教育運動：

1. 出版定期刊物；

2. 建立戰時普及教育服務網；

3. 口頭宣傳；

4. 擴大組織。

（六）戰時教材編輯：

1. 兒童戰時教材；

2. 民衆戰時教材；

3. 宣傳組織民衆之理論及經驗。

（抵抗）

新聞動員

新聞抗戰論

沈志遠

新聞輿論界的戰線，是縱的全面抗戰中的一面，而且可以說是極重要的一面，因為現代的報紙，不單是簡單地應做「民衆的喉舌」，而且尤應積極地做民衆意識的啓發者，指導者和組織者。因此，在目前全民族對敵抗戰正在展開的當兒，新聞界實負有異常重大的抗戰任務。

那末所謂新聞抗戰的實際任務究竟如何呢？

我以為這種任務可以分爲消極的和積極的兩方面。消極的任務是報紙應該盡全力跟一切足以動搖和分裂我統一的抗戰陣線的輿論和謠言，做嚴酷的鬭爭，務必使讀報的民衆不致爲敵人和漢奸的謠言所動，亦不致爲妥協派苟安派的言論所惑。例如最近我軍因爲軍事戰略上的關係，而按照預定計劃自動撤退至足能應付長期抗戰的第一道防線，這明明是我軍戰略運用上的一種成功，而前幾日一般奸人竟有謂這是表示我軍失利，並散布我軍即將放棄開北及淞滬全部陣地的謠言，當時且竟有好多民衆爲這種無稽濫言所動。當時我們的報紙，除少數特撰專論予以嚴正評述與駁斥及發表我軍事官長解釋撤退談話外，多數報紙僅僅千篇一律的刊登一則撤退的消息，同時既無

專文解釋此事之意義，事後亦無抨擊上述無稽謠言的表現。這是表明我新聞界尙未充分執行其消極方面的抗戰任務之一例。

新聞抗戰的積極任務是：報紙應當用一切方法，從一切方面去鞏固全面抗戰的陣線，督促和推動這次抗戰到它的「邏輯的終點」，以保障最後的勝利。譬如說，大家知道抗戰單靠軍事是不行的，必須要發動全國民衆的政治總動員，把民衆多方面地組織起來，訓練起來，發動起來，使之直接間接地爲神聖的民族抗戰服務；只有這樣我們的最後勝利，才有大半的把握。在這方面——在號召，鼓勵和推動（甚至指導）民衆運動的專業上，新聞紙實負有非常重大的責任。無論關於這方面的消息的露佈，新聞题目的標法，以及社論的撰述，都無不應具有號召和鼓勵的戰鬥性質。對於其他與保障抗戰勝利有極大關係的政策問題——如外交上的對日絕交與對蘇密切合作，內政上的健全抗戰的政治機構等，——新聞紙都應當負起同樣的戰鬥任務來。總之，只新聞界及其他各方面的抗戰跟軍事的抗戰緊密地配合起來，我們的勝利才有保障。

（立報）

抗戰發動後的新聞界工作

薩空了

現在中國新聞紙的第一缺點，就是牠的報道信用在民衆間非常不好。知識民衆對於新聞紙的報道幾乎完全無信仰。知識較低落的民衆，對新聞紙只肯信一半，那是爲了他們由於實際的經驗，（

以大白後的事實去對證過去新聞紙的報道而得的經驗。曉得新聞紙的報道，最多只能相信百分之五十。什麼隱毀了新聞紙的信用？為什麼新聞紙不在求讀者信仰上努力？——答案是一切都要歸罪於「新聞檢查」的執行不得當。

抱了得扣就扣的態度執行「新聞檢查」，已使新聞紙漸漸的謎語化了。大家接到一張新聞紙後要「猜」，平時其影響業已很壞，戰時依然如此，其結果簡直不堪設想！所以非常時期到來，要想叫新聞紙發揮效能，第一就是要改善新聞檢查制度。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過去任何一次內戰時期間的「洋商招牌中文新聞紙」和「外國文新聞紙」的身價之高，就可以曉得我的要求的重要性。以過去內戰的經驗來推斷，如果國人自辦的中文新聞紙在未來大戰期內不能刊載「洋商招牌中文新聞紙」和「外國文新聞紙」所能刊載的新聞，那中文新聞紙簡直大可以全體停辦。即或不停辦也沒有有人信仰，還不是和停辦了一樣。

何況將來中日的戰事，也許仍將採取戰而不宣的方式，那麼國內各地日文報紙的發行當然不會停止，爲了中文新聞紙民衆不信仰，敵人的宣傳伎倆，在中國民衆間一定可以大售。假定日文報紙可以封鎖了，不叫同胞看見，但其他外國文新聞紙，決不能一樣封鎖吧！那麼其他外國文新聞紙，還是可以作日人通訊機關的傳聲器的。——所以我認定「新聞檢查」的不改善，希望新聞紙在非常時期中在宣傳方面有貢獻怕是很難。

新聞檢查如果改善了，第二步我覺得目前中國新聞紙本身需要改革的，就是應求意識鮮明正確，文字淺近易懂。

現在一般的新聞紙的編成，就像是縫就了一件百衲衣，零碎拚起，花色都令人不易辨明。這毛病就是因為編輯部沒有一貫的編輯方針，自己所編的新聞紙的意識如何，自己也鬧不清。這在平時影響還小，一旦跨入非常時期列強在軍事上雖一時不會參戰，但在宣傳戰方面，一定會隨着發動，一種新聞紙自己如沒有一個中心認識而糊裏糊塗的替所有的外國通訊社作「傳達」，一定是把自己的民衆營陣也攪得一塌糊塗。

至於目前各種新聞紙的文字，的確是都嫌深奧，尤其是評論文字更多難懂。試舉最近立報小茶館所指出的某報的評論爲例：

「溯自……已亘六年……要皆……昭然世人矣……夫……勝流羣彥靖共在位……亦其宜矣……今茲……固屬杞憂……者也……初不必……之左券……」

用這種文字說理，想叫大衆明瞭，豈不等於「緣木求魚」！新聞紙的評論、記事，全用不着掉書袋，越說痛快語，老實話越有力量；在民衆間才易喚起共鳴，實際上也才能收到效果。

所以我認定新聞紙在非常時期中應求意識鮮明正確，文字淺近易懂就是爲了上述的理由。這第二步再能有作了作到的希望我們庶幾可以談談新聞紙在非常時期的工作了。

我以為依中國現在新聞紙的銷行實況說，上海每日最多的報紙沒有超過廿萬份的，（外埠銷路大約尚佔三分之一）以這個數目比上海的人口，相差實在太遠，由此我們可以估計到新聞紙所肩負的宣傳工作，給民衆的影響，並不如我們的理想——牠可以將全民推動——那樣偉大。

由此我們遂可以決定我們印行一種新聞紙，在戰時應自視爲編印了一種教學法，那些識字能看我們編的新聞紙的人，可以當他們作教書的教員，我們的目的，應在一面鼓起教員的興趣（例如鼓吹人人有喚起民衆的職責）叫他們熱心去教導他們的學生（即一般不看報，不常看報，和不能看報的人）一方面，並供他們教材，（系統的明白的把新聞報道給他們，並有條理分析時局）叫他們教導時不感困難，而藉此收到全民可被推動之效。

在這原則下，我更主張報紙應竭力鼓吹「壁報」和「活報」的推行，壁報的寫出應全以口語爲準，可以叫稍知文字的人了解時局，可以借稍知文字的人的唸出，也使不識字者知道時局。活報比壁報尤「活」牠可以借動作俚唱把時事報告給不識字的人。這樣新聞紙，打不入下層的困難，可以間接的得到解決。新聞紙只須正確的來推動那些寫壁報，表演「活報」的教員就夠了。（在這一點上我以為應與教育戲劇工作者取得連絡。）

進一步，再來擬定新聞紙的工作方法。

新聞中的專電特寫通訊社稿，是事實報道，評論是時事報道的補充說明，副刊我希望牠在戰時

能成爲討論隨時隨地應付時局的園地。有許多人想戰事起後誰還要看副刊，但我却把副刊看的很要緊。我以為如果副刊能夠辦的好，牠的推動力會大於評論。因此我又有了一個副刊的計劃，我希望一地各報副刊記者，能至少每週和各報的新聞與評論記者，有一種座談的集合。在非常時令中，每週大家共同議定幾個議題，作爲本週本城各報向民衆宣傳推行的目標。然後各報在這一週中，都集中在這一個問題的討論上。其影響民衆之深，自然要較現在的副刊大的多。至於主張新聞和評論記者參加這種座談，一方是希望他們幫忙設計，一方則是希望步調一致。

副刊的議題可分二種性質，一種是「煽動的」(包括說理的文學，歷史的重述)一種是「灌輸的」(包括軍事醫藥常識等)煽動的在希望民衆有所活動，如集款等。灌輸的在希望供給民衆知識，如怎樣防毒之類。

最好副刊中能有圖畫作爲輔助，對民衆宣傳上便可有力。使一般教員們，教導他們的學生時，也易於說明。不過這問題有點牽涉到藝術漫畫範圍了，可以不談。

如上述計劃能辦到，新聞紙的效能，比現在將大大的增加，所餘的就是宣傳什麼的問題了。在這個題目下，我希望今後當局能在兩方面予新聞界以輔助：

(一) 在新聞方面，希望當局能幫助「報道」迅速正確。華北事變發生後，上海各報都感到我們自己的報道慢於日人。這一方面固和新聞紙的人力有關，但發電的積壓也是最大問題。新聞加急電

都沒有平日的新聞電快。這還是在平津大電局裏發報。今後大戰展開，發電的地方一定是沿津浦，平漢，平綏三路的小站電局，積壓自更在理想中。所以我希望中宣部交通部能早考慮到此事。如在各路軍中除軍用無線電台外，得各設一專發新聞的無線電台，以使前方和後方呼應靈活。

(二) 在時局內幕方面，希望當局隨時向新聞界宣示，儘可爲了事實上的關係而不叫發表，但不要連新聞界中人也欺瞞，這樣在宣傳工作上政府與民衆間才能完全一致，宣傳也才能收到效用。

(國民週刊等戰時聯合旬刊)

藝術動員

全面抗戰中藝術家的工作

倪貽德

自從我們的英勇壯烈的全面抗戰開始以來，已經有一個多月了。在這一個多月中，我們可以看出全國一致，上下協力，以齊赴國難的決心了。尤其是前線忠勇的將士，浴血抗戰，視死如歸，給侵略者以莫大的打擊。而其他各方面的同胞，也都努力於抗戰時期的工作，真所謂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從此看來，我們的最後勝利，和民族復興的希望，是具有十分把握的。

但是我們再回顧我們的藝術界，却不得不自愧過於沈默了。除了少數的漫畫家木刻家在發揮他們的尖銳的筆枝之外，許多洋畫家，國畫家，大部是消聲匿跡，沒有一點動態。固然在抗戰時期，藝術是不能像大砲飛機的可以發揮殺敵的威力，但這次的抗戰既是全民的動員，那麼藝術家也當盡其一部分的能力，參加到戰爭中去的。

在抗戰期中藝術家所要做的工作，顯而易見的，便是製作諷刺的漫畫，宣傳的廣告畫，以暴露敵軍慘無人道的獸行，提起我們民衆抗敵的情緒。這都是目前很重要的工作。但除了這些以外，還有一種更重要的工作是須由藝術家擔負起來的。

以前有一般輕視藝術的人常說藝術不過是「歌功頌德」的工具。但那功德是值得歌頌，那麼那種藝術便有它的偉大性存在。這次的對日全面抗戰，是為爭取我們民族的生存權，保衛我們的祖國的戰爭，而且更是保衛全人類的福祉的戰爭。我們前線的忠勇將士，以大無畏的精神，用血肉來換取我們民族的生存；這種豐功偉業，正是值得我們來描寫歌頌，以作我們民族的永遠的紀念的。雕刻家可以用堅固的金石雕塑他們的英勇的姿態；油畫家可以用巨大的壁畫來描寫他們的壯烈的戰跡。這樣，我們的忠勇的將士既可以由藝術而永垂不朽，而藝術也可因這種題材而成其偉大。

說到紀念的工作，當然須待諸得到最後的勝利之後，在這全面抗戰正在開始的時候，還是無暇顧及。但是我們的藝術家，至少就應當作這樣的準備。因為要描寫戰士的姿態和軍械的形式，必須對於這些有深刻的觀察和研究，要描寫戰地的情景，又非有實際的體驗不可。而這種「戰鬥的場面」又不能讓你從容地去作寫生，則更非應用極大的想像力不可。而且那種大幅的巨作，需要多數人的插入，就必須應用繁複而艱深的構圖學的原理。凡此種種，都是值得我們充分地注意的。

我知道現在我們許多的藝術家，並未去「從戎」，却早已「投筆」了。當然，在這大砲飛機的轟炸之下，誰又能安下心來躲在畫室裏從事製作呢？但與其無聊地觀望，不如仍舊從事製作。我以為在這抗戰期內，藝術家應當更努力於製作，不過我們製作的意識和題材，却應當改變方向了。

自然主義的作家們常說：「我們應當描寫日常所見所接觸的一切，」那麼我們的畫家現在日

常所見所接觸的是什麼呢？我們不是每天看見敵機的翱翔，大砲的轟擊，炸彈的火焰，和整批整批的可憐的難民麼？在這長期抗戰的中間，戰爭的生活，就成爲我們的日常生活了。我們不應當把捉了這種題材來作藝術的表現麼？

我們不妨仍舊描寫人物，但應當以前線將士的雄姿來代替少女的模特兒。我們不妨仍舊描寫靜物，但應當以槍砲子彈來代替香蕉蘋果。我們不妨描寫風景，但應當以戰地血腥的場面來代替悠閑靜寂的湖光山水了。

但我們又不像自然主義的只是消極地作客觀的描寫，我們是要用了民族抗戰的意識，用了新寫實主義的手法，作積極的主義的表現的。我相信這樣的作品，對於全面抗戰乃至民族復興的推進中，不是沒有效力的。

（救亡日報）

抗戰中的文藝運動

王統照

文藝活動是人類社會活動的一種。牠與政治活動宗教活動等，是一樣的，具有理智、情感、意志的人間性的根據，不過表現的方法不同，因之效果的取得也另有所在。思想與情感的綜合，用文字、圖畫、聲音、其他象形的具體表現，由一個人的心中傳到每個人的心中，由往古傳到現代，激發我們的愁、喜、哀、樂，引動我們的尋思，希求，證實我們的戀念、詛咒，因之影響到我們的思想與行爲，這便是文藝的效

果。

文藝作品雖出自個人的心中，手下，然而牠逃脫不開社會環境的密切關連。或直接，或間接，或本相，或變相，在一個時代的文藝表現中總會找到時代的影子。人類既不能超世而獨立，而一樣是人類活動之一的文藝，如何可以蔑視了時間與其間的牽連。在種種文藝史上之很多的證明，在每個時代的作家中有很多的表示，現在我不暇一一列舉。

簡捷說來，我們當前的局勢是遇到了一個最偉大最嚴重的試驗。我們全民族的生死存亡，我們國家的中興或覆滅，在此一舉。這正是一種辛苦艱危的試驗！文藝界原有地的使命，在當前，我們更應分整頓起全國文藝界的精神，統一文藝界的步驟，結合文藝界的氣力，担負起當前的使命！把豐富新潔的血液與悲壯堅強的精神，無畏無愧的信念，維持人與保衛文化的毅力送予在辛苦艱危的試驗中，我們的民族文藝界纔無負於牠的重要的使命！

因此我們的文藝運動在抗敵期間需要組織，需要力量，需要大家握起手來迅速地作文藝的動員。

一個國家的各方面，平時與戰時都要有極大的差異。因為當非常時期中，我們不能再像平時那末散漫，拘執，那末從容，那末閒靜。諸君，你們自然會想得到現在每一天空中，或者可以說每一小時中有多少前線的軍士死亡，或傷殘了肢體；有多少難民在敵人炸彈槍尖下完結了他們窮苦悲慘的生命；

有多少建築、物產，化爲灰燼。諸君，戰爭在我們的土地上，無論是南方北方，重要的城市，偏僻的山村，幾乎每一小時中都受着火雨的噴射，血流的潰決。當前這是一個甚麼時代，還容得我們不提起精神，不充足氣力，作各方面的活動？我們耽誤一點時間便減少一分活動的效果，我們不需要空言，當前的慘酷還不能使我們任何界的人民有悲壯勇敢的覺悟？

追述到過去的——也可以說戰前的文藝運動，這幾年來，尤其是從九一八以後，雖然文藝界中也有過微小的爭論與派別的分歧，但潮流所趨，國防文藝的急起直追，已經給文學作品的讀者，藝術作品的鑑賞者以新鮮有力的刺激。必「有所需」然後纔有何種作品出現於讀者鑑賞者之前。我們相信，有血有肉的文藝家他一方面是站在時代的尖端作新潮的領導人，一方面他也明白時代的需求，用文字、繪畫、聲音與各種象形的藝術表現出激動、慰安、引導的工作。試一檢視過去數年中我們文藝界的工作，雖有差別，雖有的不免粗疏，但大多數的作家，尤其是青年的作家，他們的字裏行間，他們的歌曲色彩中，都充滿了憎恨、憤激！他們都有一顆活躍的心與勇往的精神，不消極，不悲觀，不逃避現實，把一腔爲國家的民族的熱情寄託在他們文藝作品裏。不必自誇說這幾年來的文藝運動已產生了極偉大的效果，然而我們也正不必「妄自菲薄」，認爲文藝運動只是一個空壳，與民族精神與國家命運無所關連。

現在，文藝界要怎樣動作纔能加強牠的力量與完成牠的使命我以為有下面的幾點不可忽視。

第一，統一的組織。有些人的想法以爲文藝界最要不得的是統一與有組織，甚至憂慮到會發生一個模式的呆板，有礙於創作的自由。這在平時或尙有可資討論的餘地，（其實那是杞人式的憂慮）當前，我們還能作這樣迂闊的顧慮嗎？從抗戰以來由各種文藝刊物上，各種的文字與圖畫，木刻，歌曲上看來，在思想與理解一方已經有很鮮明的統一的步驟，這正是「人心同然」的自然表現，在平時難以有的情形，當前，凡從事文藝運動的，其思想，認識，情感，當然都向這同一目標跑來，這倒不必耽心。不過，這裏所說的「統一的組織」是指的怎樣方能擴大大家合作的力量更迅速，更有效力的把當前的文藝使命傳播開去。

我想所謂「文藝運動」四個字是包括了凡用文字，聲音，繪畫，雕刻等等表現方法的各種活動。以前，我們的文藝界還不免過於狹隘，——那自然是有其客觀的條件的，不過，現在如果想把文藝運動組織起來，應該擴大，應該包含着各種各式的具有文藝性的活動。在戰時，更容不得文藝界自翹清高。（其實即在平日這也是一種錯誤的傳統觀念。）如果能將小說家、詩人、文學評論、戲劇作家、繪畫家、漫畫家、木刻家、電影界、雕刻家甚至說鼓詞的，唱申曲蘇灘與各種小調的遊藝人都容納在這抗戰期間的文藝運動的統一界線內，分門別類，或創作，或調查，或調整材料，或活動表演，從最高偉的文藝觀念到最通俗的唱，做，表達，都在一致的信念，一致的目標下激起民衆熱情，分子精神的食糧，這是何等的一件偉大而重要的工作！老實講，文藝從原始以來就少不了宣傳性，——無論是自我的宣傳還

是集團性的宣傳。現在，我們就應切實周密地藉文藝的工具達到熱烈宣傳的目的！抗戰以來文藝界各團體與個人間的努力已經有了很好的成績，這還不夠，我們希望這統一的組織趕快完成，趕快盡力於牠的職責！我們相信，各文藝團體各個作者自由的活動一樣有牠的效力，但為避免人力物力的多費，避免參差複雜的活動，與為分配工作的便利起見，還是有統一的組織相宜。我們要用協會的精神與「各盡所能」的力量，在文藝界當前的統一組織下，分工合作。因為這樣，有人可以設計，有人可以執行，有人可以專心創造，有人可以努力表演，一洗過去分離散漫的習氣，而同時能收到迅速的運動效果。

第二，分工與合作。宣傳要達到迅速與激動的效果。我們自然不能在短時期內希望有極偉大崇高的創作立時出現，所急需的，是怎樣加強文藝宣傳的效率問題！既然第一步有了統一的組織，在這個強固的組織裏須有精細周到的計劃與實現種種計劃的推動力。從事文藝運動的各作者，各有所長，不要浪費了他們的時間與精力。在這個總組織中各各分擔他所能的，願意盡力的任務。這是所謂「分工」，不僅僅在名目上，當然是切實地分開各作者的精神活動，也不僅要把着筆桿，執着繪畫板在屋子內凝想，更要用各種方法向各個社會層去分布大家的表現。又不僅是形成一種具體的觀念，空洞地送與民衆，更要利用表達出的巧妙方法，使前方後方的軍士、人民，都有深沈的感受。一提到文藝界三字，很易誤會成這只是高尚清雅的玩藝，與一般人無關。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二十餘年，還沒

會完全改變這樣狹隘的觀念，趁這全國抗戰的時候，我們還附帶着要將文藝運動普及於全國的每一個角落裏！

分工的方法有待於大家精密的計劃，現在只可舉幾個例子。類如戲劇，電影具有表演性的文藝活動可列於一組之中；遊藝性的通俗的宣傳，如各地流行的民間歌曲，用方言或自由腔調，便於唱便於簡單的表達的彈詞鼓詞等，也可獨成一組，一方創作新的材料，一方與向以此類遊藝為生活的演唱者切實聯絡，把陳舊的詞句換掉，供他們利用舊形式有新內容的唱，做，把種種的抗戰以及多方面的激動傳達於一般民衆。類如繪畫，木刻等性質多少相近，亦如上例辦理。總之分組不要太散亂，太複雜了，可以省卻討論組織上的小衝突，與彼此取得合作上的聯繫。如能更擴大，更有資力的基礎時，可以派人到戰線上，或選定內地的某幾處，去選取題材，用記錄，攝影，通信等方法。同時又可以在前線，後方，作文藝的表演，宣傳。這裏需要文藝運動各部門的通力合作，又須擔任總組織的負責者能先有策圖，有接洽，期用少許的資力收到最有力的效果。譬如，聯合幾種文藝刊物由總組織加以助力，派遣報告通信員到前線與內地去，只要減少困難，我相信有多少青年作者十分願意地去做這等工作。還有，怎樣用經濟的方法刊印布文藝的小冊子，（包括文字與繪畫）與作戰中的軍士，與各地的民衆，又如團體的戲劇表演，簡短的電影傳布，怎樣明定總組織與各文藝團體的界限，與怎樣分工怎樣合作便利，這都要經過精詳的籌劃，與切實的力行。總之，這樣的文藝運動是普及的，通俗的，萬不要自

限於清高孤獨的境界，萬不要輕看了有計畫的分工合作的效果。所以，要通俗化，要普遍化的理由，不須多說，不過怎樣計劃怎樣推行，這確是目前的文章運動的急務。以上所舉的例子只就想到的略談一二，自然不是詳盡的。

當然，文藝運動要有組織，有力量，要聯合一切的文藝作家，有文藝性的表演者，通俗文藝的傳布者，來一次嶄新的貢獻。至於對偉大創作的期待，在這樣嚴重刻苦的時代中，自然有許多動人的題材與不事強求的熱誠，未來一定會產生出的！我們從良心上不能把時代拋遠去；從責任上不肯把時代模糊過去；從文藝的使命上我們更不忍無所表現！當前——我們抗戰中，也是精神活動最能收到效果的時候，我們的文藝界應該有目光，有認識，有迅捷的動作，向前邁進！

諸君，我們要怎樣纔能有豐富新潔的血液與悲壯堅強的精神？

我們怎樣方能確定大家的無畏無愧的信念，與維持人道保衛文化的毅力！

這不是我們的文藝界的當前任務嗎？

（救亡日報）

抗戰期間的文學

阿英

緊隨着日本帝國主義襲擊我們的炮聲而開展的全面抗日戰爭，現在已經是如火花般的從各方面爆發，並且給予敵人以很嚴重的打擊了。全國的文藝家，爲着保衛自己的祖國，爲着爭取自己民

族的解放，是全部的參加了戰爭，用着特殊的文筆武器，在國內外和敵人開始了肉搏。

不過，我們的文藝家，雖已盡了很大的力量，而且有了相當的成果，但和全面的戰事配合起來，很多的地方，都不免令人有「不夠」之感。運動的中心，依舊是停留在智識階層上面。這樣，我們所能收得的效果，是不會怎樣廣大的。爲着保障戰爭的勝利前途，我們不能不更進一步的向全國的文藝家要求，希望在共同努力之下，能更廣泛的把讀者對象伸展到廣大的小市民層里去，工農大衆中去，至少，我們希望下列的著作，在目前，能夠大量的產生。

第一，是無線電播音所需要的作品。無線電播音影響的廣大，是超過一切的印刷品在這一次戰爭中，在募捐與徵集前方用品方面，播音已表現了最大的力量。我們決不能放棄這強有力的武器。除繼續產生新的大衆歌曲而外，我們希望有多量的播音話劇，抗敵京戲，朗誦小說，抗敵蘇灘，抗戰開篇……產生，以鞏固我們抗敵戰線，完成民族的解放戰爭。

第二，是街頭里街文學的產生。在後方，現在無處不是擁擠着民衆，雖然在每個人臉上表現了對民族抗戰的熱情，但散漫，無組織，對這一回戰爭沒有深切的理解，却是不可掩的事實。我們希望有多量的街頭里街文學的產生，以教育他們，組織他們，使我們的抗日陣線更形鞏固。我們需要新的七字唱，我們需要「活報」，我們需要有文藝性的「亂彈」，「蘇灘」，以及街頭里街民衆，特殊是難民所迫切需要的作品，通過這些作品，使他們了解這一回戰爭的意義，應如何的參加前方工作，如何的鞏

固後方，如何的隨時檢舉漢奸，如何的組織教育自己。這一方面的工作有關於前線的勝敗，我們的文藝家應該以更大的力量，幫助這一方面工作的開展，要說在租界上演唱有困難，則我們儘可以在難民收容所，並通過各甲弄的組織，從事於室內演唱。

第三，是適應於前方戰士及傷兵醫院的通俗文學。前敵的將士，整天的浴血於槍林彈雨之中，受傷的將士呻吟於病榻之上，他們有的是爲民族而戰的熱情，有的是「祈戰死」的精神。但他們仍舊需要着精神上的鼓勵與興奮。我們的文藝家，應該爲他們多多的寫作，當他們調防到後面喘息的時，當他們在床第呻吟之餘，我們應該用文藝作品去安慰他們，鼓勵他們。以戲劇的形式報告他們一些戰爭形勢，以激昂的歌喉使他們爲民族抗戰的精神更加發揚。

當然，「連環圖畫」、「牆頭壁報」之類的作品，無論是在前線在後方，是一樣的迫切需要，對於這些作品，我們一樣的要求具有強固的通俗性。智識階級在抗戰期間，固然需要新的教育，而廣大的小市民層及工農大眾，需要的是更加迫切。他們對於抗戰勝利的前途，關係是更爲重大的。

（救亡日報）

戰時演劇的我見

許幸之

關於戰時演劇問題，已不是如平常的單純的話劇運動，而是和抗戰相配合的政治宣傳了。因此，

我們需要揭發民衆的抗日情緒，組織民衆的抗日力量，灌輸民衆的抗日意義。

然而，中國人民的階層和集團是非常複雜的，譬如，在難民收容所中，有技術工人，農民，小商人，還有一些無家無業的遊民。他們所受的教育是不平衡的。文化水準也不一致。

傷兵醫院中也有兵士，將領，航空員等等，他們的文化水準和教育也有天壤之別。

其他如里弄中的居民，街頭流動的人羣，前方的將士，與後方的百姓，都有着各種不同的心理與心情。

因此，我們的演劇，要以這些複雜的階層和集團爲對象，而施行各種不同方式的宣傳。當然，因爲環境與便利的關係上，牠們不能把受過同等教育的人聚在一起，祇有依據他們現成的環境，而分別的施以宣傳和教育。

(一) 如在傷兵醫院中，我們要知道演劇的刺激，無論如何抵不上炮火刺激的強烈，而且他們的傷口未愈，有些正在和激烈的疼痛抵抗着。如果我們用太興奮的演劇刺激他們的神經，徒然使他們的傷口重行破裂，或加重他們傷口的痛楚而已。這裏，我們給與傷兵看的戲就需要有趣，滑稽，詼諧，安撫他們的一種戲。要在這些有趣味的演劇當中，儲藏着教育他們，勉勵他們的意思。因此，我們的每一個演劇隊中，需要有多才多藝的小丑，他能唱獨腳戲，京戲，歌唱，變戲法等一類的玩意。這樣不啻給他們一種餘興，使他們看了忘記掉自己的創傷，而易於恢復健康。同時，在這些遊藝和演劇中，強調

着抗敵救亡的意義。

(二) 在難民收容所中，因為他們有些是從炮火下逃生出來的，有些受過可怕的恐怖和虛驚，有些被敵人掠殺了他們的父母和子女，有些被敵人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因此，我們的演劇需要比較強烈；最好和他們難民們生死相關的劇本，使他們興奮、激怒、仇恨，進一步地組織他們的這種感情，養成他們勇敢奮鬥的精神，打擊他們的膽小和怯懦，掃除他們的個人思想，使他們將來個個都成爲抗敵救亡英勇的鬥士。

(三) 對於里弄和街頭，更需要輕舉而易動，因爲街頭的行人，多半是流動的，他們沒有這許多閒暇來看戲，所以我們的演劇，一定要能迅速地，在極短的時間中獲得宣傳的效果。對於他們，主要地要掃蕩他們的恐日病，消除他們對於敵人的飛機、大砲、毒瓦斯等等的駭怕。同時，就得在演劇中，指導他們防空、防毒、防疫等等的智識，軍事常識，地理常識，敵人侵略的步驟，我軍英勇抗戰的情形，民衆怎樣遭受無辜的屠殺，敵機怎樣轟炸民衆，掃射民衆的情形，都可以用動作，或言語表現出來。使得街頭的市民矧足而觀，或里弄的居民廣集在一齊看戲，進一步地組織他們，教育他們，鼓動他們，加重他們對於抗敵救亡的認識，一齊走向民族解放鬥爭的全線，這才是在抗戰期中，我們救亡演劇所荷負的重大的任務。

(戰時演劇)

在戲曲史料上看來，宋代就已經有了完整的戲，但除了王煥、王魁等戀愛故事的殘文外，便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所以宋代的畧去不談。滑稽戲中雖有諷刺南宋時政的，究因有類古之諷諫，只能算作對話，因此亦不去談牠。

因此，抗戰的歌劇便從元代談起。

提起元代的歌劇，立刻便使人想到光燄萬丈的元曲，但是，許是在異族統治之下的緣故吧，元曲中抗戰的材料竟特別的少。勉強說來，可舉出四種，即孔文卿的「東窗事犯」，周文質的「蘇武還鄉」，張國賓的「薛仁貴榮歸故里」以及朱凱的「昊天塔」。這四種戲對於後來都有很大的影響，前二種改編了南戲，後二種演化出許多的薛家將和楊家將的二黃戲。

北方的曲調是不合於南方人之耳的，因此，許多元曲都改成了元代的南戲。青木正兒的「中國近世戲曲史」對於此點列了一個詳盡的對照表，幾乎有一半的元曲都有了南戲。所以，東窗事犯便被改成「岳飛破虜東窗記」，蘇武還鄉便被改成「牧羊記」。前者許是一位名叫周禮的人改寫的，後者還不知道改編者的名字。前者把描寫的範圍擴大了許多，幾乎寫的是岳飛的一生，但掃秦一段

依舊有一部分用的是原來的曲調和對話。後者一向沒有全刊本。錢南揚陸侃如馮沅君先後從綴白委九宮正始等書裏輯錄了一些殘文和零齣。最近鄭振鐸預備把他所藏的牧羊記刊在世界文庫第二集裏，我希望此書早日出版。馬連良曾據崑曲改演過，其中如「望鄉」「大逼」「小逼」等齣還可看出脫胎的痕跡。

二

明代是我們中國人的天下，因此抗戰的歌劇也比較的多。但雜劇方面依舊顯得貧弱。振鐸最近新獲「雜劇新編」全帙，據說其中頗多抗戰的，我也希望此書能早日付之影印，此時我所能想到的，除了「雜劇新編」以外，就只有一種徐渭「四聲猿」中的「雌木蘭」，但二黃戲裏也已經有「木蘭從軍」了。最近周貽白兄正在編製元明清雜劇傳奇取材影響二黃戲的詳表，比較的結果，二黃戲取材於元明清雜劇傳奇者在一半以上，創作者極少。由此也可以知道爲什麼大部分的雜劇傳奇都已有了題材相同的二黃戲了。

明代的傳奇方面，可說是舉不勝舉。單就六十種曲而言，就有：寫漢衛青霍光的汪廷訥「種玉記」，晉祖逖劉琨等的朱鼎「玉鏡台記」，徐復祚「投梭記」以及無名氏「運甓記」，宋岳飛的「精忠記」以及韓世忠梁紅玉的張四維「雙烈記」，明倭寇的王世貞「鳴鳳記」這七種。關於新亭對泣這一悲壯的故事，是記在玉鏡台記第十二齣「新亭流涕」，投梭記第十六齣「赴宴」和運甓記

第十九齣「新亭灑泣」裏。

六十種曲中除了整本抗戰的以外，就是鉸兒女私情的傳奇也常有我國對異族抗戰的插敘，這是爲了一個戲班子必須生旦淨末丑各色俱備之故。演文戲的時候，武打的人無事可幹，所以也替他們找一點工作做做。這一種插敘以南宋抗金的故事爲多，略舉如次：

邵 璨：香囊記 14 點將 15 起兵 16 敗兀

高 濂：玉簪記 3 南侵 15 破虜

湯顯祖：還魂記 15 虜諒 38 淮警 46 折寇

單 本：蕉帕記 24 造逆 32 祈雪 33 搗巢

沈 鯨：雙珠記 33 剿虜同功

號碼是指齣數。蕉帕記寫的是破傀儡劉豫的故事，此外的對象大半都是金兀朮。

有一位崑曲的愛好者，不滿意於綴白裘，六也曲譜等的多收靡靡之音，他特地編了一部「崑曲碎存」，其中所收，都是激昂慷慨的崑曲。例，如上面已經舉過了鳴鳳記和精忠記也收在裏面，此外還收有「千鍾祿」「鐵冠圖」等種。

世界文庫第一集內有邱濬的「投筆記」一種，係鉸班起事，以前頗罕傳本，甚爲名貴，此外還該加上一種寫謝翱痛哭文天祥的「西臺記」，但此劇是否存在，不得而知，多半已經不易覓得了。

清代又是滿洲人統治我們中國，因此文網極嚴，敢說話的很少。雜劇方面，蔣士銓九種曲中有一種「冬青樹」，是寫文天祥的。張聲玠的「玉田春水軒雜齣」中也有兩種：「琴別」寫詩人汪元量別宋宮女北上，「畫隱」寫趙子固罵他的哥哥趙子昂降元。王船山的「龍舟會」以前我以為是提倡舊禮教中的孝，現在我疑心他實是借謝小娥報父仇來影射明季遺民之報國仇的；但如此隱晦，雖不得已，在現代人看來，究竟是失去煽動的力量了。

傳奇方面可舉的更少。最著名的自然是孔尚任的「桃花扇」。吳偉業的「秣陵春」也可以算數。如就曲目來看，也許還可以舉出很多，但有目無書，也是無用，因此索性不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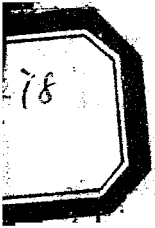
四

最後就談到清代二黃戲的本身。最近看到周信芳與梅蘭芳等把「別母亂箭」「刺虎」與「明末遺恨」連在一起演，我覺得這對於愛看「本戲」的人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因此我想到也可以把原有的「岳傳」連在一起演，略舉如次：「泥馬渡康王」「潞安州」「別母刺背」「九龍山」「挑華車」「八大鎗」「風波亭」「瘋僧掃秦」「罵閻羅」「岳家莊」「請宋靈」等等。明末遺恨還可以和「山海關」「道州城」等聯合起來。此外薛家將楊家將都可以演，只是薛楊較少歷史的真實性罷了。

最近聽說田漢已不編「史可法」而改編「戚繼光」歐陽予倩擬改「梁紅玉」並編「閩海文」周信芳擬編「閩應元死守江陰城」當可爲二黃戲劇一新的時代。

以上所說只限於御外侮，關於內亂，都不曾敘及，因爲那些比較上是第二義的。

（救亡日報）



73043

40.25